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汪精卫集团判国投敌记



前 言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正当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前仆后继，用自己的血肉长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汪精卫集团，突然逃离重庆，经越南河内尔后潜赴上海，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密谋策划，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在南京开张了历时五年半之久的伪国民政府这合傀儡戏。

汪精卫集团是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日派集团。其核心人物在抗战初期都是达官显贵：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相继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陈公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梅思平是国民党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高宗武是行政院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褚民谊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璧君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而且，这些人中大多曾参加过革命，有过“光荣”的历史，也负有虚名。然而正是他们，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公然卖身事敌，走上了叛国之路。他们是怎样堕落的？他们为何甘愿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他们的投敌与蒋介石集团有些什么关系？在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及与华北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等老牌汉奸合伙将中国推向殖民地深渊的过程中，又是怎样互相利用、互相争斗的？

对于这些问题，从抗战胜利乃至今日，国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把汪的投敌，说成“完全是出于独立立场的”，与日本的诱降政策“无丝毫关系”；有人则断言：抗战一开始，汪日间暗中就有勾结，汪的投敌，只不过是这种勾结的公开化。有人把汪的投敌说成是“感情冲动”，是“看错了局势，走错了路”；有人以为汪的投敌不仅反映其“可鄙和自私自利的一面”，也表明其“高尚和爱国的一面”。有人把汪的投敌看成是汪蒋在“唱双簧”；有人则否认此说，认为这是汪蒋的公开分裂，只是蒋介石集团的某些错误政策在客观上为汪的投敌创造了条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鉴于此，我们根据史料撰写此书，力求反映这一事件的原貌，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的野心和汪精卫集目的卖国罪行，引起人们的思考，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为“四化”建设贡献一份精神财富。如果本书真能在这方百产生一些积极作用的活。那就是我们的心愿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著者
一九八六年三月

编辑说明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号召编修中华民国史和重修请史。一九五六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被列入重点项目。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性。

开展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提高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本《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起促进作用，并能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国史知识。

本《丛书》拟通过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事件和专题，全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收录的范围，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覆亡止。

本《丛书》要求史料翔实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流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当分析和评价。

本《丛书》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11月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

一 抗战阵营中的“和平派”

卢沟桥的枪声

北京西南十五公里处的卢沟桥，横跨古老而神异的水定河，是一座可容“十骑并行”的大石桥。它建造于十二世纪九十年代的金朝，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由衷赞美和“卢沟晓月”的景色，使它闻名于世。在这里，曾经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导致了长达八年之久的中日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幅波澜壮阔、气势雄伟的民族自卫战的历史画卷。

一九三六年六月下旬，日本华北驻屯军荷枪实弹，以地处卢沟桥畔的宛平县城为攻击目标，在北干郊外举行野外军事演习。七月七日深夜十一时许，日本陆军某部一中队突然宣称：他们演习时，听到由宛平县城内中国军队发出的枪声，整队对发现一名士兵失踪，扬言要在当夜入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国军队拒绝。于是，日军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与国民党华北当局连夜交涉；一面立即调动丰台驻军，利用夜幕和青纱帐作掩护，向中国驻军驻地疾进，迅速包围了宛平县城。七月八日凌晨五时左右，日军即向宛平县射击，并猛轰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

卢沟桥的枪声，极大地震惊了中华民族，引起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军和各人民团体的强烈反响。驻守在八宝山至卢沟桥一带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六师第一旅，在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旅长何基沣、团长吉星文等指挥下，奋起抵抗，打得十分顽强，日军河边旅团长差点成了俘虏，迫位日军几次谈判，以待援军。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支持第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揭露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目的是以武力侵占平津和华北，进而“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指出中华民族已到了危急关头，只有实行全面抗战，中国才有出路。通电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自卫战争”，“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同一天，红军将领通电冀察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坚决表示愿做抗日先锋，“开赴前线给日寇以打击”。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协助二十九军抗日。各救亡宣传队不断开赴前线，对爱国将士进行宣传、慰问。附近居民冒着炮火为前线战士送饭端菜，搬运弹药，救护伤员。长辛店铁路工人搜集了大批铁轨、枕木、麻袋，在枪林弹雨中帮助军队建筑防御工事。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纷纷通电，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呼吁国民党政府团结御敌，发动全民族一致抗日。神州大地弥漫着抗日救国的热烈气氛，响彻着“血战到底”的悲壮声浪。

在国难当头，民族殆危的关键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也痛感局势的紧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反共立场，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置外敌而不顾，把大批军队调往围攻中国工农红军的内战前线，从而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致使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夺。至一九三五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越来越暴露了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向华北进行新的扩张，危及到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也动摇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统治基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改变了国内的阶级关系。除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年7月6日），《解放》周刊第10期，1937年7月12日出版。

级主张抗日外，国民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对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一致对外，共御外侮的政治主张有了逐步的理解。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迫使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实行对日抗战，在临潼华清池实行“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竭力怂恿南京亲日派挑起内战，以便在大混战中坐收渔利。为了粉碎侵略者的阴谋，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释放他，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此后，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进行多次会谈，推动了国共合作的步伐，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逐步表示了联共抗日的立场。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学术教育界领袖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讲演，说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提出了解决事变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蒋介石表示国民党还是希望以和平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④。

七月底，平津失陷。八月十三日，日军又把侵略魔爪伸进华东，发动对上海的大举进攻，并对南京、杭州、徐州、广州、武汉、厦门等地进行空袭，企图南北夹攻，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八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蒋介石亲自担任了上海战区最高指挥官，先后投入约七十万兵力与日军激战。

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中国进入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④ 蒋介石：《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讲演》，《总裁言论》（4）。

汪精卫其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从九江方向开来的永绥号军舰停泊在南京下关海军码头。稀稀拉拉几个人正等在此地，迎接从庐山回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原来，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起出席了庐山谈话会。会上，汪精卫也发表讲话，声称：“最近卢沟桥事变突发，危急情形，更加严重……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回到南京之后，他又多次露面，到处发表其“抗战高论”：

“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惟有抗日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惟有全国同胞一致的自动牺牲之精神，从事抗战，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誓必继续的将所有血汗都榨出来，以前的及现在的所有将士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流一起成为江河，扑灭尽了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尽了历史上被侵略的耻辱”。

“敌人在政治上有一个最毒的策略，就是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兵，来杀中国的人，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士大夫，来统制中国的人……只有不成材料几个最无赖的人，才肯做傀儡。敌人要学从前满州进兵利用中国士大夫统制中国人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了。……现在全国人民精诚团结，那个士大夫变节，立刻认他作汉奸，不齿于人。”

汪精卫讲的这些话，是何等慷慨激昂而又壮烈悲痛！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有这样大的决心，何以后来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当了天字第一号大汉奸？“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汪精卫的历史。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精卫是他的号。汪生于一八八三年五月四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后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历经明清两代。清道光末年，其父汪琚（字省斋），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即寄籍于此。汪精卫属庶出，在兄弟中排行第四。

汪精卫是父母最小的儿子，长得眉清目秀，且又聪明好学，善承人意，很受父母钟爱。汪琚很重“书香门第”，望子成龙心切，当汪精卫五岁时，就让他入家塾读书识字。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内有庭院，每天晨曦初露，他就“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下午放学回家，父亲还亲自“课督”，要他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或习吟陶渊明、陆放翁的诗。汪精卫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但好景不长，汪十二岁时，母亲因染时疫去世，第二年父亲又患霍乱病歿。从此，他失却了父母的抚爱和家庭的温暖。父母死后，汪精卫年幼不能自立，即随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嫡

汪精卫：《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之引论》（1937年7月15日），见《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3年6月版第3页。

汪精卫：《继续牺牲加紧生产》，转引自徐达人：《汪精卫骂汪兆铭》，岭南出版社，1939年10月版，第12页。

汪精卫：《救国公债》（1937年9月6日），见《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第19页。

汪琚原配夫人卢氏，生有一子三女，于1871年病歿，同年续纳广东人吴氏为妾，生有三子三女。汪精卫为吴氏所主，故属庶出。

张江载：《汪精卫先生年谱》，第1页。

长兄汪兆镛，客居粤北乐昌，“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汪兆镛字伯序，是个举人，几次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即以游幕为生。他对汪精卫管教极严，不稍假辞色，使得汪大有动辄得咎之感。尽管汪精卫对长兄貌极恭顺，如对严父，实际上内心却不免忌恨，但又无可奈何。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后来汪精卫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和变革相交炽的时期。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天天激化，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正在酝酿之中。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既痛感于“国势日危”的现实，在社会改革浪潮的冲击下，走上了反清斗争的革命道路。

一九〇四年九月，汪精卫通过留日官费生的考试，与朱执信等人一道，东渡日本，求读于法政大学速成科。他从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研究有一定造诣的梅谦次郎校长及其他教授那里，逐渐整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把从前束缚自己的“君臣之义”抛到了九霄云外。一九〇五年，他在东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长。这期间，他以“精卫”的笔名，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妖言惑众”。汪的政论文，笔锋犀利，宗旨严正，文从字顺，师出以律，博得了读者称赞，也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从而汪精卫声誉大增，从一个名不经传的留学生，变成了名噪一时的年轻革命党人。

然而，革命总是沿着崎岖曲折的道路前进的，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间，同盟会在国内多次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汪精卫对革命丧失信心，转而采取暗杀行动。本来，汪就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留学日本后，又受到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俄国民粹党人暗杀活动的影响，重视个人的作用而轻视群众的力量，又容易感情冲动，求痛快于一时，缺乏韧性。因此，他在革命蒙受挫折时，“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与虏酋拼命”。一九〇一年初，他潜入北京，与黄彼中、喻培伦等会合，企图谋刺清廷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四月，事泄被捕，被解送内城巡警总厅。五月初，移入民政部监狱。入狱后，汪精卫曾写了一首题为《被逮口占》的五言诗。其中八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悲壮动人的诗句，读来铿然有声，脍炙人口，曾经被传诵一时。

按照清朝刑律，汪精卫等人是犯了死罪。但由于革命党人奔走呼号，国内外舆论强烈，清朝统治者也感到杀了汪等几个人，不仅不能阻止革命，反而会引起革命党人的更大反抗。当时，清政府又在竭力标榜君主立宪，为此，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誉极力主张以收买人心为重，从轻处治。于是，汪精卫被判处终身监禁，住在一间裱糊一新的房间里，“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

汪精卫：《自述》（1933年12月7月），《东方杂志》1934年第1期。

汪精卫：《供词》，见张江裁纂：《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第19页。

，善耆还多次亲临监狱探视，与他谈论政治，表示倾慕，并“赠以图史百余帙”。长期的监禁，清朝统治者的攻心软化，使汪精卫的意志受到消磨，思想情绪发生变化，他在狱中写下《有感》一诗，把自己曾经身体力行过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说成是“豆萁相煎”。在另一首题为《述怀》的五言长诗中，则谴责自己谋刺清摄政王的行动是一时感情冲动，缺乏修养，意境情态大变。难怪当时就有人指出：“兆铭在狱时，固已投降民政部大臣善耆矣。”这种心灵深处的污点，正是汪精卫后来无法保持晚节的历史痕迹。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解除党禁，宣布释放政治犯。十一月六日，汪精卫被释。此后，汪曾一度为袁世凯所利用，在南北和议中主张革命派让权。但是，当袁世凯窃国成功，当上了大总统，汪并没有因袁世凯的拉拢而去投袁，却流露了一种“人生不能无劳，劳不能无息，虽劳而暂息，人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乐也”的情调，带着新婚妻子陈璧君去法国。从一九一二年八月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其间汪精卫虽曾三次短期回国，参与某些政治活动，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往来于欧洲大陆。他长期居住于法国，考察西方社会，学习西方文化，以诗文自娱，对于国内之事，表示“不欲问鼎”，超然于政坛之外，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汪精卫烦闷、消沉的心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汪精卫又开始活跃于国内政治舞台。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病危之际，汪为他草拟遗嘱，捞了一笔政治资本。同年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极力表示左倾，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一九二七年春，正当北伐军胜利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不到三个月，那个言必称改组精神，文必举联俄联共的汪精卫，因为屈服于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露出了杀机，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与蒋介石歧路同归，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到了内战的苦海里。但在尔后激烈的内部倾轧中，蒋介石集团控制了南京中央政权，而汪精卫集团一无所获。醉心权位的汪精卫不肯罢休，他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充当反蒋主角。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在“共纾国难”的幌子下，蒋、汪杯酒言欢，由势不两立到厮守共枕，形成了所谓“蒋汪合作”的统治局面。一九三二年初，汪精卫登台，出任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还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以后又兼任外交部长，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负责“剿共”。

汪精卫上台后，立刻面临着对日外交的棘手问题。一方面，他鉴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另一方面考虑到九一八事变后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汪精卫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既要推行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又不能不改变一下蒋的不抵抗老调，因此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他说：“盖军事上若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但在汪精卫

《正宗爱国报》1910年5月5日。

汪精卫：《双照楼诗稿》《小休集序》。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

看来，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万不可与之对抗，“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因此他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倘使不幸而终至发生冲突，亦必使衅自彼开，为天下万国公见之事。”十分明显，汪精卫的所谓“抵抗”是有限度的，他想先“抵抗”一阵子，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做，既可应付舆论，又可避免违背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过多地损害其统治利益。因此一二八淞沪抗战一起，汪精卫就一再表示“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要予以抵抗”，并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明爱国之义，尽守土之责”。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汪精卫的所谓“武装抵抗”，就逐步为“和平交涉”所代替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当上海前线与日军激战的十九路军正处于劣势，急待增援之际，蒋汪合作的政府就准备对日妥协了。他们以“深自抑制，循国联之决议，听友邦之斡旋”为由，于五月五日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之间广大地区中国无权驻兵，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这是汪精卫上台后亲自批准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可这时，汪精卫还不愿负“卖国”之名。为了标榜自己是抗日的，同年八月上旬，他突然不告而别地离宁出洋，要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批准他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汪声称因反对张学良的“不抵抗”，说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现在又借“抵抗”为名，“以事聚敛”，使他无以应付，故“忿而辞职”。为此，汪精卫要张学良同他一起“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其实汪精卫此举，辞职是假，表明他的“抗日”立场是真。在汪挑起的这股政潮中，蒋介石正好找到了丢失东三省的替罪羊，立即准许张学良辞职，对汪精卫则表示“恳切劝挽，仍请力任艰巨”。于是，汪精卫在欧洲住了几个月，又重返南京任职。

不久，长城各口相继沦落，汪精卫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害怕了。他的所谓“抵抗”，从此就不见了影子，而是一味妥协，幻想通过媚口外交来阻止日军的进犯。且看他的行动：

一九三三年五日，汪精卫支持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交涉签订《塘沽协定》，他电示黄郛说：“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允”。该协定承

同上

同上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

《中国抗战画史》，第42页。

《申报》1932年5月25日。

《国闻周报》第9卷，第32期。

《国闻周极》第9卷，第32期。

指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932年3月在长春制造的傀儡政权。该政权以清室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3月称“满洲帝国”，改号“康德”。

认冀东为非武装区，准许日军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还要给予保护并予以便利，同时规定日军撤至长城一线，实际上等于承认长城线为中日国界，确定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热河的“合法”性，给了日本以侵华的特许状。协定签订后，汪精卫致电何应钦、黄郛表示：

“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真冲”。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向日本国内和外籍记者团发表声明，竟然视中国为日本的禁脔，叫嚷日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础，负有全部责任”，如果外国与中国“进行经济及贸易上之交涉”，尤其对中国出售飞机、教授飞行术、派遣军事教育顾问以及提供政治借款等，“就日本立场而言，则不能坐视不问”，公开宣告日本要独占中国和亚洲。天羽声明发表后，欧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本身的利益，对日本政府的动机表示“疑虑”，要求它作明白的解释。而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外交部却于四月十九日发表声明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购置军用品”、“雇佣军事教官或专家”，“大部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倘现有不平之事态可予纠正，中日间之关系，可令其改善”云云。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日外相广田弘毅在六十七届议会发表谈话，提出所谓“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掩盖其军事侵略，加紧其经济侵略的骗人宣传。对此，汪精卫不仅不加以揭露，相反与之呼应。他表态说：

“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天的消除”，“中日携手的希望，可以期其实现”。六月十日，由汪精卫签署发表的国民政府“敦睦邦交令”，规定“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压制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讨好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年五、六月间，汪精卫和蒋介石又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出卖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主权。

汪精卫的媚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也受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攻击，蒋介石为了谋求与日本妥协，虽然表示支持汪的对日外交政策，但他更多地是想依靠英美。一九三五年后，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加紧，英美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也开始对汪精卫在对日外交上的过于软弱无能、迁就妥协表示不满。他们利用人民的抗日爱国情绪，把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外交的责任全部推在汪身上，制造舆论说：蒋介石是主战

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8辑，第2120页。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3辑，第2132页。

《国闻周报》第11卷，第17期。

《申报》1934年4月20日。

《申报》1935年2月21日。

《申报》1935年6月11日。

的，汪精卫是主和的，中国之不战，坐于汪精卫的从中作梗。并公开对禁止排斥日货、颁布“敦睦邦交令”提出异议，甚至要求清算对日绥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于这年七月宣布“宿疾复发”，先到上海治疗，后又去青岛休养。他心情恶劣，想撒手不干，对亲近的人发牢骚说：“马弁政治，副官政治，要不得，干不得。”八月八日，汪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辞呈。这时，蒋介石还要汪精卫为他挡在对日外交的第一线，害怕汪的下台会给自己造成被动，便派张群到青岛“慰留”。汪精卫虽不愿独负卖国之责，但又不愿丢弃手中的权力，他见蒋介石有所让步，就于二十三日宣告复职。然而，汪精卫复职之后，国民党内的英美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就此平息。蒋介石为了保持和日本的关系，虽然在私下里讲儿句不要反对汪的话，但他并没有公开为汪分担责任。

正当英美派和亲日派矛盾激化，全国人民谴责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时候，轰动全国的刺汪案发生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全体中委聚集在第一会议厅门前摄影。蒋介石因事未到，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中间。摄影完毕，大家正回身上石阶向会议厅走去，忽然从记者群中跳出一个来，举起左轮手枪，向汪精卫射击。第一枪就击中左额，汪立即倒地，背部又中一弹，左臂也被枪弹擦伤。刺客当场被枪击捕获，两天后死于医院。经调查，此人名叫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激于爱国义愤，以晨光通讯社采访员的身份潜入会场，以谋杀蒋介石为主要目标，因蒋未参加拍照，即以汪精卫为谋刺对象。

汪精卫遇刺后，被抬到南京中央医院开刀，由德国医生诺尔将其左额的子弹取了出来，而背后的子弹未取出，就只好留在背脊里。十二月五日，汪派重要骨干、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寓所遇刺身亡。过了两天，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解除了汪精卫的行政院长职务，把他安置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接任行政院长，汪派上层分子大部分被踢出了行政院。正在上海养伤的汪精卫，这时既感大权已失，又怕再度遭刺，遂带着枪伤匆匆就道去欧洲。从一九三二年初开始的蒋、汪合作的“蜜月”到此结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得知蒋介石被扣，又接到国民党中央要他回国的电报，认为这是自己再次上台的大好时机，便“力疾起程”回国。他在意大利热那亚上船前发表谈话，攻击西安事变是“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内忧外患，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到了菲律宾马尼拉，他又发表谈话，声称中国诚心与日本合作，希望日本采用寻常途径，恢复中日外交关系，向日本帝国主义大献殷勤。但是，当汪精卫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到达上海时，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开始转向联共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然而此时汪精卫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其媚日、反共立场。十八日，他不顾宿疾未愈，旅途劳顿，匆匆赶到南京，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纪念周”上发表讲话，叫嚷说：“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第 232 页。

《申报》1936 年 12 月 23 日。

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

汪精卫，就是这么一个反共媚日的顽固派！他面临七七事变后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不能不唱几句合乎潮流、鼓舞人心的“抗战高调”，但不久人们便发现，他所讲的一切都是假的，只不过是些伪装自己的骗人鬼话。实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力主与敌妥协谋和。正如他后来自供说：“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转圜者，转向也，他无时不想要扭转全民族抗战的总趋势。

巫兰溪：《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分分合合的丑剧》（未刊）。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1939年7月9日），《时代文选》第五、六期合刊。

低调俱乐部

抗战初期，汪精卫以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为其妥协谋和活动作掩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潮流中，“巧妙”地散布其“亡国论”低调。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汪精卫在南京发表了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说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虽然知道日本对于中国是侵略无已的，“对于中国是一步一步的杀进来”，但中国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后退”。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因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接着，他分析了缔结《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的原因，说当时蒋、汪合作的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忍辱负重”，“确是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仍然忍下去，让下去”，就是为了“想使日本进得慢些，我们退得慢些”。为他在战前的媚日外交政策辩解。

八月三日，汪精卫又一次发表广播讲话，他以训人的口吻要大家“说老实话”，“负责任”。怎样才算说老实话呢？他借俄国将亡于德国，德国将亡于协约国而终究未亡的原因是“肯说老实话”，“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了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用汪精卫的话说，所谓说老实话，就是“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言下之意十分清楚：“和”只有吃亏而已，倘且“有所以抵偿”；而“战”就会“败个不已”。汪精卫用心，昭然若揭。

在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汪精卫还用战争的恐怖，来宣扬民族失败主义。他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那就“只有牺牲到底”了。“‘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有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等到“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汪精卫在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词中，进一步鼓吹：

“一年以来，破碎的山河，没有一处不染满了我们同胞的血痕。今年三月……据军政当局的报告，武装同胞死伤之数，已达五十多万。如今又过了三个月了，……武装同胞死伤的数目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也可以推想而知。”

“至于非武装的同胞：在沦陷区域内，死于飞机之轰炸，大炮之轰击，机关枪之扫射，步枪之射击。刺刀之刺杀，其数目一时更不易统计。即在后方区域，一样的也日日在飞机轰炸之下不断的流血。……其数目尤一时不易统计。”

“一切武装同胞非武装同胞的血，从前流着，现在流着，未来还要流着！”

汪精卫的这番言论，虽然不同于那种公开主张打败仗，要乞和投降的论调，但实质是一样的。他旁敲侧击地强调“牺牲”，以“牺牲完了”暗示“再战必亡”，把抗日民族战争描绘成除了“死”和“血”以外，别无所有；用说过头话的手法来散布悲观论调，以吓唬群众，破坏抗战，这是典型的“亡

汪精卫：《大家要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见《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第8—17页。

《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第11—12页。

国论”低调。

其实，汪精卫早已被日军的气焰吓破了胆，整个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败空气。陈璧君及其子女常常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太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全民族抗战的浩大风涛，使社会上各种人按照新的标准重新组合。以原改组派为主体的汪精卫集团，受到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断上升的民族矛盾刺激，其内部也发生了新的分化，不少人在民族危亡的威胁和人民抗日热潮的鼓舞下，也主张抗日。然而，就在汪精卫鼓吹“亡国论”低调的时候，从蒋介石集团中分化出一揽人来，他们投奔于汪精卫的麾下，与汪互相呼应，同唱一个调子，这批人就是以周佛海为首的所谓“低调俱乐部”的伙计们。

周佛海是一个狡黠善变的资产阶级政客。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他生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父亲曾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入了湘军的幕，因军功受禄，晚年曾赴福建省任县知事。在周佛海出世后不久，父亲病歿，家境渐趋拮据。寡母将他弟妹三人拉扯成人，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一九一七年，周佛海靠亲朋友好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第一、第七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当时，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正席卷日本岛国，周佛海身临其境，也受到了感染，“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不觉信仰起来”，但是，他的这种“信仰”却含有强烈的个人欲望，他后来自供说，那时他“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他作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本来就十分肤浅，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也并非出于真诚的信仰，他是带着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研究革命理论，又抱着个人的野心投身于革命的行列。“一大”后，他开始研究“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观察中国的现实和中国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革命。他把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与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相类比，从而得出如下的结论：企图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实在是“时机尚早”。周佛海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既然要具有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而中国既没有“生产规模的广大和企业的集中”这样物的要素，又没有“无产者的阶级自觉和数量增加、团结坚固”的人的要素。“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在中国几等于零”，因此，中国就根本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基础和条件了。周佛海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欧洲，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这种认识下，他把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任务和奋斗目标，统统置于脑后，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去处。

一九二四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推进。周佛海接受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离开日本至广州，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这时，周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不愿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并到处散布对共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香港《掌故》杂志 1972 年 7 月刊。

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古今杂志》第 19 期。

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古今杂志》第 19 期。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1927 年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编印。

共产党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中共广州党组织没有厌弃他，而是耐心地批评教育他，帮助他认识错误，重新走上正道。但周佛海毫无悔改之意，我行我素。这年九月，他给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写了一封长信，要求脱离党组织。中共中央根据周佛海的表现，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同意他的要求。

周佛海脱党后，与中山大学 的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把自己摆在与共产党相对立的立场上，他声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他伙同中山大学的几名教授，办起以“反对共产党”为主旨的《社会评论》，但当时广州充满了浓厚的革命气氛，周佛海就只好在“字里行间以及论文的用意上，暗中加以攻击”。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中山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戴季陶的风潮，周佛海跑到上海，于一九二六年再往日本读完大学课程，随后又返上海，参加了倾向于国家主义的“孤军社”。他先后在上海《孤军》杂志、《浊立青年》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中的阶级问题》、《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周佛海就是通过反共去投靠蒋介石的。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自兼校长，但蒋不在武汉，由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中任该校教育长，周佛海奉蒋介石之命，任该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当时邓兼职较多，张也兼学兵团团长，校内工作大半由周佛海负责，翌年一月中旬，蒋从南昌到武汉“察看”，这对周佛海来说，是进一步靠拢蒋介石的天赐良机。可事不凑巧，周佛海这时因嫖妓染上梅毒，正躲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介石到武汉后，传令见周佛海，找不到人。恰巧周的一个嫖友也入院治花柳病，周得知后，急忙前往求见，向蒋介石密报了学校内部国共两党的情况。当蒋听到该校学生中共产党人要占三分之二时，立刻面授机宜，要他切实监视，及时汇报。这次会面，周佛海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产生了良好的形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共事变后，周佛海携带妻子，逃出了武汉，他在船上写了一篇《逃出了赤都武汉》的文章，大骂共产党，大骂武汉政府，作为投奔蒋介石的见面礼。这些都为他后来受到重用打下了基础。

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携，周佛海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步步升高，成为蒋介石集团的智囊团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一九二八年，他与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等人 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杂志和新生命书店，他所撰写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及《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曾畅销全国，《三民主义理论简体系》后来还被指定为国民党政治党务的必修课本。在国民党派系之争和新军阀混战的年代，周佛海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长、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是蒋介石身边为蒋弄文舞墨的“文胆”之一。一九三一年，他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执行委员，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蒋介石南昌行营政治训练部主任等职。抗战初期，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际，周佛海正在参加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庐山谈话会。当他听了蒋介石的讲话后，不禁浮想联翩。过去，蒋介石不是一贯主张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

“攘外必先安内”吗？现在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难道他就这么甘心情愿放弃“剿共”，而实行联共抗日？

难道蒋介石还不明白“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的道理吗？周佛海认为，蒋介石是“绝顶聪明的”，目前朝野上下，都在“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介石不能不附和，而且还要唱得比别人更高，只有这样，才能压服反对派，争取舆论的支持。不过，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的用心虽然良苦，但决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作茧自缚”，“逼迫他走上不愿意走的路”。他带着一肚子疑惑和惶恐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南京。

座落于南京西流湾八号的花园洋房，周围是一片翠竹垂杨，映着青水绿波，真象一座世外桃源。这里，便是周佛海的住宅。这幢别具一格的洋房，是周佛海在一九三二年年建造的，房子动工的时候，正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机常来空袭。为此，他特地在花坛下造了一个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这里便成了周佛海社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许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报，有的干脆搬到这里来住。来客中间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胡适，每日必来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这些人麇集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唱一个曲调。他们对蒋介石准备抗日的谈话表示不满，对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十分反感。且听他们的论调：

“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调持久的全面战争。”

“因为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

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

“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

“如果战争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国难的。”

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周佛海自己承认，他们当时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坚确的认识”：即“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于是，他们一面设法约人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面传播自己的主张。胡适觉得这个地方的气氛同外面完全两样，就给它起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的臭名渐渐传了出去，引起了外界的注意。有一天，周佛海正在南京富贵山大地地下室里办公，熊式辉把他叫出去，关到一个秘密的房间里，很严肃地对他说：

“你要小心，不宜乱说话。广西方面某要人，说你是非战集团的主要人物。”

周佛海听了，谢过熊式辉，内心感到震惊，但他还是强作镇静地说：“中国人只知自爱，而不知爱国。如果我们认为于国有利的主张为什么这种爱惜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中华日报》1939年7月22—24日。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羽毛，藏在心中而不说出来呢？”但他嘴上这样说，行动上却不能不有所收敛，每逢有事，周佛海就通知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躲到中山门外灵谷寺后的那个高塔顶层去密谈，然后出去与汪精卫接头。

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周佛海，与汪精卫本来一无渊源，相反，曾经有过激烈的唇枪舌战，双方曾互相臭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然而，共同的利益和需要，毫无二致的政治主张，把他们推到了一块。西安事变后，当汪精卫回国时，周佛海与邵力子、周启刚、彭学沛等人奉命前往香港迎接。汪、周一见面便相谈甚得。但过去他们毕竟是政敌，虽然周佛海主动找上门去，向汪精卫求释前疑，汪仍疑心周佛海是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来试探他的，说话也格外小心谨慎。不料周佛海吐沫四溅，大谈“亡国论”低调，这同汪精卫的主张一拍即合。为了结成反共媚日的新班底，汪精卫急于要寻找帮手，周佛海也想改换门庭，于是两相情愿，很快合为一体。正如周佛海后来回忆说：

“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就这样，“低调俱乐部”成了以汪精卫为头子的国民党内“和平派”的基干力量。汪精卫集团有了一个新的组合，周佛海从此成了汪精卫的心腹，为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出谋划策，是汪伪“和平运动”的一个“总参谋长”。

同上。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二 陶德曼调停

一 份处理“中国事变”的纲要

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的同流合污，是抗日阵营中的一大隐患。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大。他们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开展对口“求和”活动，妄图化战争为“和平”。

八一三的枪炮声，加快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步伐，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被日军暂时的优势吓得索索发抖，认为战争前途可忧，“而亟亟于从成的途中恢复和平”。从这时起至南京失守的四个月中，汪精卫亲自出马找蒋介石面谈；面谈还不够，又写了十多封信，劝蒋“停战议和”。周佛海也通过知名学者胡适、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劝、《大公报》的张季鸾等，先后向蒋“进言和平”。但是日军向上海的进攻，严重损害着四大家族的经济利益，直接危及蒋家王朝的统治，也侵犯了欧美帝国主义在华权益。汪精卫等人的“议和”意见，未被采纳。

九月下旬，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督促，在全国抗日怒涛的推动下，蒋介石被迫准备宣布国共合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得知这一消息，恐慌万状。他们深知，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旦正式建立，他们对日“和平”的主张就更难实现。于是由周佛海出面，连忙找国民党大本营第二部部长熊式辉商量。周说：“听说蒋明天要发表容共声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刚发表不久，现在又要发表这个声明，这不是给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实，使他们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吗？你去劝蒋稍后再发表吧。”当天晚上，正好蒋介石约熊式辉谈话，熊转告周佛海的意见，蒋点头称是。可是迫于形势，蒋还是发表了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使得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大为不满。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四天，七月十一日，日本内阁会议即将此次事变定名为“华北事变”，同时作出四点处理方针：一、派遣五个师团的兵力去华北，先派朝鲜、满洲两个师团，国内三个师团准备动员；二、派兵的目的是显示威力，达到中国军队陪罪与对将来作出保证；三、不答应日方要求时给予打击；四、始终坚持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同一天晚上，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宣称：“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但同时又假惺惺地表示“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以欺骗世界舆论，为大规模的侵略打掩护。

日本帝国主义有一信条：“军刀一旦出鞘，很难不见血而回。”有了第一步之后，就非得走下去不可。七月三十日，日军占领平津，八月十三日，对上海发动大举进攻，日本政府马上撕下了“和谈”的假面具，宣布“放弃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公开称“华北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转引自[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236页。

[日]内阁会议决定：《派兵华北的声明》（1937年7月11日），[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366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第1版，第39页。

[日]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1937年8月17日），[日]《日中战争》2（《现代史资料》9），

事变”为“中国事变”。并且狂妄地叫嚣：在华北两周内陷大同，一月攻占整个山西；在东南十天之内占领上海，三周陷南京，一月即逼近武汉；在华南一举攻占广州。妄图在三个月内，迫使中国丧失全部抵抗能力。然而，在中国军民的奋勇抗击下，直至九月底，日军在华北仍停留于大同、保定一线；在上海战场，日军不断增兵，猛攻近三个月，仍未得逞。中日战争呈现出向持久战转化的趋势，这使日本政府十分焦虑。为了避免对华作战变成长期战争，它一面继续增兵上海，力图用武力打开僵局，一面施放“和平”烟幕弹。十月一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在这一《纲要》中规定的总原则是：

一、一般方针

本意在于使这次事变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和容共政策，在日华之间建立真正明朗而永久的邦交，以期实现日满华的和睦与共荣。……

二、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而采取适当的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以及与此有关的必要工作等。

三、外交措施

外交措施的目标，在于迅速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对于中国及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与工作。

四

在不超过国际法所许可的范围内，慎重实行军事、外交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措施。

所谓军事行动的“成果”，就是包括“在华北大体上把中国军驱逐到河北省（《何梅协定》规定的地区）以外，在上海方面驱逐到《上海休成协定》指定的地区外”等日军占领的中国大片土地；而军事行动的目标，即包括南京、武汉、广州等大都市和其他交通要道，通过战争的手段，占领这些“目标”，“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所谓外交谈判的工作，就是通过第三国，在承认日本侵略条件的基础上，“调整邦交”，以使用“和谈”的方式，结束“中国事变”，获得在战场上无法获得的利益。在这一份《纲要》指导下，日本侵略者通过各种渠道，软硬兼施，阴阳并举，向国民党政府展开一系列诱降活动。

十月二十一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得此消息，狄克逊急电德国外交部请示。翌日，德外交部国务部长麦根逊致电德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让他转告中国政府：德国政府认为，

1964年版，第34页。

指伪满洲国。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70—372页。

同上，《文书》第372页。

施子愉译：《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1937年10月—1938年1月）》，《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

“就目前来说，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

日本示意德国出面“调停”，而德国也乐此一举，很快接受日本关于调停中日战争的要求，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一直呼吁英美各国支持中国，制止日本的侵略，“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九月间，国联第十八届会议开幕，会议举行的前一天，九月十二日，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正式申诉书，请求国联采用会章的有关条文，对日本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会议期间，顾维钧又痛述了远东情势极其严重，亟待国联紧急处置。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不断升级，排斥英美、独霸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英美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以阻止日本对华侵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国联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决定将中日问题交付一九三三年二月成立的由二十三国参加的咨询委员会处理。九月二十七日，国联咨询委员会通过两项报告：（一）确定日本的军事行动违背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二）目前中日冲突，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应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为了使日本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国联大会议决会议的地点选在与中日战争无关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但是，日本政府深知，即将召开的九国会议，不管其实际效果如何，都必然置日本以被告地位。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日本对九国公约会议实行抵制，不仅自己拒绝邀请，并怂恿其盟国伙伴德国和意大利，共同拒绝参加。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凭藉其军事上的优势，示意由德国出面“调停”，诱使中国政府与日本直接谈判，以对抗英美等国的“国际干涉”，进而实现其“速战速和”的战略。

当时，德国可谓是中日直接谈判的理想“递信员”。它不仅与日本结成联盟，共同的法西斯对外侵略把两国的命运拴在一起；而且，它又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自一九二八年以来，一个由德国军事专家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就一直留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担任顾问，他们帮助蒋介石改组和训练军队，深受蒋的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的马克思·鲍尔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蒋的召见”。尤其此时希特勒正野心勃勃想挑起欧洲战争，准备对苏联用兵，因此希望日本在远东保存实力，以牵制苏联。德国正是怀着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迫不及待地跑出来，伙同日本政府，共同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施展诱降与逼降活动。

在日本帝国主义施放的“和平”烟幕中，国民党政府跃跃欲试。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国防会议经过密议，对“停战”问题作了如下考虑：

一、停战对于军事上之利害

1. 对于士气精神之影响：停战易引起抗战精神之涣散。此后续战，欲再振精神，颇为

同上

《国联咨询会第二报告书》，载《抗战文献》，独立出版社印行1938年5月版，第30—31页。

日本政府对德国军事顾问团使华一直表示不满。但由于德日联盟缔结的方针尚未最后确立，德国政府对日本的抗议采取敷衍态度。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国签订《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议定书》，世界法西斯侵略集团正式形成。1938年1—2月间，该顾问团被撤消，其中大部分成员奉命回国，日本立即照会德国政府表示感谢。

《德国外交部档案，政治之十三，中国·卷2，蒂曼的急件》。

困难。故停战于士气不利。

2. 目下现役部队略已使用 1 完尽，此后补充者多系新募，未经训练，故战斗力益见低劣。故以适时停战为有利。

3. 械弹器材、被服粮秣之积储略已用至半数，后续补充堪虞。故以适时停战为有利。

4. 目下晋、鲁两省未决，上海形势亦有利，故如在目前停战，外交形势尚不恶劣。

二、停战后再续战两方利害之比较

停战后再行续战，此停战期间敌我两方均得利用以调整部队，整理补充，增筑工事，以及整理后方等等。此事敌我西方本属相同，惟因我方系防御作战，又敌军在我国内作战，故有较敌有利之处，兹比较如下：

调整部队

整理补充

补充兵之训练

敌我相同，因时间相同。

增筑防御工事及设备于我有利，因我方为防御。

组织民众及游击部队于我有利，因在我国土作战。

增强各地防空组织及设备于我有利，国我空军劣势，不能袭击敌国。

整理后方交通于我有利，因无空袭。

军械弹药器材之输入于我有利，因我方所购之弹药等，愈迟则到者愈多。

这次会议的结论是：“综观以上利害比较，停战或短期停战于我物质上均较有利。故在有利之条件下，自可接受。又为顾虑士气精神上之影响，则外交上不妨避去停战口吻，而以‘敌如撤退或退至某某之线则我不进’之方式出之。”

上述内容，生动地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所采取诱降阴谋的认识。由于判断上的根本错误，导致了政策上的过失。此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鱼雁往来，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和谈”活动，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没有停止过，这就为汪精卫集团的对日“求和”，找到了借口，打开了方便之门。

陶德曼充当调解人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到南京会见了国民党外支部次长陈介，正式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为中日直接谈判进行从中联系的意向，并要陈介转告蒋介石，建议国民党政府授权给他担任此项任务。陶德曼“劝告”国民党政府对九国公约会议不要抱什么希望，说这个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中国应与日本直接谈判。为此，陶德曼要国民党政府改其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他说：“在目前的冲突中，这个公约（即指将于十一月六日签订的德意日反共公约）并无实际的重要性，可是中国与俄国缔结条约（即指八月二十一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她与日本成立协议比较困难了。修改中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必要的。”陶德曼一出场，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连哄带骗的角色。

为了早日实现中日直接谈判，以促使国民党政府就范，第二天晚上，德国大使馆参赞斐尔诗在南京汉口路廿号寓所，有意以约请晚餐为名，安排汪精卫、何应钦等人于陶德曼见面。据一个参加者目睹，这天晚上汪精卫与陶德曼另坐一隅，通过翻译，“款款深谈，……所谈自与目前中日关系有关”。心有灵犀一点通，临别前，陶德曼约汪精卫于“礼拜三晚宴会”，汪也约陶德曼于“礼拜六晚宴会”，“用意尤为显明”。

十一月二日，广田弘毅会见狄克逊，提交了日本政府的议和条件，其中包括：

- 一、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相似的自治政府。
- 二、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于津铁路以南一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和约缔结前，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
- 三、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
- 四、停止抗日政策。
- 五、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
- 六、降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
- 七、尊重外侨权利。

广日声称，假如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将继续作战，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更苛刻的条件。第二天清晨，狄克逊即将日方条件电告本国政府，同时建议德国政府应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其接受这些条件，并令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在向蒋介石汇报战局时应“鼓吹和平谈判”。德国政府接到狄克逊报告后，认为日本方面的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十一月三日，德国外交部长电令陶德曼，把日本和谈条件通知蒋介石。

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在座。见面后，陶德曼即将日方的条件转交给蒋介石，要蒋考虑：不

施子愉译：《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

施子愉译：《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其中遗漏3——2页重要条件，即关于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以后同德曼传达给蒋介石的仍为这7项。

应该在仗打到精疲力尽的时候，才与日本谈判。但蒋介石心里明白，虽然当时战局仍十分紧急，而上海、太原尚未失陷，九国公约会议也刚刚开始举行。因此蒋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蒋介石向陶德曼解释说：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蒋还说，现在中国正在受到布鲁塞尔会议列强的关怀，“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因此他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但谋求与日本直接谈判，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与日本妥协，签订“和平”停战协定，却是蒋介石集团所愿意的。蒋介石表示：对日方的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蒋还特别关照陶德曼说，对于这次调停活动必须“严守秘密”，而且要自始至终由德国做中介人。陶德曼满口答允。

有了蒋介石的这番话，陶德曼的活动更加频繁了：

十一月九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按照陶德曼的要求，在南京向孔祥熙和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指出成局的严重”，要他们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

十一月二十八日，陶德曼在汉口访晤孔祥熙，对孔劝降。

十一月二十九日，陶德曼在武汉访晤外交部长王宠惠，重弹德国的主张。

十二月二日，陶德曼在南京再次会见蒋介石，蒋又表示，日本所提各点，可以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陶德曼热衷此事，不辞往来奔波之劳，使蒋介石深深感激，然而，蒋介石集团的妥协退让，是有一定限度的。但“和谈”口子已开，汪精卫集团的“和平愿望”受到了鼓舞，于是他们穿插其间，从旁推波助澜，参予策划对日的秘密谈判。

十二月五日，汪精卫以接见新闻记者之机，发表谈话说：

“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第二天上午九时，汪精卫又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在汉口中央银行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由外交部次长徐漠报告了陶德曼调停的经过，讨论了日本政府所提的条件，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真想同国民党政府实行停战议和，更不是只满足于占领东北和华北，而是要独占整个中国。所谓“议和”，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就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十一月中旬攻陷上海、太原，十二月中旬占领南京、济南，而此时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

施子愉译：《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

同上

同上

《新闻报》1937年12月6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是蒋介石，汪精卫为副主席。当时国民党政府虽已迁往重庆，但实际上仍在武汉办公，蒋介石指挥军事留在南京，因此会议由汪精卫代理主席。1939年3月汪精卫发表的《举一个例》中公布的这次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是第五十四次会议，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公布的该件照片则为第三十四次会议。

的九国公约会议，也在对日本侵华战争无可奈何之中结束。美、英、法等国唯恐得罪日本，都力图推卸责任，对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者中国各打五十大板，从而助长了日本国内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使侵华日军陶德曼热衷此事，不辞往来奔波之劳，使蒋介石深深感激，然而，蒋介石集团的妥协退让，是有一定限度的。但“和谈”口子已开，汪精卫集团的“和平愿望”受到了鼓舞，于是他们穿插其间，从旁推波助澜，参予策划对日的秘密谈判。

十二月五日，汪精卫以接见新闻记者之机，发表谈话说：

“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第二天上午九时，汪精卫又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在汉口中央银行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会上由外交部次长徐漠报告了陶德曼调停的经过，讨论了日本政府所提的条件，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真想同国民党政府实行停战议和，更不是只满足于占领东北和华北，而是要独占整个中国。所谓“议和”，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就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十一月中旬攻陷上海、太原，十二月中旬占领南京、济南，而此时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也在对日本侵华战争无可奈何之中结束。美、英、法等国唯恐得罪日本，都力图推卸责任，对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者中国各打五十大板，从而助长了日本国内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使侵华日军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蒋介石害怕国民党政府会被抗日舆论的浪潮冲倒，同时日方提出的条件过多地损害了他的统治利益，因而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不顾日本规定的期限，采取拖延的办法。同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既嫉妒蒋介石对英美帝国主义地依仗，又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一切，因而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认为日方尽管提出了如此苛刻的条件，还是可以接受的，唯恐“错失良机”。在接到日方新条件后，汪精卫即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与日本谈判。但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意，责备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孔祥熙回答：“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快快而去。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如期答复接受日本的迫降条件，日本帝国主义老羞成怒。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扬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

《新闻报》1937年12月6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是蒋介石，汪精卫为副主席。当时国民党政府虽已迁往重庆，但实际上仍在武汉办公，蒋介石指挥军事留在南京，因此会议由汪精卫代理主席。1939年3月汪精卫发表的《举一个例》中公布的这次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是第五十四次会议，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公布的该件照片则为第三十四次会议。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39页。

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叫嚷“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至此，日本政府下决心除使用武力外，用扶植伪政权的办法来逼使国民党投降。一月十三日，核心内阁又举行会议，把最后通牒的时间限定为七十二小时，威胁国民党政府在这个限期内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就要消灭它或者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中去。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所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以耸人听闻的措词，指斥国民党政府至今“不了解帝国的真意”，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过了二天，日本政府发表《补充声明》，说“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同一天，日外相广田弘毅在回答国会的质询时，更进一步宣称：这个声明，“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

对于近卫声明，国民党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十八日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表示“全力以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日，日本召回了其驻华大使，中国也召回了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为之断绝。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开展建立使之能够驾驭的“与之更加充分合作”的傀儡政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已在北平炮制了以王克敏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该政权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北平、天津等地方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抄袭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模式，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朱深任司法部总长，齐燮元任治安部总长，王揖唐任赈济部总长。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本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部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部长，陈篆任外交部部长，陈锦涛任财政部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部长，任援道任绥靖部部长。此后，又积极策划南北两个伪政权合流。虽然，在日本人眼里，王克敏、梁鸿志之流是其忠顺的奴仆，但是利用国民党为其统治工具，会比他们这些早为人们不齿的北洋军阀余孽更起作用。因此，尽管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却仍在继续不断地开展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

《日中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385—387页。

日本于1937年11月20日设置大本营，并建立起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它是政府最高一级文武官员集合在一起开会以议决重大问题的方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司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都派有代表参加。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385—387页。

同上

[日]重光葵：《昭和时代的动乱》第2卷，第183页。

转引自梁寒冰、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168页。

艺文研究会

就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汪精卫集团的活动十分频繁。他们一面竭力怂恿蒋介石集团尽快接受日方的条件，与敌人谈判，一面大肆进行反共宣传，鼓吹民族失败主义，为他们的“求和”活动制造舆论。一九三七年秋冬，日本凭借暂时的军事优势，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压迫，国民党军担负着正面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实行压制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采取消极防御和依靠外援的方针，使日军得以迅速推进，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南方八省武装力量，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指示，英勇地开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牵制日军的进攻。与此同时，在广大的沦陷区及国统区，爱国的文化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汪精卫集团既震惊于大中城市的陷落，又害怕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也担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让中国共产党占上风。于是，由周佛海、陶希圣献策，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在公开的御用机关之外，建立一个和中共相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汪精卫真是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作，并对抗战表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甚至企图通过抗战，借日军之手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因此，周佛海、陶希圣的献策很快被蒋介石、汪精卫所采纳。

一九三八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李厚征为秘书，罗君强任总务组主干，陶希圣兼任编审组主干，叶溯中任出版组主干。“艺文研究会”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五万元。“艺文研究会”总部设在汉口，并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在蒋介石的允许下，“低调俱乐部”就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公开出现在社会上。

“艺文研究会”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化界人士。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更多些。叶青、郑学稼等托派分子，李圣五、樊仲云、姚蓬子等反动文人，以及后来脱离革命队伍的叛徒张国焘，都是它收买的对象。而当时的青年党、国社党两个小政党，则由蒋介石密谕，由“艺文研究会”每月备津贴三千元，分别由左舜生、张君勱具领。

为了扩大影响，“艺文研究会”还出资津贴一些人在各地办小报，如上海的樊仲云、湖南的易君左等。该会曾出版过一种艺文研究丛书，由陶希圣等人主编。据陶说，有一个时期曾指导过几十份报纸和杂志，出版好几十种小册子及书籍。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又派他们的亲信、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林柏生及梅恩平赴香港，开设国际编译社，并创办蔚兰书店。国际编译社实际上是“艺文研究会”的变相分机构，由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恩平主编国际丛书，朱朴主编国际通讯，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人称“四大金

刚”。该社的助编有张百高、胡兰成、龙大均、连士升、杜衡、林一新等。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讨论一星期内的国际时事，主要是对日情报，会后草寄两份同样内容的报告给周佛海，让他转呈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些人，打起研究国际问题的招牌，招摇过市，呼朋引类，一时间，“许多人蜗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踉踉跄跄，极为热闹”。以后汪精卫逃出重庆，在香港的这许多人如樊仲云、朱朴、张百高、胡兰成等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起投汪，成了汪精卫投敌活动的吹鼓手。

“艺文研究会”宣传些什么呢？据周佛海自供：当时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身份，“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全民族的抗战？“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是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善于巧言偏辞的周佛海自己首先身体力行。这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及其施政方针。会议发表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阐明了国民党抗战初期外交、军事、经济、民众运动、宣传教育等各方面的政治纲领，规定了制止日本侵略，加强抗日力量，发动全国民众，保障民主等政策条文，但同时又用抽象、含混的词语掩盖和坚持一套反动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抗战的领导权。周佛海即将宣言和《纲领》中的消极、反动因素加以扩大。四月三十日，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欲建国的两个要点》，说这次大会的宣言和《抗敌建国纲领》主要提了两点：一是民族国家的信仰。这种信仰要求“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换言之，就是要一切服从国民党，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二是科学的信仰。周佛海用所谓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等，暗示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武器不科学，“民族抗战”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民族失败主义的又一种形式！

在“艺文研究会”里，对“科学和理性”的宣传方针贯彻最卖力的要数陶希圣。

陶希圣与周佛海、汪精卫两人都有交往较深的历史。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一九二六年冬，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经周佛海介绍，任该校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五月，为讨伐夏斗寅部的叛变，该校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前往阻击，施存统任该师政治部主任，陶希圣先为政治部秘书，后又当该师军法处处长。一九二八年周佛海推荐陶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一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师生群起而攻之，“几被扣押”。周佛海见此情况，就让陶希圣到上海摘《新生命》月刊。期间，陶参加了改组派的反蒋活动。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在北方的政治投机活动遭到失败，又跑到广州拼凑反蒋大合唱。此时，周佛海又为陶希圣求得陈果夫、陈立夫 CC 系的谅解，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一二八事变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陶希圣即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主编《农村复兴》杂志。后又去北京大学教书。一九三七年夏，陶参加了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庐山谈话会，适逢抗日战争爆发，此后就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等人沆瀣

朱朴：《记蔚兰书店》，《政治月刊》第 13 期，1942 年 12 月 18 日出版。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民力》周刊第 4 期，1938 年 4 月 30 日出版。

一气，鼓吹“抗日低调”，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途径。陶希圣善于察言观色，政治上左右逢源，抗日战争初期，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云：“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逼法西斯帝国共都骂。”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陶希圣摇动笔杆，炮制了不少文章，其典型作品，就是在国民党机关刊物《民意》创刊号上发表的《宗教与科学》。在这篇文章里，他以所谓“科学”为幌子，把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说成是“科学战争”，他说：“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一年一年的进为科学世界。在这个世界尽头的今日，跟着第一次大战以后，演出几回的科学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在科学不发达的里面发生的，——如中国、西班牙、以至阿比西尼亚。”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陶希圣又在《政论旬刊》第一卷上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的性质与精神》一文，重弹“科学战争”的老调，他说：“现代战争，是科学的战争。日本对于我们的侵略，都是利用科学的发明。我们抵抗日本，给日本以打击，也是要利用科学的发明的武器。”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是“忽视科学的重要和对科学抱错误见解，都是一种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表现而为一哄而起的行为。”因此使科学“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种“科学战争”的谬论，完全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也抹杀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同时借中国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作为其宣扬民族失败主义的理论根据，这是典型的唯武器论。毛泽东指出：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都是道地的唯武器论者。

“艺文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汪精卫集团在组织上的进一步扩大。此后，他们的民族失败主义“亡国论”低调更加甚嚣尘上。汪精卫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对抗日。有一次，他到武昌一个训练班发表演讲，说什么“打败仗要和，打胜仗也要和，到底总是要和。”要大家放下武器，去向日本帝国主义乞求“和平”。又有一次，他更直接了当地对唐生智等人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陈春圃等人，也学着汪的腔调，以“优胜劣败是绝对真理，强权就是公理”作口头禅，说什么“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贫弱的中国和富强的外敌打仗总是吃亏：结果不是割让土地，就是赔款求和。而自己没有力量，外援又靠不住，空喊抗战，这样抗下去，一定要把整个国土抗光。”

“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因为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而又过高估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这是他们后来走上叛国投敌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1968年12月第3版，第437页。

唐生智，《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袁琳：《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未刊）。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53页。

三 高宗武穿针引线

董道宁赴日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不死心，他们既震惊于大片国土的沦丧，又惧怕日本的恫吓，也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个新政权”等声明的诱惑，猴急地想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谈判”。周佛海就说过：“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們不死心，不绝望，我們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

一九三八年二月，为了不放棄所謂“和平工作”的进行，汪精卫与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和平运动”。

高宗武是蒋介石、汪精卫对日外交活动的一个得力帮手。他生于一九〇六年。浙江温州人。从小留学日本，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被人称为中国的“日本通”。三十年代回国后，曾于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此时，中日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他发表的中日外交问题的论文，深得汪精卫赏识。汪当时兼任外交部长，便邀请高入外交部工作，先在亚洲司任科长，不久即迁升代理司长。一九三四年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关于中国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被认为是“办日本外交的能手”，和日本在华使馆官员及各方面人士有广泛的联系。由此，高宗武官运亨通，并博得了蒋介石的青睐，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周佛海、高宗武等“低调俱乐部”的伙计们，商量要“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并把这项任务交给高宗武去办。于是由胡适出面，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称他“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介石说自己知道高宗武，并准备召见他。果然，这年七月三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一起接见了高宗武，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高向蒋、汪夸下海口：“事态至今，一步错误，全东洋的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折冲之责，请交给宗武。我当以热诚，说服近卫，藉近卫的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按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

此后，高宗武就积极为促成中日“和谈”而奔走效劳。一九三七年底，高宗武根据周佛海的意见，考虑“同日本通达内心想法的途径”，“无论如何得考虑走出汉口，同日本取得联络的方法”，派了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秘密赴上海活动。

董道宁，祖籍浙江宁波，从小长在日本横滨，中学、大学均在日本就读，日语讲得很好，连日本人也很有佩服，被称为“日华人”。董道宁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后调至外交部工作，与不少日本人深有交往。这时，在上海南京路靠近外滩的惠中饭店某房间，住着一个名叫西义显的日本人。他原是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主任，与国民党政府官员及工商金融界不少人交好甚笃。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高宗武见过蒋介石、汪精卫之后，当天下午就在南京银行公会主席吴震修家里将谈话情况告诉了正在吴家的西义显，商量所谓中日“和平”问题。为此西义显专程赴大连，会见南满铁路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胡适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7页。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史》，东京文献社1962年版，第76页。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即现在上海和平饭店的一部分。

公司总裁松冈洋右，请松冈为之设法。松冈说：“事已至此，实为日中两民族宿命所定。但将来或有机会恢复和平。你能获得中国人如此信任，亦殊难得，你可待机行事。你如有意，可任意选择住地，以便与南京（中国）同志再行会面。”于是松冈洋右免去了西义显对满铁的一切事务，让他“专心进行和平工作”。同时，还给了他一笔巨款和一封介绍信，让他去东京见近卫文麿。由于此刻日本正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中国军民奋力抵抗，因此“谈和”活动无从开展。西义显只好返回中国，住于上海惠中饭店。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董道宁敲开了西义显的房门，两人本来就很熟悉，应酬一番之后，西义显就问：

“以你的地位，这时在上海出现，我认为意义重大，不能视为寻常。”

董道宁假意说：“我对于世事，已经厌弃，闻你也在上海，故我来与你闲谈。”

当然，这话又那能骗得过西义显呢？西义显接着说：“你所说的我只承认一半，其余一半当系为陶德曼交涉之让步而来吧！”

董道宁见西义显既已挑明了自己赴沪的目的，就不加掩饰地回答：“这却是事实，我素来被认为‘日华人’，此时除希望这种交涉成立外，世事真不可为。我曾看川越大使，努力促成交涉，但毫无效果。”

由于双方关系密切，西义显即向董道宁建议：

“你已经到了上海，趁此机会，赴东京一行如何？”

“到东京去？”董道宁表示惊讶。

西义显鼓动说：

“以交战国外交官之身份，既秘密来上海，会见敌国大使，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赴东京直接说服敌国政府，理义虽同，而效果则更大。”“对于你的行动秘密，我负绝对责任，其实较你在上海之保守秘密更为容易。你若有此决意，我当先赴东京，游说日本中央要人，为你先容。你以个人名义赴东京，但你是以亚洲司第一科科长之资格前去，东京自当感激。这与办交涉不同，而是以中国民族之诚意，打破日本民族的固陋，使民族与民族血脉相通。今日之悲剧，系由两民族缺少互信而起，你赴东京，即表示中国人信任日本人，为建筑信用之第一步。两民族能互信则生共感，东洋之社会始能走上构成之路。”

董道宁听后，为之动情，决定赴东京一行。一月十七日，西义显将此消息报告了在上海的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局长松本重治。松本当即表示，如果董道宁到日本去，他非常赞成。并亲自前往惠中饭店见董道宁，进一步鼓动：“第一钦佩董的勇气，第二我认为这次访日旅行对两国有重大的意义。就 e 这样置于不相往来的状态是不适宜的。……如果战争延长下去，日本将要一天天地堕落下去，我祈愿能够早一天停战，你的访日说不

松冈洋右（1880—1946），1935年至1939年间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史》，第79—80页。

即川赴茂（1881—1969），1936年6月22日起任日本驻华大使。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史》，第91、95—96页。

同上

1938年1月1日，同盟通讯社把上海分社升级为中南总分局，除上海外，分管南京、广东、香港等地的同盟通讯社机构。松本重治由上海分社社长，升为中南总分局局长。

定是为了挽救日本的第一步。……如果会见适当的人，收获是很多的吧。我深信不疑对中国也是有用的。”松本建议西义显速返日本，与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联系。一月十九日，西义显乘坐上海至长崎间的日轮回国，他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影佐。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贯彻其侵华灭华方针下，历来就有两条不同的路线。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内部就分为“激进”与“缓进”两派：激进派主张“老虎政策”，缓进派主张“水鸟政策”。所谓“老虎政策”，即妄想迅速以武力压迫中国使之屈服投降，所谓“水鸟政策”，即喻之为象一只水鸭游在池中，表面看来十分安静，底下却在不停的行动。卢沟桥事变后，这两派演化成“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前者夜郎自大，不把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放在眼里，他们以不战而占领中国东北为依据，叫嚣要依靠武力，平定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后者以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为首，认为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必须推迟。石原莞尔生于一八八九，是日本山形县人，早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陆军大学兵学教官、日本驻德国武官。一九二八年任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原来也是一个积极发动侵华战争的法西斯军人，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然而，他在长期侵华活动中，对中国有了较多的了解，也看到了日本目前的国力还不足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主张“把对中国强压，改为友好拉拢”，待实力具备后，“再改为积极方针”。

在石原莞尔的影响下，影佐祯昭也主张对华不扩大方针。后来，石原莞尔被排斥于参谋本部之外，影佐就成了该部不扩大派的中心人物。由于这个缘故，西义显一到东京，即赴横滨影佐私宅，双方进行了如下谈话：

西：“影佐君！你知道董道宁吗？”

影：“不知道！”

西：“现在汉口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内部发生第三势力，拟作日华和平之媒介，董道宁是其代表人物。他已到上海，拟来东京。”

影：“你不要再说梦话，真有这个人吗？”

西：“我在上海曾会到他，本拟与我同来。但恐东京尚不了解，故我为之先容。若你此时不捉住日华和平之端绪，影佐祯昭似无存在之意义，你能决心干吗？”

影：“这个人真来吗？”

西：“一定来！”

影：“那么，我当然干！”

西义显得了影佐祯昭的承诺，自己就留在东京接待，令他的助手伊藤芳男急赴上海，为董道宁赴日代办入境手续。

经过二、三周的准备，二月十五日，董道宁在伊藤芳男的陪同下，到达长崎。在日方的安排下，董道宁先后与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及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进行会谈。他们向董道宁表示，虽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但由于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趋势，日军内心的真正意向无疑地是想迅速招致对华和平。”

董道宁在日，一晃十来天过去了。临走前，影佐祯昭特地赶列车站送行，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东京中央公论社 1975 年版，第

[日]今冈丰：《石原莞尔之悲剧》，第 335 页。

还写了两封亲笔信给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年级同学何应钦、张群，托董带去。信中写道：

“要解决日中事变，不是用条件做交易所能解决的。

无论日本和中国，都必须互相赤诚相见。”

“如能有这样的态度，把过去的事情付之流水，披沥诚意，赤诚与日本相会，则深信

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应有赤诚握手的气概。”_影佐祯昭企图让中国的亲日派听凭日本侵略军的任意扩张、掠夺，肆无忌惮地烧杀奸淫，而无条件地、“赤诚地”去和侵略者“相会”、“握手”。自始至终作为日汪和平运动的主要导演者，影佐所规定的标准，正是贯穿着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全部活动的一条主线。

三月五日，董道宁带着影佐的信，在西义显、伊藤芳男的陪同下，离开东京。三月七日由神户乘“乌苏里号”轮船赴大连。在船中，三人相约“为了表现进行日中和平运动的盟友的誓言”，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二郎”，伊藤芳男为“三郎”，而高宗武、松本重治为“四郎”、“五郎”，这是以后的事。

就在董道宁离开日本之际，高宗武也秘密从香港赶到上海。原来，在董被派出去后，周佛海又以在汉口难以搜集日本情报为由，向蒋介石报告，派高宗武到香港活动。蒋介石同意，还召见高，命他向外交部“请假”。随之，陈布雷即命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罗君强，为高宗武准备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特派员”的衔头，以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蒋介石还每月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经费六千元（约合两千美元），由罗君强持蒋介石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

高宗武名为日本问题研究会主任，实是在觅寻打通日本的路线。因此，他一到香港，就延长了自己的旅程，秘密到了上海，在国民党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家里，约见了松本重治，打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的发表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这个姿态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三月十五日，董道宁与伊藤芳男到达上海，第二天下午，高宗武、松本重治即在华懋饭店的一间房子里会见了董道宁和伊藤芳男。董汇报了赴日情况，高宗武极为专心，“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谈话间，伊藤芳男介绍了他们三人的互相称呼，松本重治乘机向高宗武提议：“宗武，你如果不反对，你做‘四郎’，我做‘五郎’怎样？”高笑着回答说：“‘四郎’也行，假如你是‘五郎’的话。”接着，他们又把影佐祯昭称之为“六郎”。从此，在影佐祯昭等人的诱降拉拢下，由高宗武穿针引线，终于沟通了与日本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

按照董道宁的想法，影佐祯昭写给何应钦、张群的信，由他回汉口面交。但高宗武不同意。高认为这样做容易失策，他说：“如果冒冒失失地干下去，董和我都要被整，这，不绝对慎重处理不行啊！”于是，他们决定月底前南下香港，待一起商量后再决定。

即现在的上海和平饭店。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271页。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271页。

浅水湾旅馆中会面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在香港一家豪华的避暑旅馆——浅水湾旅馆内十号房间，高宗武、董道宁及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男开始会谈。会谈从上午十一时起到下午六时，围绕中日“和平”谈判的主题，一直谈了七个小时。

据松本重治回忆，会谈一开始，就由高宗武说明在汉口的国民党中枢方面的情况，对陶德曼调停经过和蒋介石、汪精卫的意见，作了介绍。他说，当蒋介石接到陶德曼送来的日方条件时，即召集在南京的将领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讨论，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是这样的条件，那么为什么要打仗呢？”顾祝同说应该接受，唐生智也说如果各人都赞成，他也没有异议。会后，蒋介石接见了陶德曼，蒋认为日本不可相信，但是如果在德国始终担当调停者的条件之下，那么可以考虑以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至于汪精卫，高宗武介绍他曾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同意以日方所提条件作基础，进行谈判。高宗武强调说，他之所以将这些情况向日方报告，是为了使在坐的日本人“了解中国方面对陶德曼大使所转达的广田外相的和平条件，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是面向和平的。如果日本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是已经走到和平的大门口了。”

听了高宗武的介绍，松本重治与西义显接着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说近卫内阁在日军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当时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直至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然而，对于那个声明，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即可以说是“和平派”的多田骏参谋次长、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和堀场一雄少佐等人一直待“猛烈反对”的态度，甚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权”。虽然其结果仍为“扩大派”所排斥，但由于董道宁在东京的活动，使多田、影佐等对于“和平”的愿望越来越加强了。松本重治和西义显认为，作为日军统帅部的现役军人影佐祯昭，他能够直接写信给何应钦、张群，证明他有着“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他们希望高宗武对此认真考虑。

于是，这几个人得出了一个相同的见解：中日两国间的“和平”意向如果能信息相通，加上两国“和平派”的交互作用，中日间的“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充分具备的。这时候，高宗武又向日方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和平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男三人一听高的话，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兴奋异常。最后，中日双方又讨论了如何把影佐的信件送交汉口的何应钦和张群这一“悬案”，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按照高宗武的意见，将信件不先直接给何、张两人，而是由周佛海转交给蒋介石。于是，会谈结束。第二天，高宗武、董道宁从九龙的启德飞机场乘机飞回汉口。西义显随即去东京，大约十天以后，又到达香港，等待高宗武的答复。

高宗武回到汉口后，立即向周佛海汇报了与日方接洽的情况，并让周看了影佐的信。周觉得很受鼓舞，“加强了他实行对日和平的决心”。两人商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279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5页。

量之后，又拿给汪精卫看。汪认为，这是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以给蒋介石看为好。于是通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把这两封信丈给了蒋介石。蒋命高宗武再去香港，说：“把这一主要意思传给日本，我们并不是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

三星期后，四月十六日，高宗武从汉口到达香港，在浅水湾旅馆再次会见西义显，郑重其事地声称：“蒋委员长（即蒋介石）读了影佐大佐之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以口头传递委员长之意向。”高对蒋介石的“意向”，作了如下传达：

“影佐大佐致张群、何应钦之书简，已看过。向敌将致书，等于以武士之生命交予敌将，而影住敢于出此，足证其对于两国和平外交之诚意，至为铭感。对其诚意与勇气深表敬意。”

“我方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请予安心。”

“以我（蒋自称）自己对日折冲多年之经验，这次董道宁与高宗武所携回的报告，最使我感觉日本之诚意，故我自己亦披沥诚意，以求了解。”

“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若我的真意能承你们了解，我有考虑下列条件之意：

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

这两项趣旨，原则上可予承认。

第一项更分类如下：

（1）东北四省；（2）内蒙；（3）河北、察哈尔。

（1）（2）两项可留待他日协议。（3）须绝对的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领予尊重。

若上述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

高宗武一再强调，上述提案是蒋介石亲口告诉他，希望西义显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马上转告影佐。

四月二十七日，西义显由香港回到东京。在参谋次长室，多田骏次长、本间雅晴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出席，影佐与伊藤芳男列席，西义显报告他与高宗武接洽的经过，以及高所提出的条件，然而讨论时，被称之为“事变不扩大派”的首领多田骏次长却保持缄默，甚至连影佐祯昭也不发一言。

原来，此时东京的情势已发生了变化。三月底至四月初，侵华日军在台儿庄战斗中被歼二万多人，损失惨重，正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徐州，气焰嚣张。在这种气氛下，影佐没有表态，西义显也就只好空手而返，将东京的“实情”告诉了高宗武。同时，西义显还带来一个消息，即日本因看出对华战争有长期化的危险，为了对付中国的持久抗战，即将改组内阁，重新策划其对内对外政策。西义显要求高宗武亲自赴东京，向日本当局“游说”。

周佛海：《和平运动之前后》，东京《日日新闻》1940年11月。转引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12页。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史》，第135—136页。

五月底，高宗武又返回汉口，同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商讨对策。这时，日本近卫内阁果然实行改组，宇垣一成继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宇垣生于一八六八年，冈山县人，陆军大学毕业。历任清浦、加藤、若槻各届内阁的陆军大臣。一九三一年发动“三月政变”未遂，退入预备役，是一个被称之为日本军人的“中庸派”人物。宇垣对英美较亲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力量也有一定的认识。卢沟桥事变后曾主张“不扩大”方针，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去实现侵华的战略总目标，以保持力量对付苏联。据战后公布的史料，宇垣答允出任外相一职曾提出过四个条件：（一）内阁统一强化；（二）对华外交一元化；（三）开始与中国政府和平谈判；（四）取消一月十六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得到首相近卫文麿同意后，宇垣才同意出任外务大臣一职。上任后，宇垣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施放钓饵。对此，蒋介石集国表示欢迎，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电贺宇垣出任日本外相，实现中日“友好亲善”的夙愿，并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而汪精卫集团更显得倍受振奋。周佛海认为，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较大的可能性，于是频频劝说高：“到东京去一趟怎么样？”高宗武跃跃欲试。但这时，蒋介石已在考虑自己另派亲信到香港，和日本接洽和谈。原来，蒋害怕高宗武往返次数太多，为外间所闻，要遭到舆论的谴责，使自己被动。同时，蒋还担心如再派高去香港，可能会被“和平派”所利用，因此很犹豫，准备不让高再去香港，而让他仅在汉口活动。在蒋介石看来，无论是“和”是“战”，都得由他负责，而不许他人染指。如果因高宗武的活动而促使汪精卫与日本相勾结，这对他的地位，不能不是一个威胁。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蒋介石的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陈布雷将此情况暗中告诉高宗武。高正在兴头上，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沮丧，急忙向周佛海求计。周佛海认为中日“和平”有望，不能就此撒手，就给高宗武打气：

“蒋方面由我负责，你应该断然到东京去！”

“你只有快走。这件事外面知道得多了，你要负责。好事成功，大家高兴，万一不顺手，老头子（指蒋介石）会为你负责吗？”

高宗武给周佛海这么一吓，便于六月初行色匆匆地再次赶到香港。虽然高宗武此行未经蒋介石的同意，但陈布雷认为高的任务尚未完结，因此仍批准照发其活动经费。六月十四日，高宗武与西义显在香港九龙广东酒家会面，双方订立了保证今后共同行动的《觉书》，其内容如下：

- 一、鉴于日华两国内部事情，为伸介和平，计划第三势力之结合。
- 二、第三势力，对于互相交战之日华两势力须保持公正妥当之立场。
- 三、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其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这种条件为和平之前提，并为使和平伸介能以成交之条件。因此希望日本方面确立

进步的指导势力，使此势力确约上述条件之实现。

四、第三势力于达成和平仲介之目的时，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统一中国之实现。

所谓“第三种势力”，说穿了就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而日本方面的所谓“进步的指导势力”，亦即影佐祯昭等的“不扩大派”。

《觉书》签订后三天，六月十七日上午，松本重治也从东京到达香港，与高宗武再次会谈。而人一致认为，“和平运动”的“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高宗武甚至提出“日本方面如果声明在一定期间内撤兵，仅仅有这个声明，和平运动必定成功”。高还讲了自己的设想：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由各种“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从“各方面响应”。这样，就可使汪的“和平运动”变成全国性运动。松本重治听后，表示希望高宗武一定去东京，以实现他的上述计划。于是，高宗武决定背着蒋介石，亲自前往东京。

高宗武登上“皇后号”客舱

为了准备高宗武赴日，伊藤芳男先离开香港到上海，给高和他自己预定了日本“皇后号”客舱。这艘轮船将于七月三日凌晨二时或三时启航。所以乘客非得在半夜十二时上船不可。

然而，对于这笔买卖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高宗武感到茫然。自从南京失守以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对日外交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国民党内所谓“主战派”与“主和派”的阵线也日趋明朗化。高宗武觉得自己被夹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当中，心情十分苦恼。他曾向松本重治透露过自己的这块心病：“两位前辈（指蒋、汪）的意见似乎越来越距离越大，所以我的痛苦也将更加厉害吧。关于日中和平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着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内心的矛盾，使他一度对东京之行产生了动摇。

这天晚上，在汉密尔顿大厦的寓所，松本重治正吸着烟斗，等待着高宗武的到来。十时许，一个戴着黑色眼镜、矮个子、高颧骨的人前来见松本。此人就是高宗武。他一进门，松本就问：

“精神好吗？”高宗武的严重肺结核病史，松本是知道的。

“健康靠得住。”高自信地回答。但松本从高失神的目光中，感觉到高情绪上的变化。问道：“怎么了？”高果然尴尬地笑了笑：“阿重（高对松本重治的昵称），其实我是来商量的。”

“商量，商量什么？”

“我考虑了各种情况，我正在想是否停止到日本去。”

“啊！这是为了什么原因？在香港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但是……”松本以惊奇的目光盯着高宗武。

“我怕你责备，踌躇不定，总之我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宗武，你有你的想法吧，我是尊重它的。但是伊藤已经等在船上，西似乎与影佐先生等作了各种准备。”松本重治怕高宗武中途变卦，带着规劝的口气继续说：“日本方面约定绝对不把你们作为汉奸。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们、你们不都是可以中途停止吗？你与蒋先生的问题，佛（指周佛海）不是说由他负责吗？你到东京，为了中国永久和平的福利，日本的朋友们是应该极力为你辩护的。而且，对日本应该要求的東西还是应该要求的。你到东京去绝对不会成为你的失败。我可以绝对保证。你应该做非你不可的事情。自从通邮问题以来的你的勇气，正是应该在这时候大为振作起来。”

听了松本重治的一番话，高宗武继续问道：“我也不想成为汉奸。如果是这样，阿重，不再加以重新考虑吗？”

“宗武，时间只有一小时了，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事实上，要乘船就非得通过外白渡桥不可吧？如果被那里的陆战队哨兵盘问，我担心会不得了。我听说夜里警戒更加严重。”高宗武还害怕上船前会被查出来，因此想打退堂鼓了。

其实，松本重治早已对此事作了精密的布置。他请高宗武喝下一杯送行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293—294页。

即现在的上海大厦。

指高等武参加与伪满洲国通邮的谈判。

酒，然后不慌不忙地说：“我的所谓计策是，首先把我的军官待遇的从军记者的证章带在你的身上，帽子也带我的。为了预防万一起见，先把我的名片也放在你的衣袋里。而且哨兵是站在左方，汽车左边的座位让我坐，你坐在右侧。车上插着同盟社的旗帜开行。以后的事，你交给我办就是了。”

高宗武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催着松本快走。就这样，载着高宗武的汽车顺利地通过了外白渡桥，直驶日本“皇后号”停泊的码头。高登上客舱，与等在那里的伊藤会合，一道前往日本。

七月五日，“皇后号”抵达横滨。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高宗武被接到东京，住在麻布区住友公馆建筑古雅的贵族别墅里。这时，陆军省也已改组，由板垣征四郎任陆相，东条英机任次官，影佐担任了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兼任陆军省军务局课长。军务局是陆军省内最有权势的一个局，局长中村明人，对影佐十分器重，因而，影佐等于兼任军务局长，深受板垣信任。陆军省的这一布局，使高宗武的赴日，达到了汪精卫集团所意想不到的后果。

高宗武经影佐的引导，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高宗武发现，日本对蒋介石既想要跟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强烈不满，因此表示不能同意与蒋进行谈判，而寄希望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高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于是，高宗武要求近卫写一封亲笔信致汪精卫，保证“日本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但近卫认为一国内阁总理如这样做，未免过分，至少为时还早。所以只允许由陆军大臣板垣写这封信说明此意，托高交代。与此相配合，七月十二日，日本内阁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为使敌人（指中国）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要“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要“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等策略。接着，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五相会议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进一步提出，在军事上应“促使中国军队投降，加以笼络，使其归顺，并发挥其反蒋、反共意识”，“尽量使众多的中国军队同日军合作，尽量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在政治及外交上，要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298—300页。

[日]影佐祯昭：《漫谈》。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89—390页。

并“使其跟随帝国的外交方针，签订防共协定”；在经济上，要“根据日满华互通有无的原则进行开发，努力为完成三国经济圈而向前迈进”；在文化上，要“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同时，特别强调日本“必须在实质上抓住必要的交通事业”，使铁路、水运、航空、通讯等，统统“掌握在帝国势力之下，不遗余力地完成军事任务”。此时，日本政府已经明确决策用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侵略，并规定了诱降活动的具体目标，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这样，高宗武的东京之行，就为汪精卫集团直接与日本勾结以至后来的叛国投敌，开通了路子。

七月九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从长崎乘船到上海，因咯血，住进了杨树浦医院治疗。待身体稍好，即于八月下旬回到香港。高知道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私自赴日，恐被蒋扣留，不敢回武汉，就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周佛海接到报告，立刻与汪精卫密商。汪精卫一看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虽然感到“吃惊”，但心里是高兴的。不过汪此时还未下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的决心，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并想借此再试探一下蒋介石，便对周说：“将报告原样交给蒋”，他表示：“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但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方无异是要他下台，十分恼火，将高宗武的报告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精卫看。

两、三天以后，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大发雷霆，骂道：

“高宗武是个混蛋！是谁要他到日本去的？”蒋命陈布雷马上通知高回汉口，其活动经费立即停发。

然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已经摸到了日本政府的底，决心继续干下去。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90—391页。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9月版，第166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0页。

据罗君强回忆，高宗武的活动经费，由陈布雷命他持蒋介石之手条向军需署代汇。当时统制外汇，一律需经中央银行才能寄出款项，罗就以军委会办公厅名义致函中央银行照汇。1938年7月，时任行政院长兼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知道后，醋劲大发，居然向蒋介石提出质问：你派高司长赴国外，何以不让我行政院长知情，大揽纱帽。接着，外文部长王宠惠也跑来问蒋介石：“委员长是不是派了高司长宗武的公差？他已久未到部了。”蒋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前次听说他夫人在香港生病，他曾想请假去看看。他现在不在汉口吗？”王宠惠碰了个软钉子，不敢再问。但这一来，叫蒋介石难堪，他一气之下，立即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并命高立即回汉口，以图掩

四 重光堂鬼影幢幢

梅思平出场

八月下旬，高宗武回到香港后，他的结核病复发，病情时好时坏，与日方继续密谈的任务，就由梅思平替代。二十七日早晨，高宗武在与松本重治共进早餐时，把这一变动告诉了松本：

“阿重，我的健康目前是不能东奔西走的了。我与周佛海商量后，由一个叫梅思平的人代替我，关于和平运动的各种事情，请你与他认真地谈谈好吗？”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松本感到非常为难，他说：“我不能同不知底细的人谈话。”对此，高宗武作解释说：“梅思平与周佛海在一起，也是一同考虑和平有半年以上的人了。是周佛海保证推荐的，你也容忍一下，与他谈判吧。”

于是，松本重治才勉强答应说：“那么，我继续与梅思平商谈，但商妥以后，我向你报告。明天二十八日是星期天，请告诉他从二十九日起干吧。”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历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战前曾任江宁实验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为蒋介石所赏识，成为CC系重要干部之一。抗战爆发后，梅思平参与“低调俱乐部”活动，与周佛海等一起密谋策划对日“和谈”。一九三八年年初，梅奉命赴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但他对这项工作不感兴趣，颇感寂寞，静极而思动，因此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周佛海、高宗武交给的与日方直接谈判的任务。从此，梅思平也就成了汪精卫集团“和平运动”的一员干将。梅思平后来公开投敌，他的一个正在温州女中读书的女儿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气愤，当即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文章，意思说：“梅思平不是我的父亲，我要捉拿他，杀掉他，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篇文章，一时全国报纸杂志相争刊载，传论极为普遍。

八月二十九日，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岛酒家举行第一次会议，由“日语好得惊人”的周隆庠作翻译（此后几次会谈均由周作翻译）。会议一开始，松本为了要判断一下梅思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故意谈笑风生，显得十分轻松，使梅毫无拘束之感，于是就“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把他生平得意的就任江宁县实验县长时的事情吹了一通，说他由于当了个差使，负了债，但因此被蒋介石看中。并介绍自己在南京陷落之前就与周佛海等开始商量“和平”问题了。在会谈结束之前，松本又有意识地把中日和谈的核心问题：撤兵问题简要地说了他的想法，他说：“和平运动成功与否，在于撤兵；为了撤兵，日本方面认为蒋介石有下野的必要。”对此，梅思平持异议，他断言：“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蒋下野的形式，那是笨拙的做法。”

梅思平所言，不是毫无根据的。抗战以来，蒋介石不仅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权力，而且成了中国战场的“最高统帅”，他的抗日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如果日本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撤兵的条件，这样既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305页。

天戈：《群丑现形记》，正行出版社1945年10月再版本，第20页。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307页。

不能达到预期的“和平”目的，还会适得其反，使汪精卫集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同时，即使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收拾时局。这也是汪精卫集团最初特别强调决不把“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的理由之一。

由于这一问题关系甚大，梅思平要求松本重治于下次再从容谈论。为了不被人跟踪，梅思平提议将下次会议改在格罗斯特旅馆举行，取得了松本的同意。

第二天下午，在格罗斯特旅馆里，梅思平和松本重治进行第二次会谈。对撤兵和蒋介石下野问题，梅思平一口气作了如下发言：

“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本方面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即使说日本方面声明撤兵，并且现实上已经部分撤兵，然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绝对反对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没有止境。……内战中，国共的胜败如何，这是第二位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在保护民生。从汪兆铭开始，周佛海、陶希圣、胡适和张君勱等都有同样的见解。根本的问题是人道问题。松本，你精通中国的事情，对此不会不知道吧。”

梅思平从听谓“人造”出发，标榜他们“倡导和平”的目的，是为了“考虑中国的民生”；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作为借口，乞求日本在不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条件时实行撤兵，这是汪精卫集团在求和活动中常常打出的两块招牌。

梅思平说完，松本立刻表示：“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松本话锋一转，又接着说：“但是我有两个替代的方案请你考虑：第一是蒋介石的下野由中国方面去处理，第二是承认满洲国。关于第一点，以撤兵声明为杠杆，大大强化中国方面的和平运动。如果反对继续抗战的舆论加强，那么最后蒋介石不是有了名分可以下野了吗？关于第二点，日本政府和国民到现在已有七年的时间，一直把‘日满华合作’这一口号作为国策的象征。所以作为撤兵以后的条件，日本方面必定主张承认满洲国无疑。即使是蒋介石的本心，抗战的目的在于长城以南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因此，东北四省不是可以根据情况怎么都行吗？”

说到承认满洲国，梅思平立即说：“东北四省如果‘赤化’了，我们也感觉到非常危险。如英国之类的国家也担心此事，曾叫李兹罗斯提出这一点。”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的，但决不能交给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汪精卫集团正是按照这样的信条行事的。

第三次会谈，双方在中国人经营的一家小旅馆里举行，讨论了撤兵所需要的时间以及例外驻兵区域问题。松本重治强调撤兵的时间至少要一年半至两年，他警告梅思平：如果过早撤兵，在撤兵区域内就一定会发生中央军（指国民党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互相争夺的事情。因此，驻兵是防共的必要，尤其象华北和蒙疆那样的地方就非得驻兵不可。梅思平对松本提出的撤兵原则表示同意，但他认为，如果日本“例外”过多，不仅以华北、蒙疆，也可

指当时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309页。

同上

以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以及华南沿海岛屿作防共地区，那么原则就会变样。梅思平要求松本对此加以注意。

第四次会谈在另外一个中国人经营的小旅馆举行，主要围绕如何消除抗日排日的宣传和教育问题进行讨论。松本重治承认，抗日排日的宣传教育是由日本的武力侵犯引起的，“匡本则可治末。中共和救国会 即使再做多少有效的宣传，火种熄灭了，火焰也自然而然地会熄灭。如果撤兵，就一切解决了。”因此，“日本对中国的看法非重新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可。此后，中国对日本的想法也会一百八十度转变。”梅思平对松本的这番话也表示赞同。

第五次会谈的地址又选在香岛酒家，两人对前四次的会谈进行了总结。最后，松本重治问道：“如果日本决定撤兵并作出声明，你们的和平运动怎样进展呢？”梅思平又详细地说了自己的看法：“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并表示要拼命地去干。就这样，从八月二十九日起至九月四日，梅恩平替代高宗武与松本重治进行了五次会谈，双方所确定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即将进行的日汪重光堂会谈的基础。梅思平的出场，把日汪之间的秘密勾结活动又朝前推进了一步。

从此，东京、上海、香港间，双方往来频繁。此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随国民政府搬到了重庆。十月二十二日，梅思平从香港回到重庆，将与日方商谈的结果通过周佛海、陶希圣向汪精卫作了汇报，以“促汪奋起”。汪精卫感到振奋，大喜过望，加快了他与日本暗中勾结的步伐。

即中国人民救国会。其前身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为沈钧儒、邹韬奋等，以宣传抗日，提倡民主为职志。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311页。

同上。

土肥原计划的破产

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其中土肥原贤二的工作最为突出。

土肥原贤二，一八九一年八月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陆军少佐的家庭。一九一四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后又当选送陆军大学深造。一九一二年十一月陆大毕业后，任参谋本部部附，被派驻北京，开始其特务生涯，一九三一年八月，就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与关东军领导机关合作，积极制造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满洲政策”的主要决定者之一。一九三二年，他又一手策划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逃往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此后，土肥原又勾结驻华日军，参与策划华北一系列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土肥原曾任第十四师团师团长，亲自指挥侵华战争。对这个日本法西斯军人、特务头子一身而二任的土肥原，中国人憎恨他，斥之为“土匪源”。一九三八年六月，土肥原调回参谋本部供职。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解决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各派出机关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状况，组成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陆军派出的土肥原中将，海军派出的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派出的陆军退伍将官板西利八郎中将，经三中将协商，由从事于中国特务活动二十多年之久的土肥原负责。因此，外间称该委员会为“土肥原”机关。该委员会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幢西式洋房里设立办事处，后由土肥原将此处命名为“重光堂”。

“对华特别委员会”一成立，土肥原立即带着特殊的任务，从东京赶到上海，计划策动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人为未来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以便在“临时”、“维新”政府之上，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从而“和平地”把中国推入日本侵华战争的轨道。

唐、吴、靳三人成为土肥原工作的对象，不是没有原因的。靳云鹏，生于一八七七年，山东邹县人，字翼青，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此人受袁世凯信任，曾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山东都督。一九一九年后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总理等职，成为当时煊赫于世的风云人物。一九二二年底因北洋军阀内部派系之争下台，此后一直在天津租界内过着寓公生活。但他不甘寂寞，又与日本人联合投资创办了济南鲁丰纱厂等企业，以此关系，使他与日本各类人物有了往来。

吴佩孚生于一八七四年，山东蓬莱人，字子玉，清末秀才。一九一六年任新军第三镇曹錕部管带。辛亥革命后因与护国军作战“有功”，升任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并被袁世凯晋升为陆军中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在直皖、直奉战争中，率部打败皖系、奉系，掌握直系军权，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等职；驻洛阳，操纵政局。一九二三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一九二六年冬，吴佩孚的主力被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打垮，率残部退至四川，依附于杨森等川军。九一八事变后，辗转至北平，隐居于什棉花园。这位素以儒将自命的吴大帅，一面写诗作画，讲述春秋易礼的微言大义；一面却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在家里成立了“正一堂”，扶乩降经，以神道论教，团结旧部，联络各方，足见其“雄心”未已，他想

乘国难之机，以重整旗鼓。吴的政治地位及其当时的动向，不能不引起日本特务的注目。

尤其是唐绍仪，他最为土肥原重视。唐生于一八六六年，广东香山唐家湾（今属珠海市）人，字少川。为避溥仪讳，曾改名绍怡，辛亥革命后恢复本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曾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总办，邮传部左侍郎等职。一九一二年三月任中华民国内阁第一任总理，为标榜政党内阁，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六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横，愤而辞职。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后又被推为七总裁之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因与蒋介石关系不好，长期寓居于上海。抗战爆发后，与汉奸温宗尧及土肥原等人均有往来。

九月下旬，土肥原在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同唐进行了会谈。在他的引诱下，唐跃跃欲试，准备登台。并由他女婿岑德广代表其对外活动。在这期间，唐为了出山“收拾时局”，草拟了种种方案。

先看唐方关于《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永久和平之方案》。该《方案》提出以“唐绍仪氏为中心”，并向日方提出了组织统一政府的条件：

- （甲）中日必须永久亲善，以备应付世界；
- （乙）应早谋停战以保存东亚力量；
- （丙）必以自主政治之力量，遏止排外思想及行动；
- （丁）平等的经济合作；
- （戊）联合中日实力以抵御外患。

同时，唐方又要求日方应注意下列数点：

- （甲）日本既有不承认蒋政权之宣言，即应遵照宣言迈进，傅以中国统一政府而为将来之对手；
- （乙）尊重中国统一政府之政治独立；
- （丙）先提出解决中日问题之草案，傅双方负责人研究，获得谅解。

再看唐方对未来政府的设想。关于基本国策，唐方提出“以防共睦邻为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继续实行”。关于政权的政治体制，唐方拟定政府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标榜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对于各地方政府，规定必须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惟华北之情形特殊，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但须不背国民政府之意旨，而受国民政府之监督指导”。关于军事，唐方提出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之必要”，建立国防常备军八十八万人。关于财政金融、各种税收、对外贸易等，规定均由新国民政府“统一支配”。唐方所制订的这套设想虽未公诸于世，但与后来汪精卫集团对日交涉过程中提出的方针，却十分相似，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汪伪档案。

同上

除此而外，唐方对所谓“干部人才”的罗致，“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事项的注意点，反蒋、倒蒋计划，中日关系，以及唐绍仪登台前准备发表“和平救国宣言”的提纲，甚至对新政府的组织系统，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划。

不料，唐绍仪与土肥原之间的秘密勾结活动，为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机关所侦知。就在土肥原计划即将付诸实施之际，九月三十日，军统局特务分子谢志磐等，装扮成古董商，利用谈生意的机会，在唐家的客厅里，举起利斧将唐劈死，然后从容逃逸。

唐绍仪一死，土肥原在上海失去了工作对象，当即离沪北上，着手进行吴佩孚和靳云鹏的工作。靳当时正隐居于天津，对土肥原的“邀请”，他表示响应。但日本人认为靳在地位和声望上都远不如吴佩孚，因此，土肥原将北上工作的重点放在吴的身上。但吴坚持以日本从中国撤兵，作为自己出山的条件，并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黄河以南的开封地区及山东境内招兵买马，以扩大个人的武装力量，这是日本方面绝对不会答允的。加上“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与吴佩孚之间犹如冰炭，在华北日本派遣军的暗中支持下，王总是从中作梗，也造成了土肥原机关与华北派遣军之间的矛盾。因此，对吴佩孚工作的展开极不顺利。事情持续了大约半年多，土肥原灰心丧气地承认：“可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希望了！”

土肥原计划的失败，为影佐祯昭等人开展的对汪工作造成了有利条件。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际，当董道宁、高宗武相继赴日，影佐等人已经着手于汪精卫出马的活动时，由于日本军政当局对汪的工作成功与否还不敢寄托太大的希望，因而积极地推行土肥原计划。但这一计划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相反，对汪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之中，于是，日本政府才逐渐将诱降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国民党内汪精卫身上。十月底，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广州，但战争长期化的局势，给日本法西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使其深感财力、兵力的严重不足，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和外交上越来越孤立的处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对华国策”，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修改了对华策略，转移其主要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再次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提出所谓建立以中日平等合作关系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假惺惺地表示，说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并期望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野心和争夺”。并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从而修改了第一次对华声明所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

这就是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这一声明一出笼，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严正驳斥，也为许多国民党人士所抗议。蒋介石集团鉴于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也对日方要求“更换人事组织”，迫他们下台感到难堪，因而满怀怨愤地作出反应，于十一月十三日重申“继续抗战”。然而，汪精卫集团听到这个声明，却认为是日本为促成汪精卫早日出马而进一步展开的和平攻势，就象加

[日]晴气庆胤：《上海恐怖机关—76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80年4月版第23号。

近卫文麿第二次对华声明：《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1938年11月3日），[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1页。

服了一帖兴奋剂，使汪精卫集团的投放情绪达到了新的高涨。

汪派的“和平”舆论

汪精卫集团的对日“求和”活动，是随着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的加紧而逐步活跃起来的。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当高宗武东京之行结束后，周佛海就曾向汪精卫进言：“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因为中国方面尚有一二百万大军，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消灭，后方尚有如此广大土地，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被征服，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

汪精卫叹道：“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

撕下所谓“为中国”的假面具，这段谈话如实地现出了汪精卫集团当时对日乞和的迫切心情。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虽然他们已知道了日本要求汪出马当对手的意图，但对日方的要价仍然不甚了了。同年十月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多次密谈，初步获悉了日方的某些条件。尽管，这些条件仍是表面的、初步的，但对汪精卫集团来说，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成为汪日勾结的又一次突破。

这时，抗日战争的整个局势，也使汪精卫集团更加灰心丧气和坐立不安。八月初以后，日本侵略者正积极地向中国的华中、华南推进，在长江南北日军兵分五路展开了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进攻，经过二个多月的攻击，于十月下旬攻占武汉，并不战而占领广州。在此前后，国民党军大批向西南撤退，士气更加低落。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从七七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年底，八路军由三万多人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也由一万零三百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人。截至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建立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在五千万以上，为坚持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等既震惊于大片国土沦丧，对抗战前途已悲观到极点，他们的恐共、反共情绪急剧膨胀，急切地希望把国民党的力量从对外抵抗转到对内反共上。因此汪精卫集团的“求和”活动更加猖獗，更加公开化了。

十月十一日，在日军大举进攻广州、武汉之时，汪精卫向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吐露他的肺腑之言”：

“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过了十天，即广州失陷的当天，汪精卫又发表了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声称：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目前战事，非吾人所发动，吾人愿随时和平，不过须有不妨碍中国独立条件耳”。

“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在比京九国公约会议时，吾人未尝拒不接受调停。去年德政府出百翰旋时，吾人亦未尝拒绝之。即在最近，国联讨论适用盟约十七条时，

周佛海：《和平运动之回顾与前瞻》（1940年7月6日），《政治月刊》第2卷第2期。

《申报》1933年10月13日。

吾人曾有准备结束战争之表示。”

公开向日本求和乞降。一时间，汪精卫集团的大小喽罗紧跟而上，鼓噪而动，在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所谓讨论“和平”的文章，宣称：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战争，战争结束便是和平，说中国与日本作战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和平”不是不可以谈的。在日军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丧之际，这些论调完全是一种诡辩之词，戳穿了，正是为他们进一步与日本相勾结，准备签订卖国条约而放出的一种试探性气球。这年四月底，汪精卫曾在长沙各界联合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说：“‘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八个字不是恐吓的话，更不是鼓励的话，有深刻意义在！中途妥协，除了屈服以外，还能得到什么？绝对得不到和平！”时间过去不过半年，言犹在耳，现在汪精卫却要中途妥协，向敌人屈服了。

汪精卫集团深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最有力的中坚，是他们通敌、投敌活动的最大障碍。投降必先反共，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竭力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攻击游击战争。汪精卫多次发表文章、谈话，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借抗战“保全实力”，“颠覆政府”，攻击抗日游击战争是“回避对敌作战”，“避开敌人战线上的坚固据点”。正如后来周佛海自供说：他们在重庆的那些日子里，“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对共产党的斗争”。

与此同时，汪精卫对他的同伙宣传：“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汪精卫还借国民党火烧长沙事件，说这种焦土抗战，把长沙一把火“烧光”，“把支持自己抗战的重要据点，白白地化为灰烬”，以暗指全民族抗战会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光”，将“大家都变成大贫”。陶希圣也大叫说：“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及时谋战争的结束”。

汪精卫集团制造的这些反共求降谬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十月十五日，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严正指出：“时至今日，如犹有人欲谋妥协或投降者”，“实系破坏吾人抵御外侮之决心，无疑为一汉奸，为虎作伥”，“势将为国人所弃”。接着，又连续发表题为：《粉碎一切汉奸伪组织》、《对基本国策不容含糊》等社论，对汪精卫集团的“和平”滥调痛加批驳，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失败主义，乃是汉奸的根苗；言和者即是汉奸。在国统区其他一些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斥责汪派“和平”言论，指出这种倾向“调停”、“和平”的主张，在客观上无疑是混淆一般视听，松懈中国的抗战意志，特别在现阶段上，会很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的抗战工作的。海外爱国华侨也函电驳斥汪精卫之流的“和平”

汪精卫：《在焦土上的游击战》，《人民论坛报》1938年第22期。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汪伪档案手抄稿。

《新蜀报》1938年12月7日。

汪精卫：《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1938年11月23日），转引自张江裁编：《汪精卫先生复国行实录》，1943年7月版，第3页。

陶希圣：《致胡适信》（1938年12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96—398页。

谬论，义正词严地重申：“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指出：“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他们明确表示：“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病极而怒”。十月二十八日，旅外侨民参政员在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之际，又从国外致电参政会，提出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案。依照规定，参政会的提案须有二十名参政员联署才能成立。这个电报提案一到会场，顷刻间，联署者就超过了二十位。在提案交大会讨论时，大多数参议员齐声赞成，一付之表决，立即通过。弄得主持会议的参政会议长江精卫“形容惨变，坐立不安”。这一切，反映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坚定立场。然而，对于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汪精卫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相反，他继续坚持其求和乞降的立场。在国民党纪念会上，他声嘶力竭地叫嚷：“三年之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了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其实，汪精卫集团的所谓“和平”主张，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张。陈壁君曾露骨地声称：“其实能够从日本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部想收回，谈何容易！”陈壁君有陈壁君的一套逻辑，她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这就是他们的“和平”理论！他们以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作为对日乞和的筹码，就是这伙民族败类的险恶用心所在。

上述情况说明，汪精卫等人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民族投降主义的泥潭，他们的“和平”理论，越来越不得人心。他们既痛感于受强烈的抗日政治气氛的压迫，处境更加孤立；又不肯改弦易辙，转变立场，因而想离开重庆，从外部发动“和平运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梅思平赴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接洽情况。汪、周、梅等连日密商，“终于确定最后决心”。十一月七日，在梅思平由重庆返回香港之际，汪精卫、周佛海即委托梅思平，要他与高宗武两人作为汪方全权代表，同日方继续会谈。说来也巧，双方会谈的地址，就选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的“重光堂”。影佐祯昭继承了土肥原贤二衣钵，把对华“谋略”工作推进了一大步，成功地把汪精卫集团从抗日阵营中拉了出去，这一点，使他的前辈望尘莫及。

《陈嘉庚致汪精卫有电》（1938年10月26日），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6年3月版，第7页。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成立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政府聘请，包括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员占多数。该会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1939年7月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任议长。1947年5月，国民参政会于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消。

转引自《我们的态度》，《南华日报》1939年1月3日社论。

陈曙风：《汪精卫投日前后侧记》，《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期。

重光堂会谈

重光堂，中国人当时称它叫梅华堂。它地处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是一幢孤零零灰色二层楼西式住宅，房子已经陈旧，门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东体育会路七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的一天，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从附近一家旅馆里借了可供七、八个人使用的被褥、火盆、餐具等一套家俱和摆设，派人将房间进行了整修，并作了精心的布置。日汪会谈的预备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十一月七日，梅恩平从重庆到达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为了避人耳目，梅、高两人与翻译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道尔曼号”和意大利轮“戈善特亚号”于十二、十三两日到达上海，他们先后被接到重光堂，立即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举行预备会议。从十二日晚至十四日晚，重光堂内鬼影幢幢，日汪双方的一笔肮脏政治交易在这里成交。

这次谈判，主要商定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并安排汪如何逃出重庆的详细方法。会上，梅恩平首先介绍了在重庆与汪精卫等人协商的意见：汪表示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起见，保证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开发权以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部门的日华合作，向日方亮了底牌。接着，根据今井武夫的意见，双方就具体方案进行讨论。高、梅承认日方所提出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地区允许日军驻扎；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并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同时，高、梅也提出了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即撤退；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华租界。这些所谓“要求”、“希望”，仅仅是一纸空文，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卖国条件时制造的一块遮羞布。然而，日方代表还嫌价码太高，不肯同意，双方“激烈争论”了六个小时，才达成初步的协议，将上述汪方的“意见”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会谈中，高宗武、梅恩平还提出，要重建“中国政府”，就不可能同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处于同等资格的地位”，否则，新中央政府就“难以建立”。他们声称：作为“中国新政府”的抱负，不能考虑与被人民认为是傀儡的南北两政权合作或合并，热切希望日方考虑取消这两个组织。高、梅表示，对于这两个政府中之“善良者”，不妨包容为“新政府”中的地方官吏。对此，日方代表予以驳斥。今井声称：“临时”、“维新”两政府“均系日本指导下的政府，在有关日本帝国范围内，均为友好之地方政权，从而期望其存在及发展；此乃我帝国之信义。因此，不能考虑约定将其取消。”实际上，日本政府为加强对中国沦陷区的统治，早就制订了“分治合作”的方针，并提出对各地的伪政权，要给予“广泛的自治权”，当然就容不得汪精卫一个人去“统一”了。

双方争论不下，今井武夫认为既然不可能“一争到底”，于是就决定待

[日]《渡边工作现状》（1938年11月21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93号》。

以后由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协商，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临时”、“维新”政府发表声明，明白表示它们为“救国”而一时出马，现汪政权既已成立，则可自行解散。这一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基本原则确定之后，高宗武、梅思平即代表汪精卫提出了所谓“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及其有关政策，提交会议讨论。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表示同意。汪方的“行动计划”预定如下：

第一、发动

一、日华代表间如达成协议，日本政府确定解决和平条件，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人通知在重庆的汪精卫；

二、汪精卫在接到上述通知的一两天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干部同人寻找借口前往昆明，同时梅思平也携带与日本方面接洽的结果情况，自上海经香港到达昆明；

三、日本政府准备在汪到达昆明之际，公布日华解决和平的条件；

四、汪精卫于其次日发表对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当天乘飞机到河内，再赴香港，

五、汪精卫到达香港后，立即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相呼应，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

同时以国民党党员同志的名义，联名发表反蒋声明，对中国内地及南洋华侨开始进行和平运动，

六、与上述汪之声明相呼应，云南军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

云南的龙云及四川军地方将领虽已作为同志订立牢固的盟约。但中央军三个师已开入四川，因此先自云南起义。又，广东军与其他战线的军队对此次运动也有不少谅解的人，由于中央军的监视，为了避免暴露计谋，尽可能延期起义；

七、日本军如能援助上述军事行动，以使中央军的讨伐陷于困难，可隔断中央军，向贵州等后方进攻，但须预为部署，不可把陕西省及广西省驻扎在西安和梧州等处的中央军赶入四川和广西内地。

第二、建立新政府

一、在非日本军占领地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

二、日本军实行部分撤退，以广东和广西两省为新政府的地盘；

三、汪精卫在他的旗帜下，使同志汇合，以两广、云南、四川四省为正式建立新政府的地区。

第三、新政府的政策

一、政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阐明政策，发表日华提携政策，在海外开始进行和平运动；

二、新政府编成五个以至十个师的军队；

三、向日本聘请军事及其他教官，以政府的东亚新秩序政策为宗旨，进行教育，培养人才。

上述计划中关于在西南地区组府等主张，是出于汪精卫的授意，还是高宗武、梅思平在重光堂会谈时自己提出的，目前虽无确切资料可判断，据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后的交待，重光堂密约的内容，汪精卫是事后才知道的。周的交待或许是可靠的，然而事实是：其一与日方签订密约的高、梅两人是由汪精卫、周佛海所委派，作为汪方代表参加会议，因而有权决定具体事项；其二后来当梅思平将重光堂密约带回重庆交给汪精卫后，汪是表示同意的。因此，上述计划是汪精卫集团对建立“和平政府”的初步设想。

十一月十五日，今井武夫急匆匆地离开上海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送交了在重光堂预备会议中与高、梅所达成的秘密协定草案。这时，东京陆相官邸，正在举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出席会议的除陆相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次长多田骏外，还有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军务课长影佐祯

昭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十人左右。今井前往参加，并作了报告。经过讨论，与会者决定以重光堂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

十八日，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以及大养健、西义显、伊藤芳吴等一起到达上海。翌日晚，日汪双方在重光堂进行正式会谈。二十日晚七时，以高宗武、梅思平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个人的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此外，双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协议》规定：（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地区。（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华租界。（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五）赔偿日侨损失。（六）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据此，会议还草拟了近卫、汪精卫声明要点和制定了汪的叛逃计划。

重光堂会议所签订的密约，是汪精卫集团的最初一份卖身契！然而，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只是当时汪精卫等人还在重庆，为了把他们勾引出来，重光堂密约并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端出来，免得超过汪精卫集团所肯接受的程度，致使其分裂中国抗日阵营的阴谋落空。因此，在重光堂密约签订后十天，十一月三十日，同本御前会议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对中国的权益的要求，就比重光堂密约广泛、苛刻得多了。可见日本与汪方签订的重光堂密约，不过是引诱汪精卫集团脱离重庆的诱饵。

五 逃出重庆

决定“跳火坑”

重光堂会谈一结束，日汪双方的活动更加紧张起来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影佐侦昭和今井武夫飞回东京，向陆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中将和有关的部、课长提交了重光堂会谈结果的报告。

第二天，板垣带着影佐和今井前往首相官邸，将这事向五相会议有关阁僚提出报告，征求意见，并商定将以《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作为近卫文磨第三次对华声明予以发表。

十一月二十一日，今井返回上海，与伊藤芳男守在旅馆里，专等汪精卫集团同意的答复。

梅思平、高宗武自重光堂会谈后立即返回香港。十一月二十七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密约”开始是藏在上清寺汪公馆里，但陈璧君心怀鬼胎，怕不保险，即把它放进一只小皮箱，亲自上了锁，由她内堂侄陈春圃陪同，送到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她胞妹陈淑君处，只说小皮箱暂时寄存，随时要取回，不说里面放了什么东西。第二天，陈璧君又自己去将这只小皮箱取回，并告诉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夜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可见陈璧君作贼心虚，忐忑不安到了极点。

梅思平带来“密约”，这对汪精卫集团来说，已到最后下决心的关键时刻了。于是，汪精工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讨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他们对“密约”

内容表示可以接受，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急于要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走，最后决定逃离重庆。

陈璧君此人，也是国民党内一个头面人物。她字冰如，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一户殷实的华侨之家。原籍广东新会。父亲陈耕基经营橡胶业，

“中年以后始渐富裕”，成为当地华侨富室。母亲卫月朗是个知书识字并富有民族意识的女性。富有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幼年教育，使陈璧君的思想较之一般少女更加早熟。十五六岁时，在她走上生活道路之际，一股强烈的反清革命斗争风暴正席卷于她出生的地方，她受到了感染。

南洋各岛，是华侨聚集之地，也是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许多爱国侨胞对清政府因腐败无能所造成的国步艰难的局面十分不满，而对革命党人则寄以同情和希望。一九一七年，孙中山离开日本赴河内，在这里设立秘密机关，以领导两广、云南边境的武装起义，并派人前往各地活动。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至南洋各地，开展革命宣传，秘密组织中国同盟会分会，筹捐军资，以支持国内的武装起义。汪精卫到达南洋后，即奔走于槟榔屿、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在槟榔屿当地华侨俱乐部小兰亭、新街新舞台或平章会馆的会议室，频频召开讲演会。汪精卫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宣传反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0页。

《周佛海侦讯笔录》（1946年9月24日），汪伪档案。

陈璧君：《我的母亲》，见张江裁编：《汪精卫先生行实录》1943年版。

清民主革命思想，深受当地华侨的欢迎。在众多的听众中间，陈璧君就是其中一人。她对汪精卫生动的讲演和热烈的革命情绪十分赞赏，尤其看到这位俊秀青年，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因而为之倾倒，产生了爱慕之情。在汪精卫的吸引下，陈璧君背着家庭参加了同盟会，陈母得此消息，非但没有责难，自己也欣然前往新加坡谒孙中山，并毅然加入同盟会。

自此以后，陈璧君追随汪精卫，成了汪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和可靠的伴侣。一九一九年，她参与汪精卫等人的暗杀小团体，次年汪因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她竭力营救。辛亥革命后，

汪被释，陈即于一九一二年与汪完婚，然后一道出国赴法国留学。

由于她是最早的女同盟会员之一，参加过反清革命，凭藉这段历史，她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影响。一九二四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她是三个女代表之一。次年七月，汪精卫出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她也就成了“主席夫人”，在政治活动方面颇为活跃。一九二六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她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性，随着地位的升高，政治上的欲望也逐渐膨胀。在汪精卫升降沉浮于政海之际，她都积极参与其事，为汪出谋划策。陈生性尖刻，高傲自大，乃至目空一切。

她不仅要想依靠着汪精卫爬上中国政坛的顶峰，而且还想左右汪精卫。对汪、陈夫妇有较深了解的陈公博，曾在背后发表议论说，汪精卫没有陈璧君，办不成大事；没有陈璧君，亦不致于败事。“惧内”成了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公开秘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璧君也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每当言及战事，她总是愁容满面，摇头叹息，对抗战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例如前方战事失利，报纸上不说败退而说转进，这就成了陈璧君取笑的资料。在陈璧君看来，中国之亡，就在于抗战到底，内心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当梅思平携重光堂密约向汪精卫集团汇报时，陈璧君就竭力主张脱离重庆，妄想到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去寻找“新的”出路。对于陈璧君的主张，汪精卫、周佛海都表示赞同。

促使汪精卫等要逃离重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蒋介石集团的权力冲突。汪精卫是国民党内领袖欲极强的政客。为了争夺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汪在历史上就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尖锐的争斗。抗战以来，汪虽然仍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相继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但仍然在蒋介石之下，而且没有掌握实权，因此很不满意。一九三八年四月，汪精卫出席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汪副之。“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陈璧君牢骚满腹，她露骨地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宁愿当儿皇帝，而不肯继续寄蒋介石之篱下。

周佛海也是一个权力迷，据知情者回忆，周佛海出逃前，就已经失宠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之初，其重要人物均在汉口。这时，汉口时

另两个代表是何香凝与唐允恭。

《陈布雷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再版本，第129页。

《武和轩先生谈话录》（1980年4月15日），转引自蔡德金：《汪精卫投敌前前后后》，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常有敌机轰炸，周佛海未经许可就擅自离职躲到重庆，蒋介石知道后，大为震怒，有人通知他，周只好重返汉口。而且，周佛海并不以任代理宣传部长为满足，极想得到财政部长的位置，而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始终都由蒋介石的妻舅宋子文或蒋的联襟孔祥熙充任，蒋的亲戚之外，谁都不能染指。周后来在日记中抱怨说：蒋从未以“国土”对待他，就是指这些事。

除与蒋介石集团权力之争外，双方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出逃前，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曾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如不能战，则不如和。”汪精卫重弹老调，企图作最后一次努力，劝说蒋接受他的主张。

但蒋介石自有他一套理论。他毫不掩饰地说：“抗脆易，和平难。”这话一出口，正好为汪精卫找到了反驳的理由：

“谋国者不应从难易定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

这件事反映了当时蒋、江两人再也无法合在一起了。汪精卫集团的出逃势在必行。

不过，汪精卫也还有惶恐不安的一面，主要是惧怕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也顾虑和日本人的交道不好打。周佛海、陶希圣就劝驾说：“你兼外交部长的時候，和日本打过交道，还可算是顺手的。”汪精卫回答说：“也不尽然，一九三四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藏本在南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

所谓藏本失踪案，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夏。这年六月八日晚上，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不告而别，单身外出。第二天早上日本领事馆发现藏本一夜未归，寻找无着，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即于下午派人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抗议，要求于四十八小时内负责寻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并到外交部大肆咆哮，定要限期交人，“汹汹抗议，一日数至”，并放出藏本失踪系中国方面有计划之行动的空气。于是，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军舰，褪下炮衣，作出向南京轰击的态势，还扬言日本水兵要上岸占领南京。这时兼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吓得六神无主，立刻严令警察机关到市区、四郊竭力寻查。至十一日，仍毫无踪迹，汪精卫急得黄汗直流，赶忙派人赴沪会晤日本公使有吉明，报告访查情况，请日方“取镇静态度”。直至十三日正午，才在紫金山下明孝陵附近山麓发现藏本。原来藏本仕途失意，想要绝食自杀，但又下不了决心，躲在山里，无奈饥肠辘辘，难以忍受，下山拟用所带的金戒指向居民换取食物，因而被发现。汪精卫闻讯，立即派了外交部官吏到警察厅去慰问，并将藏本伴送至外交部转送日本领事馆。至此，藏本失踪事件告一段落，汪精卫才如释负重。

类似这样的事情，汪精卫不得不承认是，“不遑枚举”，现在回想起来，真叫他心有余悸。因此，在日本政府真的要他出马来当“对手”的时候，汪“即产生过许多幻想，也不可能没有剧烈的思想斗争。”尤其在看到梅思平带来的“密约”后，他更是心神不安，每天晚饭后总是在寓所的院子里踱来

陈璧君：《答“为何在抗日途中叛变抗日战线”问》（1951年12月24日），汪伪档案。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1页。

《汪精卫致陈璧君信》（1936年7月13日），汪伪档案。

同。

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的苦海中。但是，他既陷入了民族失败主义泥坑，特别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从反共的立场出发，势必将他扶上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最后还是决定“跳火坑”。

在梅思平准备赴沪向日方答复的前夕，汪精卫在家设筵为梅饯行。宴后汪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十二月一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作了答复：

- 一、汪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 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之必要。
 - 三、汪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十日到达昆明。
- 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 四、汪去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表示下野。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通知汪精卫集团：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

根据重光堂会谈的计划，汪精卫将于十二月十日左右到达香港，为此，十二月七日，高宗武派周隆庠前往香港日本满铁公所见西义显，提出如下意见：

“汪先生之目的地尚未确定，我已准备接他来香港。但预想最恶的场合，或者将发生事变，须求日本总领事垮之保护亦未可知，我们有预作准争之必要。这种事不好说，现在的总领事，我们不知道他，故有事时，不便托他。若有可能，以我们所知道的田尻爱义君代之，如何？请代向东京交涉，这事当然很难，务请于十二月十日前到任。”

日本政府得到汪精卫集团决定出逃的报告后，对汪方提出的这一要求，表示可以满足，当西义显将此要求急电影佐转告外务省时，马上着手办理。正巧，时任外务省调查部长之田尻爱义，正在汤河原温泉，从事长篇著述。西义显电报一到，他就被外务大臣有田召回东京，令他赴港就任总领事。于是，田尻立即动身乘上陆军飞机到达广州，然后从广州乘坐海军炮舰，于十二月十日正午十二时抵达香港。

对此，高宗武十分感激，认为日本政府很有诚意，便力促汪精卫等人尽快逃离重庆。

罗君强：《高宗武赴日试探投降条件》，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 273 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99 页。

西义显：《悲局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史》，第 318 页。

陈璧君打前站

根据重光堂会谈所拟定的日程，汪精卫必须按时逃离重庆，以便配合日本方面的行动。为此，他们首先选择了出走的路线。当时比较便捷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由重庆直飞香港，这很容易，但以汪身份之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因此取该道有很大的冒险性；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较稳妥，但要事先征得龙云的同意，才能借道而过。

龙云，字志舟。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生于云南昭通燕山黑彝纳吉家族中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龙的祖籍在四川金阳。这位彝族地主子弟早年入滇军，在唐继尧的提携下，历任中尉待从副官、近卫军中队长。伙飞军大队长、近卫军团长、柳州警备司令、昆明镇守使等职。自一九二八年初起，任云南省主席，从此成了云南的最高统治者。作为拥有地盘的地方实力派，龙云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对国民党中央政府保持一种半独立状态。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龙云拥护抗战，云南军队编为第六军，由卢汉任军长，开赴前线，参加抗战。但龙云同时又与蒋介石利用抗战之名，蓄意牺牲非嫡系部队有矛盾。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至西南后，蒋介石势力积极向云南渗透，龙云深恐云南这块地盘会被吃掉，因此与蒋介石矛盾进一步加深。汪精卫集团有见于此，对龙云极力拉拢。

一九三八年，陈璧君三次到广州进行活动。两次是沿公路从汉口出发，经过湖南、广西两省转赴广东，窥探两省虚实。另一次是由重庆乘飞机经香港至广州，在那里住了一些时候，分别约了当时广东省的军政要人余汉谋、吴铁城等人晤面，进行拉拢。回渝途中，陈璧君停留昆明，与龙云“促膝长谈”。这时正是龙云与蒋介石为在云南设立中国银行分行而关系紧张。龙云告诉陈，云南受蒋介石“不合理之负担而消耗殆尽，而武器弹药，及装备分配与中央军部队相比较，则有天渊之别。”陈璧君一面假惺惺地表示同情龙云处境，一面挑拨说，抗战持久，蒋介石总是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鼓动龙云反蒋，并表示要帮助龙云解决云南军队急需的医药和医疗器械。与此同时，陈又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视察”了个旧锡矿，提出要在南洋筹集华侨资金，帮助开发锡矿，以资拉拢。龙云过去与汪精卫素无交往，只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南京才见过面，但他对汪一向十分推崇，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龙也想结纳汪，利用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与影响，作为自己的政治依靠。经陈璧君多次“工作”，龙对汪更有好感了。陈璧君见火候已到，就哭丧着脸诉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很想换换环境。龙云听后为之动容，向陈表态说：“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陈璧君回重庆后，向汪精卫介绍了与龙云谈话的经过，对龙的“明大体”赞不绝口，所以，汪精卫才敢决定借路昆明出走。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走法。由于这一切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如果成群结队走，必然会引人生疑，他们就商定以分散出逃为宜：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名义，于十二月五日堂而皇之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而汪精卫约定十二月八日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同

陈璧君：《答“为何在抗日途中叛变抗日战线”问》（1951年12月24日）。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未刊）。

时，陈公博将在同一天自成都飞昆明与汪会合。

商量既定，即派陈春圃打前站。陈春圃是陈璧君的远房侄辈，生于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广东新会人。早年求学于广州圣心书院，一九二五年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在汪精卫夫妇提携下，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组织部秘书、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前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陈追随汪精卫，利用工作之便，鼓吹“亡国论”低调，在华侨中散播“抗战没有胜利的希望”等民族失败主义理论。在汪精卫决定出逃之前，他还对别人分析形势说：“现在非蒋嫡系的军队根本不想打，蒋的嫡系军队也不愿意拿出来拚。到了这步田地，蒋何尝不想结束战争，但是结束不了，人家（指日本帝国主义）不要他。现在日本人心目中宁可要汪，不要蒋。”“蒋上既不能，下也不得，只得长年累月地拖。他现在就是要你们为他殉葬。你们在重庆呆下去，就是要你们为他殉葬。”足见陈春圃的政治主张与汪精卫如同一辙。加上陈春圃办事认真细致，深为汪夫妇器重。这一次，汪精卫以送孩子到香港读书为名，要陈春圃把他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询护送到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至香港，自己则留下来与周佛海联络，专候汪精卫何日飞昆的电报，以预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把全部逃脱人员一起装运河内。

就在这以后，汪宅的行动更加诡秘。十一月下旬，汪宅显得十分忙碌，他们有的清理东西，有的把书籍文件装进了印有“双照楼”三字的箱子里。为便于行动起见，汪精卫又把康泽派给他作侍卫队长的刘文焕支走，将雇佣的女佣追散。为了保密起见，除汪等少数几个人而外，连同在重庆的陈璧君的胞妹、曾仲鸣的胞兄、汪精卫的侄子都不知道，许多汪派骨干部没有通知。陈璧君不放心，就问汪精卫：

“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介石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

汪精卫回答说：“蒋介石是个奸雄，我们走后，他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被严防，不会被害，我们现在又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

当然，府些人不通知更好，但陈公博是非通知不可的。陈是汪精卫的亲信，得力的助手。一八九二年（清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九日生于广州。原籍福建上杭，后移至广东乳源，寄籍南海。

自六岁起，就已经读古典小说，什么薛仁贵征东、征西，《水浒传》、《封神榜》等，并涉猎《唐诗三百首》。至九岁时才开始读四书五经，同时聘两名拳师教他玩棍棒。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曾任广西提督，“赏穿过黄马褂”，一八九七年解职后就住在广州市大北直街，家道从此中落。但陈志美早年从军，曾结交许多会党中人，受会党反清思想影响，于一九零六年春在广东乐昌策划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判处“永远监禁”。这样，陈公博也逃出广州，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当校对。一九零八年风声慢慢平息后，陈公博返粤投考于广州育才书社，学习英文。一九一一年广东光复，陈志美被释，即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兼都督府军事顾问。陈公博靠父亲的名气，以一个“浮嚣使酒骂座的少年”，居然成了乳源县的一名议员。但他年刚弱冠，凭

陈曙风：《汪精卫投敌前后侧记》，见《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1954年12月29日），汪伪档案。

自己“在报馆当过了记者，会写几句短评，会做两首歪诗，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父亲见他趾高气扬，一天把他找来，正色告诫他：“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

因此，父亲令他入广州北伐学生军，吃些苦头，学点“不知道的事情”。陈公博虽极不愿意，无奈父命难违，只好郁郁地脱去官装，去当普通的士兵了。翌年九月，父亲病故，陈公博回育才书社任助教，两年后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一九一七年，陈公博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的思想“确是复杂而在那里变化”。他发起组织“十人团”，提出了“创造新贵人”口号，意思就是“抓着机会便要往上爬”。

一九二一年，陈公博北大毕业后回到广州。此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正如强劲的东风，吹拂着古老的中华大地，陈公博也受到激荡，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次年七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以广东代表身份出席参加。不料，会议进行到第六天，七月三十日，法租界巡捕前来搜查，会议决定赴嘉兴南湖继续进行。当天晚上，陈公博住的大东旅社又发生了一起情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人，陈公博吓得魂不附体，带了新婚妻子李励庄跑到杭州游玩去了。第二年，陈炯明在广州公开叛变孙中山，中共中央鉴于他与陈有勾结嫌疑，需要审查，陈公博大为不满，于是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不久即被开除党籍。同年十一月上旬，陈公博东渡日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由横滨乘船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一九二五年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由于汪精卫的提携，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兼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次年国民党“二大”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公博深感得了“知己”，从此追随汪精卫，成了汪的左右手。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争夺国民党中央最高统治权，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汪精卫出走海外后，陈公博秉承其旨意，充当反蒋急先锋。先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当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独裁统治之初，陈公博在上海法租界创办《革命评论》，与蒋介石集团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大打笔墨官司。《革命评论》以“改组国民党”相标榜，对蒋介石集团所控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展开尖锐的抨击，说现今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皆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内部掀起了“左倾、右倾、腐倾及恶倾”等四种倾向，汪精卫一派当然是“左倾的同志”。而他们“目前处境的可恶，更而忧虑，消极，迫而被排于奋斗的战线之外”，因此，非改组不可，实际上是想让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改组进去。与此同时，陈公博还利用《革命评论》，猛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宣传所谓“民主政治”，从经济、外交、党务等各个方面，批评南京国民党政府制订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当时出于对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也由于《革命评论》上所宣扬的政治主张，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因而曾经吸引过一批不满意现状、又害怕共产主义的中间派及其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学生，形成了一股声势颇大的反蒋声浪。《革命评论》也终于被封。接着，陈公博又与顾孟余、陈树人、甘乃光、潘云超、王乐平、王法勤、朱霁青、郭春涛等人，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载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5年版，第194页”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革命评论》第10期。

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在上海设“中央党部”，尔后又相继在各地成立改组派分会、小组等基层组织，以发展其势力。“改组派”捧汪精卫为“领袖”，标榜“护党救国”，鼓吹“十三年改组精神”，用“恢复中国的民生”、“培养民主势力”、“实现全国裁军”等口号，以拉拢反蒋力量，企图达到其“刷新”南京国民党政府，以便夺回汪派失去的权力和地位的目的。

然而，这一切都遭到了失败，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国民党召开的“三大”上，通过了《对汪以书面警告，陈公博、甘乃光永远除籍，顾孟余停籍三年》的决定。此后，陈公博与汪精卫等人又怂恿、拉拢地方军阀，挑动反蒋战争，以便在军阀混战中坐收渔利。期间发生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张桂联军的反蒋战争、乃至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陈公博及其“改组派”上层分子无不穿插其间，兴风作浪。他自己也承认，说过去国民党内的“纠纷”，“在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以前，可以说我应付完全责任”。一九三二年初蒋、汪合作，陈公博出任行政院实业部长，唱出了“老去方知厌党争”的调子，力图摆脱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陈公博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一九三八年春起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常住成都。十一月底，他突然接到汪精卫的电报，要他立刻到重庆来一趟。陈急忙返渝去见汪精卫。汪告诉他：“中日和平已成熟”，他就要离开重庆了，希望陈公博随他出走。汪精卫讲了一大通理由：

“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

陈公博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原来，汪日间的秘密勾结，陈事先一无所闻。自从抗战以来，陈公博和汪精卫在“和”与“战”的问题上有一定分歧。陈公博认为，国家的对外关系，“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同时，陈还根据过去几年对日交涉的“经验”，认为“日本绝无诚意”，因此，“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

正因为陈持这一主张，所以陈璧君以他“太懒”作为藉口，未将对日密谈的种种情况透露给他，说等到事成后才通知他。待到汪精卫要他一道出走时，陈就感到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对此持反对意见。

这一来，就触怒了陈璧君。她挖苦陈公博说：“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你一个人留在此地当蒋介石的官好了。”陈璧君深知，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关系实在太深了，他们走后，陈就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她说这话不过是使的激将法而已。

果然，陈公博一回到成都，就反复考虑走还是不走，思想斗争极为激烈。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同上。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同上

他后来谈及此事，说他“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走吧，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和平成功”，东北也就会丢了，内蒙和华北也会丧失主权，这对“中国前途绝无好处”；况且他跟汪精卫一走，势必造成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公开分裂，以后将何以善后？不走吧，汪精卫走了，他必然会遭到奚落，人家就会在他面前大骂汪精卫，使他感到难堪，政治上也会受到损害。权衡利弊，最后他还是决定出走为上，观察今后局势的发展而定自己的行止。

十二月五日，周佛海飞往昆明，暂时住在金城银行昆明分行的楼上。第二天，陈璧君就托她的妹妹陈淑君将在南渝中学读书的汪文悌、汪文恂接回家中，告诉他们暂时辍学。第三天清晨，陈春圃就带着两个小孩，搭机前往昆明。

陈春圃打前站的一定，汪精卫集团的出逃留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飞离重庆

在汪精卫集团加紧准备出逃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在按照重光堂会谈所拟定的计划进行。日本政府向新闻记者透露：首相近卫文麿将于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讲，利用这个机会，将宣布对华“新政策”。

可是，事情发生了波折。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突然从桂林抵重庆，这一下无意中把他们的叛逃计划打乱了。汪精卫一时无法脱身，还担心以前的行动是否已经暴露，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掩人耳目，同一天，《新蜀报》所发表的《汪副总裁揭见记》中，汪精卫还在大谈所谓“政治机构的调整和地方政治的改进”，并强调“财政金融的整顿和经济建设的实施”。十二日，汪精卫又身穿平时很少穿的藏青色中山装，出席蒋介石在重庆行营纪念周的讲演会。与此同时，汪还分别接见了孔祥熙、戴笠、陈布雷等蒋介石的亲信人物，听取他们的“汇报”，但掩盖不住其内心的虚弱，随时都会流露出一不自然之神态。

这时，已经到达昆明的周佛海也受了一场虚惊。十二月九日，蒋介石命令陈布雷电召周佛海立刻回重庆，周非常紧张，他后来曾向人道及当时的心情：

“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

“我如果这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国难了。”

“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

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

“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五日我从重庆出来，第二天蒋介石就回去，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为了造成蒋介石集团的错觉，十二日下午三时，心怀鬼胎的周佛海出席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故前后的形势》的讲演，重弹抗战“低调”，说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就一直“忍辱负重”“以重视于国防建设”。还说：“中国之抗战，乃为抵抗侵略而应战，并非穷兵黩武而求战，以中国之目的，始终为和平”，“惟合乎正义光荣的和平，吾人万不应反对。”同时，他又提出了“争取长期抗战胜利”的条件：“第一，认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第二，统一言论及行动；第三，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组织民众，发动民众；第四，逐渐推行民主制度，以集中全国意见及力量；第五，节约消费，厉行生产”。周佛海一面用空洞含混的说教制造假象；一面派人带了他的亲笔信立即飞往重庆，探听汪精卫的消息。当汪精卫告诉他，到目前为止，蒋介石还不知道他们之间关系时，周佛海这才惊魂稍定。

此处事实有误，应为第四天。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2—103页。

《新蜀报》1938年12月14日。

同周佛海的心情一样，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感到十分焦急，不得不取消了为汪精卫代定的滇越铁路持车包厢，等待着重庆的消息。

一天，周佛海接到在精卫拍来的一份秘密电报，周将密电本托陈春圃代译，译出的电文令人费解：

“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陈春圃不知所云，以为电码或有讹误，就去问周佛海，周说一点不错。原来，他们在重庆时就口头约定，以“兰妹”作汪精卫的代号，以“秀妹”作日方的代号，“出阁佳期”则为日本方面发表声明的隐语。电文的意思是说汪不能按原定日期离开重庆，通知日方不要因为等他而误了发表声明的日期。陈春圃恍然大悟，邵按周佛海嘱咐，以原电密码由中德航空公司转发香港，通知高宗武与日方联系。

日方接到这个通知，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面。那时，日本军政部门内部，有相当一批人，本来就对汪精卫的意图表示不信任，他们认为，“汪和蒋是在唱双簧”，“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决心的诡计。”现在，汪精卫不能如期出走，这就使他们更觉得理由十足。甚至连今井武夫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中了圈套。在这样的气氛里，近卫文麿疑窦丛生。日本在战后出版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对此事作了较详细的记载：

[十二月]八日在桑名招近卫与松平内大臣秘书官长谈话，近卫说：“我赴大隈计划突然放弃，由今晚起生病。”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从前以汪兆铭为对手，从事‘谋略’之影佐与今井武夫中佐已赴中国，对手是汪兆铭与梅思平。中间有西义显，陆军名此为‘渡边工作’，已将近成功。在五日内，汪兆铭将脱离蒋政权。在此以前，条件大体已议妥，并已签字，订防共协定，华北资源日本占优先权，不干涉中国内政。关于国际问题与日本共同行动等，为其主要之点。对外关系为经济条件之平等、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等。

大体以此内容，奏请开日之御前会议，因之汪兆铭希望再发一次声明。但前次之声明仅经月余，再发声明，未免声明过多。所以决定在大阪作一次演说，向国民说明御前会议后政府之大体方针。……今朝汪来电称：‘在昆明之蒋介石今朝来重庆，此问难发声明。蒋停留至何时虽未可知，但蒋离重庆后，由我告之……’云云。此事或者已被骗亦未可知，但我既已奏明陛下，所以将因急病不赴大阪情形，由内大臣向陛下申述。对于世人亦以十日回家卧病公布。明朝当叫医生来，以示真病。故希望谅解此中情形。

我不以为被骗，但向坏的想，或系被骗，实为不安。……若真被骗，国民虽完全不知，但我与陆相则有重大责任，亦政府之重大责任。此时只有更换内阁。……此事系大赌博，殊虑困难，希望向（西园寺）公爵详为说明。”

近卫同松平内大臣秘书官长一席谈话，充分反映了日本引诱汪精卫集团出逃的计划，完全是一场骗局。他们自己在骗人，所以也怕受别人的骗。

十二月九日晚上，已经到了京都的近卫，取消了大阪之行，并且将广播演说延期至十四日，接着就回到了东京。

此刻，还在重庆的汪精卫，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左盼右盼，才找到了一个脱逃的机会。十八日，蒋介石要发表训话，汪可以不参加。趁此机会，

陈春圃：《汪精卫技敌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3页。

堀场一雄：[日]《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1卷，1963年东京版，第317页。

此处事实有误，应为桂林。

汪精卫就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购买飞机票。彭是江西安福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又求读于比利时京师大学，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是原“汪系”人物之一。因此，汪要飞机票，彭自然奉命照办。

这天上午九时，陈璧君以及汪的亲信曾仲鸣、女婿何文杰等四人，预先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们约定，汪精卫在启飞前数分钟内赶到。陈璧君到机场时，刚巧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要搭机飞滇。陈璧君做贼心虚，连忙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仅含糊其词地说是“汪夫人”有事赴滇。离开起飞的时间将到，汪精卫仍然未来，陈璧君心里十分着急，嘱咐曾仲鸣，如汪精卫迟到，就向机场说明有汪搭乘，令飞机延缓起飞。就在这时，一辆小车正沿着珊瑚坝疾驰而来，汪精卫由一名侍卫陪同赶到。周至柔等看到汪精卫，都上前谒见。陈璧君这时才告诉周，说汪精卫是去昆明讲演的。

飞机起飞后不久，周至柔想乘这个机会，在这位“副总裁”面前显露一下自己的飞行技巧。他走进驾驶室，亲自操作。这一字不要紧，直吓得汪精卫、陈璧君等人虚汗直冒。陈璧君以为周至柔是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令他驾机返航，她偷偷地问曾仲鸣怎么办？曾仲鸣暗中告诉汪的侍卫，要他作好一切准备。正当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忐忑不安之际，周至柔过足了驾驶瘾，从驾驶室里走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汪精卫这才松了一口气。

汪精卫一伙就这样离开了重庆。

从昆明到河内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从重庆方向开来的飞机抵达昆明机场。当汪精卫走出机舱时，只见龙云率领省政府各厅、署、局长官，列队相迎，顿时军乐大作。汪精卫见此，生气地责问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汪事先电告陈，要他以“保密及防备日机中途拦击”为名，只许龙云一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人。陈照此通知了龙云。龙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但一转身却告知了各厅、署、局长，不多时，各条街道的商店也零零落地挂起了“国旗”，奉命表示欢迎。陈春圃看到后十分着急，去见龙云请他下令收旗，并不要张扬，但已来不及了。

汪精卫此人历来爱出风头，这次为什么那样忸怩作态呢？到了晚上，汪才悄悄告诉陈春圃，说既然是托词演讲而来，实际上是借路溜走，因此接见的人越多就越难对付，“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于是，由曾仲鸣出面，说汪精卫在飞机上因颠簸太甚，脉搏有间歇，当地官员一律“改日延见”。这天夜里，汪与龙云进行交谈，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得到了龙的赞同。

汪精卫见目的已达，长舒了一口气，再也不象午间初到时那样张惶失措了。

但陈璧君却想得更周到，她认为万一明天天气不好不能起飞，而被迫改乘火车走的话，到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会狼狈的，因此指定陈春圃明晨一早乘火车先走，以备万一。汪精卫知道后，笑逐颜开地表示赞同，并关照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

十二月十九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汪文愷、何文杰及副官、随从等一行十余人，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为了掩盖自己投敌的真相，汪精卫离开昆明前，还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是因飞行过高，身体不舒服，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一日，再行返渝。第二天，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

按照汪精卫集团的计划，他们对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寄以很大的希望，对他们千方百计进行拉拢。一方面釜底抽薪，以削弱抗日阵营的力量，并挖蒋介石墙脚；另一方面引诱他们一道下水，以增强自己的势力，拼凑一支武装力量。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当汪精卫公开打出“和平”的旗号时，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张发奎起而响应，接着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在这些日军当时尚未占领的地方造成汪系天下，以便和日本文涉“和平”。由于陈璧君的多次“工作”，汪精卫在昆明的一夜深谈，龙云表示了拥汪的倾向。然而，当汪精卫等人一走，龙云立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等一行于“午后二时半已离滨飞航河内”。待陈公博离开昆明后，龙云再次致电蒋：

“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离开钧座之工作。职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页。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页。

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识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矣。”龙云这样做，反映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情。龙云既想依靠汪精卫，通过中日间的“和平”，以保存其地盘和实力；但又不能不考虑到投汪成败难卜，在民族大义面前，弄不好就会受千夫唾骂，而且还会遭到蒋介石大军压境，丢失一切。权衡利害得失，龙云仍然表示拥蒋，留在抗战阵营中。

龙云的动向，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特别关注。这时，离广州，武汉失陷仅两个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前线屡遭失败，蒙受重大损失，如果云南、四川等地脱离抗日阵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别是云南，它是后方的一个大省，面积差不多有法国面积的两倍，尽管经济较落后，但物产丰富，可谓地大物博。自华北、华中和华南大部分地区沦陷，国民党政府西迁后，它已成为仅次于四川的重要省份，是其人力、物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它又是重庆大后方通达国外的主要门户，滇缅公路是当时国外物资供应的交通路线，昆明机场成为飞航重庆、香港和印度间最忙碌的中国机场。云南的向背，关系到整个抗战全局，也直接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因此，非得做好龙云的“争取”工作不可。

李根源首先跑来劝告。李是国民党的元老、云南军政界老前辈，论资历，龙云还是李的学生的学生，因此李在云南颇有威信，龙云对他也十分敬重。那时他正在昆明，得知龙云似有拥汪举动，就亲自前去见龙，点明问题的危险性：

“若你发出通电，一小时后，你就会被消灭”，李根源说：“你的通电发出，中央（指重庆国民党中央）的飞机就轰炸你。你首先被解决无疑。”当时国民党空军部队确有两架轰炸机正停在昆明机场。

龙云听后便问：“依老前辈的意思，应如何办呢？”

李说：“你这个通电不发就行了。你没有行动，中央也不会追究，你就没事了。”

对于李根源这番话，龙云当然不会不加以考虑。在争取龙云过程中，唐生智的作用最显著。唐是湖南东安人，字孟潇，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诸战役。一九二六年响应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后历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武汉国民政府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汪精卫出逃后，唐生智曾奉蒋介石之令亲赴昆明，做龙云的工作，他把自己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跟汪精卫“吃亏上当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龙云。说：“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要龙云警惕，并告诫他：民族大义，千古是非，“在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

在唐生智等人的工作下，龙云面对现实，最终未按汪精卫集团的愿望行止。而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使汪精卫一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

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第75页。

《唐生智致蒋介石之养电》（1939年4月22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六 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

近卫“三原则”是什么货色

汪精卫一伙逃至河内后，汪夫妇就住在朱墙德夫人的别墅里，因这里仅有一幢较小的花园洋房，其他人住不下则寄寓于市内都城饭店。由于联系不便，同时也为了保密，他们又一起移至河内西北一处名为“丹岛”的避暑地。那是一座海拔二千四百米的石灰山，每逢盛夏，这儿游客很多，十分热闹，只是眼下为隆冬季节，除汪等一班人外，显得较冷清。

对于汪精卫的出逃，日本方面开始因其未按重光堂会谈所规定的时间，近卫文麿不得不停止发表声明。留在上海专候汪精卫行动情报的今井武夫，非常焦急。于是，他在十二月七日即从上海出发，经福冈、台北，十二日到达香港，与高宗武联络。至二十日，今井得到了汪到达河内的确实消息，立刻电告参谋本部，并转达汪精卫要求近卫首相发表早已商定好了的声明。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东京时间八点二十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他宣称：日本政府在“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的第三次对华声明。

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发表，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两种意见激烈斗争、互相折冲的结果。过去的“不扩大派”如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人，现在又被自己的同僚们称之为“和平亲善派”，他们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伟大潮流面前，悟出一条道理：中国的民族意识是不可以征服的，诉诸武力解决不了这场肮脏。因此，他们竭力从事对汪精卫工作的开展，以便从另一条途径走向大东亚的王道乐土。他们直接参加了重光堂会谈，是引诱汪逃离中国抗日阵营的始作俑者。在汪精卫等人出逃之前，他们虽一度担心上当受骗，但一接到汪出逃的通知，便力促日本政府尽快发表声明，主张在道义上承认重光堂协议。与此相反，过去的“扩大派”。此时又成了所谓“强硬路线派”，当汪精卫逃离重庆后，他们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汪浪潮”，对汪的意图表示轻贱和不信任。在他们看来，只有跟重庆打交道才能解决战争。这批人，这时在陆军参谋本部占据很大的优势，他们特别反对重光堂协议中规定对华军事占领的任何限期。刚刚继多田骏中将任参谋次长的中岛铁藏中将和他的部下富永恭次少将，明确表示“坚决拒绝承认”近卫声明有上述规定的内容。富永声称：战胜国就是不能向战败国作出承诺规定自己撤军的期限，任何这类承诺，将对前方的将士是一个不可宽宥的污辱。他还说，他决不会因为重光堂会谈时许下的那些诺言而动摇，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影佐等人个人的许诺，对他不会有什么约束力。

在这种处境下，近卫一方面不能不敷衍“和平亲善派”所要求承诺重光堂协议的主张，因而在他的声明中一字不差地重述了重光堂密约中所规定的十二个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服于“强硬路线派”的压力。近卫“三原则”正是这两派主张的掺杂的产物。“强硬路线派”的得意之作，即为同年十一月底日本御前会议所通过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这个政策性的文件，比重光堂密约更反映

[日]《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1938年12月22日），[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7页。

出日本独占中国的画面。该《方针》赤裸裸地宣称：“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的原则加以策划”，据此，该《方针》不仅重申要实现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使三国“融合一致，互相合作”，发展“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关系。同时更强调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性，甚至将上海、青岛、厦门等地也“规定为特别行政区”，并规定对新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得派遣顾问，以保证日本的最高控制权，这就是该《方针》所规定的“善邻友好”原则！这些词句在重光堂密约中是看不到的，而近卫声明则用那种“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要求中国“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等等一些外交上惯用的含混词藻，来表达“善邻友好”原则。

所谓“经济提携”，近卫也如法炮制，用“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实行中日之间的“紧密经济提携”，“只求日华的花携和合作发生实效”等外交辞令表述。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却直言不讳地提出“日满华三国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基此要旨，“对华北、蒙疆的开发利用”，必须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国的需要。尤其在以上地区及其他地区，“关于特定资源的开发”，日本应享受“特殊便利”；对农业的“改良”，要“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在贸易方面，应“采用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日满华之间的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对于整个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华北铁路、日华之间和中国沿海的海运、长江的水运和华北、长江下游的通讯事业，统统作为“日华方面合作的重点”。

所谓“共同防共”，那只是日军在中国“任意驻军”的代名词。《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在强调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主要地区驻扎必要的军队”外，还强调对于南京、上海、杭州等三角地带无期限的“继续驻扎”，并规定“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与此有关的地点应驻扎若干舰艇部队”；“在长江和中国沿海，应拥有舰艇航行停泊的自由”。最后规定日军对于所驻扎的一切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以及重要港口水路，“一概保留军事上的要求权和监督权”。这种贪婪的帝国主义企图，虽然在近卫声明的字面上找不到，但近卫声明却避而不谈在内蒙这个“特殊防共区承认日本防共驻兵”以外，在其他占领区之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等重光堂密约所规定的条款。当然，这一声明中还有类似所谓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考虑“对中国为完全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等空泛之词，那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日本政府这样做，是考虑到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真正意图，在于表示其对中国的“宽大”，以分化中国的抗日阵线，进而引诱蒋介石来谈和，因而它不能把《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内容，搬到声明里去，公诸于世；而又不能不重复重光堂密约

[日]《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1938年11月30日），[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5—406页。

同上书，第407页。

同上书，第407页。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5—406页。

某些原则性的话，用含糊的。模棱两可的词句表达日本的要求，实际上将来要达到的还是《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所规定的要求。

十分明显，近卫“三原则”不过是《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这一文件的外交版而已。难怪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看到后，抱怨这声明“确实写得不妥当”，他们感到失望，意识到日汪间的“和平运动”前途茫茫。今井武夫则把近卫“三原则”同《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相提并论，说它们都是“片面的、强迫性的”，是“以过去的‘权益思想’为根据的”，跟重光堂会谈中日方所强调的东西相距很大。然而，那些“强硬路线派”，还认为近卫声明太软弱了，是近卫优柔寡断外交的进一步明证。

近卫声明一发表，重庆蒋介石集团起而反驳。二十四日，蒋介石要端纳通知英美大使馆，说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言和，并且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同时，蒋介石又要陈布雷为他起草驳斥近卫声明的题为《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讲演稿。二十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这篇长达九千余字的讲演稿，说近卫的声明虽然“表面是空泛支离，而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希望“国民知道警戒，也让世界友邦明瞭日本的野心阴谋”。此文语气甚为激烈，说明蒋介石集团并不愿意按照日方的条件谈和。道理很简单：日方的招降条件是一条导致重庆蒋介石政府走向灭亡之路。投降卖国就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受到历史的惩罚，这一点，蒋介石比汪精工的大脑要清醒得多。

此时，汪精卫正在“丹岛”避暑地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里养腿伤。对于近卫声明，汪虽然认为与重光堂密约相差甚大，觉察到“日本变了卦”，但他又不愿回头。当近卫声明一发表，汪即在“卧榻中起草声明”，以为响应。十二月二十四日，汪致电蒋介石，说什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二十八日又写了一封信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最高国防会议，建议对于近卫“三原则”予以接受，“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对重庆国民党劝降。信中，汪精卫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这种挑拨离间的伎俩，是汪精卫集团仇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破坏国共合作的又一次拙劣表演。

汪精卫逃至河内后，对日本和国内的反映一无所知，因此心神不定，日夜沉思，一日忽跌在地板上，将一腿跌伤。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67页。

《龙云转呈汪精卫自河内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4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汪精卫：《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信》（1938年12月28日）。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5—6页。

《艳电》的出笼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携带了汪精卫响应近卫文麿第三次对华声明的电文稿，由河内飞抵香港。他们的任务是：将此电文稿交给林柏生，让他在其控制的《南华日报》上发表。

根据临行前汪精卫的嘱咐，他们三人一下飞机，就由陈公博出面，将汪的电文交给当时在港闲居的顾孟余，希望能得到顾的支持。不料，当顾看完以后，表示坚决反对，对陈公博说：“这电文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并表示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指汪精卫）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失误，一切由我负责。”顾孟余是河北宛平人，生于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原名兆熊。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一九二二年返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经济系主任及教务长。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追随汪精卫。大革命失败后，与陈公博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办起《前进》杂志，参加反蒋大合唱。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作，顾也随之到南京，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铁道部部长等职。抗战开始后，他任宣传部部长，但始终并未莅任视事，而是飘然远行，蛰居香港，对汪精卫出逃前暗中通敌的详细情况，一无所闻。顾孟余同汪精卫有很深的历史关系，长期以来与陈公博同为汪的左右手，这次顾孟余能明民族大义，极力反对汪发表《艳电》，并随后即离开香港去重庆，比之于陈公博虽不同意汪与日谋和主张，却仍然随汪离开抗日阵营，后来终于落水当了大汉奸，实相回异。

陈公博听了顾孟余的话，就去找周佛海商量。

周佛海自河内到港后，就住在九龙塘约道五号一幢清水砖瓦砌成的独立式小洋房里。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手拿汽枪，一个身备匕首，日夜守卫着门口。按照当时香港当局的法律，私人不得备有自卫枪支，周宅有这样的布署，也算是上乘的警备了。

陈公博到了周家，将顾孟余的这番话转告给周佛海，周害怕自己的主张会告吹，不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陈公博听了，感到左右为难。不同意吧，周佛海那里不好交账，同意吧，顾孟余那里的情面撕不开。陈公博毕竟是个老政客，他将电文交给林柏生，让林去处理。

林柏生，别号石泉。一九二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广东信宜县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后执教于执信中学，任训育主任。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次年七月，又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林柏生经执信中学校长曾醒引荐，任汪的秘书。从此，林长期追随汪精卫，成了汪的亲信。一九二五年秋，林由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放》，第45页。

陈春圃：《汪精卫投放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放》，第45页。

执信中学是为纪念朱执信而创办的。

汪保荐，偕其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并与陈春圃同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选派的学员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人。次年九月，林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林柏生先后在国外、国内创办并主持了《留欧通讯》（后改为《留美通讯》）、《美洲民国日报》、纽约《民气报》、香港《南华日报》、上海《中华日报》等报刊，为汪精卫集团制造舆论，扩大政治影响。在汪精卫的提携下，一九三三年林柏生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华日报》经费无着，被迫停刊。林柏生奉命带了报社主要成员回到香港，除主持《南华日报》外，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创办“艺文研究会”在香港的变相分支机构——国际编译社，大肆鼓吹“反共媚日”谬论，是汪精卫“和平运动”中一个得心应手的重要骨干分子。

当陈公博将顾孟余的意见告诉林柏生时，林就干脆地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二十九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这一天，陈春圃去访陈公博，问他准备怎么办？陈说：“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难说话，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紧，现在无法来得及于二十九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电报往返磋商就谈不上。因为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终于送到《南华日报》，并于第二天刊登出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艳电》是汪精卫集团公开乞降的宣言书，全文充满了奴颜婢膝之媚态，公然吹捧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元赔偿军费之要求”，说“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说得娓娓动听，实际上只是为了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他们自己乞降的遮羞布。

《艳电》又是汪精卫集团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一份劝降书。说什么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因此，“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主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艳电》还重弹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滥言，叫嚷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否则，“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露出了一副凶相。

当然，《艳电》也委婉地道出了汪精卫集团对近卫声明的不满。由于近卫声明只字未提重光堂密约所规定的撤军问题，使汪感到难堪。他在《艳电》中写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所谓“尤要者”，就是针对近卫声明而发的。“两卫”声明的这种矛盾之处，并不奇怪。日本要汪精卫出马“收拾时局”，绝对不是要把中国沦陷区交给汪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页。

“艳”是29日的电报代号。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页。

见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页。

精卫去管理，而是想通过汪精卫达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而汪精卫则幻想通过对日“和平运动”，建立起汪家王朝。双方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其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艳电》一发表，林柏生在香港的一班伙计立刻紧跟而上，在《南华日报》上连篇累牍地撰文以呼应。他们大叫“战难和也不易”，说什么“历史上无不和之战，否则双方须有一方灭亡”。林柏生更以“理论权威”的面孔，对《艳电》进行阐释。他要大家认识《艳电》的“重要意义”，说汪精卫此举，是“对党对国”“尽其责任之所当尽”，因此，“决非徒唱高调所能为力”，“凡我同胞，当解此旨，求其贯彻”。

在发表《艳电》，制造舆论的同时，汪精卫又要求日本以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通过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方提出四点希望：

- (一) 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 (二) 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 (三) 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 (四) 彻底轰炸重庆。

不难看出，这些希望的核心，就是希望日军加重军事压力，加快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以便支持汪精卫上台“收拾时局”，实现其当“儿皇帝”的野心。

但是，《艳电》的欺骗宣传和汪精卫集团的险恶用心，很快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艳电》一出笼，立刻就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汪精卫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抗战之力量”。同一天，《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接着又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艳电》所散布的投降理论，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罪行。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汪精卫的逃跑，“表示了中国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开始分裂”，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

一股反汪讨逆的巨大声浪迅速掀起。时在香港的国民党老前辈何香凝发表文章，指出汪精卫的《艳电》，“其所提议各点，措词恍惚，均只从如何执行‘日本政府所提议者’出发，将近卫声明响应一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揭露汪精卫以向中央“建议”的形式，破坏整个抗日方针；以挑拨国共两党情感的“方法”，妄想“在业已不成问题之地方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3辑《中国之部》，第1—4页。

《渡边工作现况》，转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26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册，第1008页。

行政军队问题上挑拨出弥天大祸之后，便好来给‘善邻友邦’开出渔人得利的门径”；对三民主义的歪曲，“来动摇国民大众对三民主义的信念，好让‘友邦的王道主义’收拾人心”。何香凝勉励全国人民“万不要被这些荒谬论调迷惑”。“万众一心，向着胜利的坦途迈进”。国民党军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等战区的高级将领和所辖各省政府机关，以及广西、甘肃、广东、湖南、江西、山东、新疆、河南、浙江、湖北等省政府官员和民众团体，一致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汪“明令通缉究办”。海外华侨也纷纷来电，责斥汪精卫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赞同日本提出的亡国条件，“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坚决主张“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定国法，而定人心。”为汪寄予厚望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人也通电指斥汪的《艳电》是“谬论谬辞，为敌张目”，“挠阻抗战，淆乱是非”，要求对汪精卫“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西康刘文辉也以“汪言行逾范”，表示“率全省党政军民竭诚拥护中央”，对汪精卫的“严峻处分”。而龙云虽未发表通电公开谴责，但在致蒋介石电文中，指出“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他还建议蒋介石最好“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至五月初，龙云也公开通电，表示“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汪精卫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转引自绍武：《汪精卫叛国秘记》，1939年初版，第21—28页。

《陈嘉庚请通缉汪精卫归案致蒋介石之世电》（1938年12月31日），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6年3月版第72页。

《张发奎等以汪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之微电》（1939年1月5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刘文辉以汪言行逾范率全省党政军民竭诚拥护中央严格处分致蒋介石之真电》（1939年1月11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龙云以汪主和对内毫无影响此后如有所闻当随时报告致蒋介石之歌电》（1939年1月5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龙云自陈昌祖处悉汪居河内情形建议劝汪回国免其铤而走险致蒋介石之鱼电》（1939年1月6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龙云通电》，《云南日报》1939年5月4日。

谷正鼎游说无效

《艳电》的发表，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的主要标志，也说明这个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公开分裂。

汪精卫出逃后，蒋介石对此讳莫如深，下令各报严密封锁。

于是，重庆大后方各界人士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许多人还不知道汪的去向，有的说汪尚在昆明，有的说他已到了河内，还有的说他去的是香港。就连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们，在迟至汪精卫离渝十天之后，还不知道他到了哪里。事后《大公报》记者曾访问过当时在香港的参政员张一麟时，张说：“二十九日（即汪精卫发表《艳电》之日）那天参政会副议长张伯苓来一个电报，请我们找汪精卫，这时他的通电还没有在报上登出来。但我们找过好几个地方，都找不着，曾仲鸣的家也找过，可是连曾也不在哩！”然而，汪精卫毕竟是一个为全国所瞩目的政界人物，隐瞒事实非但不可能，反而为引起内部更大的混乱。为了敷衍舆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新闻机关发布如下消息：

“汪副总裁前经四川省党部各县干部训练班程天放主任之约，赴成都讲演，又因龙主席约游昆明，本拟于月初赴约，旋因中央有重要会议，延迟多日，于本月十八日乘机赴昆明，预定三四日后返经成都，向全省干部人员训话后返渝，十九日此间友人接电，谓因高度飞行，在机上即感不适，下机后脉搏间断，延医诊视，谓系旧疾复发，须认真调治，二十一日复有电告其友，谓已至河内，就某素识之法国医生医治，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回渝。”

二十六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声称汪的出走与军政当局均无关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还说汪精卫如对于国策有所主张，“则以汪先生与中央同人，尤其与中正个人久共患难之深切关系，无话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见，亦必在中央公开或私人相互讨论”，因此，“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冲淡汪精卫出走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为汪留有余地。待《艳电》发表，汪精卫对日乞和的政治主张已公诸于众，舆论大哗。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九年元旦，重庆国民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临时中常会，讨论对汪精卫发表《艳电》的处置。开始蒋“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咐陈布雷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俊悔余地”，但会上“群情激昂”，“均极愤慨”。最后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通过了由吴敬恒起草的决议案，上面写道：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35—338页。

《新蜀报》1938年12月24日。

《新蜀报》1938年12月27日。

《陈布雷回忆录》第140页。

吴敬恒（1865—1953）江苏武进人。原名眺，字稚晖。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与汪精卫、李石曾等人，在上海组织“进德会”，标榜“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六不主义。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后追随蒋介石，主张清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与汪精卫成为政敌。汪逃离重庆后，吴力主严惩。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日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悖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光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兽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

然而，蒋介石对汪精卫仍未下令通缉。会后，他曾解释说：

“当此次开除（汪精卫）党籍决议时，本有通缉令同时并发一项，金以汪之言行，不仅违反党纪，而且毁坏国法也，卒因中正力加阻止乃已。”同时，蒋还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他“翻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蒋知道，汪在国民党内的历史深长，有较大的影响，何况留在重庆的与汪接近的人就有不少。因此，蒋虽不希望汪能马上就回重庆，但最好能赴欧休养，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对留渝的原汪派的人蒋也进行安抚，说“这一次对汪先生的处分，实在是迫不得已，平日和汪先生接近的朋友应安心工作，不要灰心，不要猜疑。”

出于上述考虑，蒋介石在汪精卫出逃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采取软的一手，对汪进行“劝阻”。《艳电》发表前，时任驻英大使郭泰祺就奉蒋介石之令，一再电陈汪精卫，“历述英政府对近卫宣言之反响，及英国舆论与最近国际情势”，“切劝其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并希望汪精卫早日来欧洲休养，自己愿意辞职当他的随从。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在开除了汪党籍后一个半月，蒋介石又秘密派遣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

谷正鼎是国民党改组派老人，同他的哥哥谷正纲一样，都是汪精卫过去的心腹部下。谷正鼎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去见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

“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谷也力劝汪，对和战问题可以谈，主张可以表示，但要不再有第二步的行动，将来还可与蒋合作并取得谅解。

汪精卫一听，断定蒋介石在耍花招，要断绝他的通敌之路，因此极为反感，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若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星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

《国民党中央之重要决议》（1939年1月1日），见绍武：《汪精卫叛国秘记》，第20—21页。

《蒋介石对汪案处置致龙云之庚电》（1939年1月8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国民党中宣部为汪兆铭投敌致各级党部的对内指示》（1939年1月1日），见绍武：《汪精卫叛国秘记》，第16页。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

《郭泰祺劝汪勿公开主和并赴欧休养呈蒋介石之俭电》（1938年12月28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回忆纪实》。

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阱，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照？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送回给他安排。”说到这里，汪又以“党国元老”的口吻说：“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指蒋介石）

如把党国搞得不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谈话间，汪精卫还一再向谷正鼎表示他始终坚持“和议”的立场，对于开除他的党籍及撤销他的职务，十分愤慨，说“中央”应先讨论他的主张，“如经一致否决，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并责怪“党内同志”对他缺乏信心，既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不能和他共同进退。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便告辞而去。

在这同时，原汪精卫的一些朋友和部下，也先后对汪精卫进行规劝。时任行政院秘书陈某，在致汪函中，说由于开除了汪的党籍，“更使早日服膺先生（指汪精卫）者，为之丧气”。他委婉地提出数点，请汪精卫考虑：

（一）在现时情势之下，与敌言和，能否保存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致重蹈朝鲜琉球之覆辙？此为最可忧虑之点；

（二）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之可能，而近卫演说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

（三）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径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四）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至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未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五）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将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六）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具体计划？否则不免徒乱人耳目而已；

（七）或者明知和谈不能成功，亦无任何具体计划，只为良心所安与责任所在，遂不暇计及成败毁誉，亦不问手续之是否合法，遂毅然出此；果属如是，亦请示明。

上述诸点，与其说是“规劝”，还不如说是责问。然而，汪精卫对此置若罔闻，这就是他的悲局所在。同汪一样，周佛海也对所谓“和平运动”，早已铁了心。周佛海出逃后，蒋介石也曾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晤周，想劝他回心转意，返回重庆。《艳电》发表后，当萧同兹奉命约他会面时，周托词拒绝，萧同兹的“工作”也终于落空。

汪精卫、周佛海一伙正沿着投敌之路，向前迈去。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1954年11月29日），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6—447页。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

“三委员会”应运而生

为了便于今后对日“和平”工作的开展，汪精卫一到河内，就指定了由汪本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怕生等八个所谓“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随后又与陈、周、陶及陈璧君诸人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决定成立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军委均由汪精卫自任主任委员，财委主任委员由周佛海充任。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为政务委员，周、陈同时又是军事委员。周佛海还分别兼任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因此，周的权力最大。

“三个委员会”是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初的最高领导核心，为保密起见，汪精卫还拟定了他们在电报上所用的代号：汪精卫的代号为“昭”（后改为“明”）；陈璧君为“兰”（后改为“菊”）；

陈公博为“群”，周佛海为“典”；陶希圣为“学”，梅思平为“福”；高宗武为“深”；林怕生为“琇”；打前站的陈春圃代号为“农”。

《艳电》发表后，汪精卫处于寝食不安的气氛中。国内掀起的反汪声浪，冲涮了他的历史与虚名；国民党中央对他作出的开除党籍处分决定，叫他苦痛万状。更使他踟蹰与徬徨的是，日本当局政潮的起伏。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刚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近卫文麿在内外交困之中突然宣布辞职，继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因为与影佐祯昭等人责无渊源，对前任所肇始的汪日“和平运动”又不感兴趣。于是，汪精卫被搁置在河内，大有被遗弃的感觉。汪不得不哀叹：“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悲哀、凄凉的情绪，溢于言表。

二月一日，高宗武由香港抵达河内。为了及早了解平沼内阁的对汪政策，以决定今后的行止，汪精卫与高宗武关起了门，以每天七、八小时的长时间，整整讨论了五天，拟定了如下方案：

第一方案 日本和蒋介石妥协

本方案对收拾时局最宜，只要日本承认便可。本人和蒋介石在政治上虽不能共事，但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促成之。

第二方案

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的统一，如果认为可以，自己则以在野身份加以援助。

第三方案

如果日本认为以汪兆铭为收拾时局最恰当的人，则要求：（一）由他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再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重新建设军事，（二）在日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再次发表声明，宣布由他收拾时局，担当实现和平的负责人，并号召西南各将领通电响应；（三）与日本当局会见，发表共同宣言；（四）以十月十日为期，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同时马上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五）与日本协商借款两亿元。在此以前，每月需要三百万元左右的活动经费。

说来令人费解，汪精卫不是早就已经宣布过他同蒋介石势不两立了，何故在他的方案中仍把日本与蒋介石妥协，以及声称让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等人出马作为条款提出来呢？过去，汪曾标榜自己不是另起炉灶，而是

为了促使国民政府与日本谈和，而近卫声明只是原则，仅提出要“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现在平沼内阁上台以后，还没有明确表态。汪精卫提出这样的条款，就是施放一种试探性气球，藉此弄清日方的真实意图。

在上述方案中，汪精卫还把建立伪政权的地点作了更改。重光堂会谈决定“在非占领区的云南和四川省建立独立政权”，在上述方案中则改为“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南京此时早已沦陷，要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方建立政权，其后果如何，汪精卫是清楚的。只是《艳电》发表后，汪日双方在重光堂会谈时预先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陈济棠、何健、张发奎等人及四川军队将领，非但没有附和，相反参予声讨，而龙云也通过陈璧君之弟、昆明飞机制造厂副经理陈昌祖转告汪，蒋对开除其党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蒋的心中始终为汪留余地，请汪不妄误会。总之，汪精卫企图在云南四川等省建立政权的设想已经落空，形格势禁，实非更改不可。

二月二十一日，高宗武携带上述方案赴日，在长崎登陆，然后改乘飞机至东京，会见了平沼内阁政府要人，向他们转达了汪精卫的意见：

- 一、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
- 二、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
- 三、如果要汪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汪的这种态度，得到了平沼内阁的赞赏。高宗武此行，收效甚大。三月十八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将平沼内阁政府支持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口头决定面告高宗武。汪精卫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一扫过去对日本方面的疑忌。

就在对日试探的同时，汪精卫一伙又积极拉人下水，以扩充投敌的队伍。

周佛海首先以财委主任、政委、军委秘书长三重身份，在港开展活动。他把香港金融界实力派人物、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请来，要他多多帮忙。果然，唐没有辜负周的“期望”。当时国民党留港的中央、交通两行及四行（指北四行，即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的财神们，对汪精卫《艳电》中那一套“大义名分”的说辞，有所动心，他们估计到汪政权有出场的可能性，因此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公推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及唐寿民出面，筹港币二十万元，作为汪精卫集团的活动经费。但在交款的一刹那，出现了一点枝节。原来，“银主”方面由唐寿民出面，汪方由陈公博一人代表。唐是钱铺学徒出身，市侩气重，要陈公博立个手续，在收条上签字。陈听了大怒，加以拒绝，拂袖而去。还是周佛海“世故”，他笑着对陈公博说：“这有什么关系呢？签什么样的字，都签给他们好了。试问，我们要一帆风顺成立政府，还怕他们来要债吗？否则我们一败涂地，亡命四方，他们又有谁敢出来提这一件事呢？”于是，由周佛海向周作民交涉，取到了这笔巨款。

除此而外，周佛海还在香港物色对象，网罗党羽。当时，凡在港参加汪伪集团的人，先由政委通过，然后由财委发给生活费。陈公博自《艳电》发表后表示消极，以照顾老母为名，极少参加活动；陈璧君往返香港、河内间进行联络，又不常住香港，汪精卫远在河内，鞭长莫及，一切实际工作，都由周佛海承担。周最先拉了叶蓬入伙。叶是湖北黄陂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他在从军期间，曾做了三年排长，郁郁不得志，后靠了他妻子蓝袖邨的资助，爬上了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的高位，但他狂嫖滥赌，为世人所不齿，最后仍然下台。这个失意军人，在汪精卫《艳

电》发表后，即与周佛海取得联系，并以第一个军人下水者而自负。至于当时在香港的文化人，第一个为周佛海拉下水的要数樊仲云。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文化特务，是以“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相标榜的所谓十大教授之一。抗战开始后他又是“艺文研究会”的研究员之一，樊仲云的投敌，使汪精卫集团又多了一个摇笔杆子的人。

这时，在河内的汪精卫也亲自派周化人，带了钱到重庆活动。周化人是改组派分子，与汪精卫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因他在一九三六年津浦铁路副局长交卸后，当时任铁道部长的顾孟余以考察铁路的名义派他赴英国。汪的《艳电》发表后，他从国外回来，即附汪投敌，并受汪命以汇报考察情况为名，到重庆去拉人。周到重庆后见了汪派人物，先转达汪精卫对他们的“关心”，然后给他们送上“旅费”，要他们见机前来投奔。但许多人“拒绝接受”，周化人只拉了几个小脚色前来充数。

鉴于汪精卫集团的活动，蒋介石看到用“软”的一手已经失灵，于是决定采用“硬”的一手。长期与蒋争斗角逐的汪精卫也有所觉察，他在谷正鼎走后，就曾警告陈璧君和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指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果然不久，一起轰动一时的河内刺杀案发生了。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1954年11月29日），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7页。

七 高朗街血案

军统特务跟踪而来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突然接到一道发自香港而由重庆转至天津的“十万火急”电令，要他克日往香港待命。

电报是戴笠发来的。戴笠，字雨农，小名春风，浙江江山人。他生于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一九二六年进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未毕业便当了蒋介石的副官和参谋，以后戴笠和张炎元、周伟龙、梁干乔等人结成“十人团”，正式领有经费，从事情报活动。一九三二年复兴社设立特务处，戴笠任处长。后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任第二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戴任副局长，主持实际工作。“军统局”完全以蒋介石马首是瞻，而戴笠又是“军统局”的化身，人称“戴老板”，有他发来的“十万火急”电令，陈恭澍岂敢怠慢？他立刻启程，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货船，从天津经上海，改乘荷兰渣华公司芝沙丹尼号邮轮抵达香港，去接受任务。

陈恭澍到香港后，即被约到半山区薄扶林道的高级住宅区去见戴笠。两人见面后，戴笠就说：“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军统）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陈感到迷惘，便去问王。王系山东人，国民党警官学校毕业，原是戴的侍卫。两人寒暄之后，陈问道：

“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

王告诉他：“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第二天，戴笠偕同陈恭澍、王鲁翘等人搭机飞往河内。先他们十多天到达河内的是方炳西。方曾留学比利时，攻读政治外交，回国后为戴笠所罗致，参加了军统。这次，他遵戴笠的指令，在河内一处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有两间卧室，楼下是客厅连饭厅。戴笠等一行到河内后，即被安排在这里。这幢房子也就成了军统“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到河内第二天晚上，戴笠才说出了此行的任务。他首先介绍了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的大概经过，并特地将一份刊有汪精卫《艳电》的剪报给他们看，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布：

“我们这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在不断的与日本方百保持接触中。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望。”

戴笠所说的“上峰”，就是蒋介石。汪精卫《艳电》发表后，蒋介石在先后派遣萧同兹、谷正鼎等人奔赴香港、河内对周佛海、汪精卫等人进行“游说”的同时，又令军统特务跟踪而往河内，对汪进行监视。因此，戴笠在点明不要辜负“上峰”的期望后，极严肃地说：“希望大家能体认到这件事的特殊性和严重性，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不当，将会惹出麻烦，甚至产生反效果；你们可要特别小心谨慎。”接着，戴笠指令此项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38 年 5 月版，第 34 页。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第 39—40 页。

工作由陈恭澍负责，并布置了具体任务。他说：“在任务方面，我现在可以决定的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马上就通报。我们经常保持联络。”

戴笠布置就绪，就独自飞往重庆复命。为了行动方便起见，此时在河内的军统特务陈恭澍、方炳西、王鲁翘三人组成临时“工作组”，由陈任组长。

戴笠所交待的任务，虽然看上去很简单，可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原来，陈恭澍等人则到河内，由于人地生疏，对汪精卫等人的活动情况一无所知，就是连汪的住宅也还没有“查”出来。据得来的情报资料，有的说汪隐居在一个无名小岛上，也有的说汪在铁路饭店或大陆饭店辟有房间；还有的说汪到河内后就寄居在老朋友家里……象这样有头无尾的消息，该怎样确定汪到底住在哪里？连汪的住宅都搞不明白，还谈得上什么“监视”？“工作组”的活动一时无法开展。

偏偏在这个时候，刚到重庆的戴笠打来电报，电文大意是：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逕行去欧，是否有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陈接到电报，心里紧张，按照军统的“家法”，如果完成不了任务，轻者要受责备，重者可能判刑。正当陈茫无头绪之际，戴笠又从重庆来电，催询陈联络“徐先生”的事，还特别关照他：“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徐先生”磋商，任何工作要求，亦无妨“谘请办理”。于是，陈恭澍才想起戴笠临行前向他推荐的那个称为“徐先生”的神秘人物。他是戴笠在河内的重要耳目。此人是江苏无锡人，约莫四十多岁，曾留学欧美，他的地位也很特殊，既能够在当地的华侨中享有声誉，又与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们交往甚密，更与安南法国籍总监结为知己，因此神通广大，据说可以提供“高级情报”。戴笠还交代陈恭澍，只让他亲自我徐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去找他。

按照戴笠的吩咐，陈恭澍就与徐取得了联系，徐当即表示愿意协助他们的“工作”，不过只限于幕后而已。当陈面告他设法查明汪精卫的去向时，徐轻描淡写地回答说：“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当然指徐的那些外国朋友了。

就在当天下午，“徐先生”果然打发人我到陈恭澍的住处，答复了他的问题。但陈怕传言或有误差，于是亲自前往面晤徐。徐说：“汪先生的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汪本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至于准备到那里去，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知。”这些情报，即由陈恭澍电告戴笠。

由于“徐先生”的帮助，军统河内“工作组”终于查证了汪精工一行的住宅。原先，汪精工住在“丹岛”多边斯加·泰尔乔旅馆。据汪自称，那时，他“在静寂的山上的旅馆中，翻译书籍，耽于过去的回忆及思索，来度过去。”

但不久，汪精卫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在活动，认为此地不宜再住下去，便迁移到了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第40—41页。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第109页。

同上。

汪精卫：《河内的正月》，转引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55页。

高朗街离河内闹区不远，但却很僻静，属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两旁还植有一排棕榈，中间有几棵高大挺拔的大王椰子，行人不多，显得十分幽静。二十七号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且有后门，还有角门，如由后门进出，要经过两道门。门前有一片草坪，匿居在这里的汪精卫象只见不得阳光的蝙蝠，大白天一直躲在楼里，一般不到这里散步。除汪精卫夫妇外，二十七号内还住着曾仲鸣、汪的秘书陈国琦等二十余人。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曾仲鸣，他每天进进出出，有时候多达四、五次。曾还在写有“pAUL“BEYT”字母的大陆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以便代表汪对外接触。一般要会见汪精卫的人，得先和曾仲鸣洽谈好，再由曾决定安排与汪见面。曾仲鸣也是一个生活糜烂之徒，据知情者回忆，曾每天晚上十时一过，等汪夫妇就寝后就出门逛窑子，直至深夜二、三时才回来，因不敢开铁门，怕声响惊醒汪夫妇，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降到院子再跑回卧室。这些情况，都为军统特务所掌握。汪夫妇历来对曾纵容溺爱，而全家大小又为曾所施的小恩小惠收买，所以汪夫妇对曾的行为竟颠顶到无所察觉。

随着军统特务在河内工作的进展，戴笠又陆续派人前来与他们会合。第一批派来三人，其中余乐醒曾任军统局临津特训班副主任，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张逢义系黄埔生，此人动枪动笔均行，在陈恭澍任军统北平站站长时，就是“行动组”组员；唐英杰则是陈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时的工作人员。不久又有两人结伴而来，他们是行伍出身，熟娴用枪，能连续发射的郑邦国和陈步云。陈恭澍暗自检阅了这个阵容，意识到这些人都是于“行动”的！

果然有一天，有个名叫曹师昂的人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从昆明飞至河内，约陈恭澍到他住宅，说有“机密大事”相告，陈急忙前往见面。曹告诉他，戴笠在他出发前为他饯行，并交给他一包东西代转陈恭澍。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支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从此以后，戴笠又派人从昆明、广西边境、香港等地携带了枪、械、弹、药（枪指手枪，械是板斧、利刃和钢锯，弹是子弹，药就是可以致人死命的毒药）。三月初，戴笠致电陈恭澍，要他们作好行动前的准备。

军统特务们知道：“做好行动前的准备”意味着什么。为了执行任务，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搞清楚汪精卫一行的生活起居。陈恭澍将侦察之事，责成在这方面有专长的唐英杰执行，要他无论多么艰险，必须设法潜入汪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至少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势，加以窥探才行。除此而外，还得决定取什么样的行动方式。

本来，军统特务在杀人时使用的手段一般分为“软性行动”和“硬性行动”两种。“软性行动”一般采用“无声武器”，指使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硬性行动”即使用“有声武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这要看被杀对象的防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而定。开始，他们曾设想采用前者。一天晚上，善于此术的余乐醒取出一个纸匣，打开后，里面有三个色样相同的玻璃瓶，整齐地排列在匣内。每个瓶里都装着无色液体，上面分别贴着A、B、C三个标志。余小心翼翼地拿起A瓶，摇了摇，解释说：“这种液体，无色无嗅，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9页。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52—53页。

也没有沉淀物质，如果注入体内，一滴就可马上致命，囓入食物里吞下去，也会很快因神经麻痹而失去知觉，如不立即施救，将永不苏醒。”于是，他们通过“徐先生”的联系，在附近的面包店定做了大大小小好几种面包，有长方形的枕头面包，俄国式的小型餐包，有两头尖的，也有编成麻花的。他们准备收买为汪宅送面包的本地人，将毒药注入面包内，送给汪去“享受”。不料，将注入毒药的面包切开查看，发现面包瓢里有淡黄色的斑点，其接触注入药水那一部分，结成了黄豆大的块状，而且近乎硬化了。这样子能叫人家看不出来吗？经过几次试验，军统特务们对以药物为主的“软性行动”，感到兴趣索然，于是决用采取“硬性行动”。

至此，“河内工作”转入了一个新阶段。军统特务处于“备战状态”，静候一声令下。

曾仲鸣当了替死鬼

正当军统特务潜入河内，对汪精卫一行的活动进行侦探之际，发表《艳电》的《南华日华》就成了被攻击的主要目标，林柏生也因此差点丧命。

一月上旬，时在香港的戴笠曾邀林柏生等人与他会面。当时，林作为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当然和戴笠是“同志”，因此，林表示同意，并请戴笠决定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几天后，林收到戴的信，上面写道：“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着；可以不可以到我们自己所属的阵营里来做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接着，又放出了火烧和殴打的空气。在一片恐怖气氛的笼罩下，《南华日报》排字房和印刷部工人纷纷离去，林柏生等人亦惶惶不可终日。

一月十六日早晨，香港警察厅政治部长通知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等人去谈话。次日中午，刚好从河内赶来的陈璧君约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到她寓所开会。午后三时，梅思平等人赴“告罗士打”饮茶，林柏生应约前去，在回去的路上，林途经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窜出两条汉子，从背后赶上来用二尺长的铁棒猛击林的头部，将他击倒在地。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凶手很快被发觉，其中一名叫陈林的当场被扭获，另一名乘机逃脱。林柏生经人送进玛丽医院抢救，才免于死。后来，林便改名换姓，隐藏起来。

林柏生在香港被狙击，是蒋介石集团对汪精卫一伙的警告，但汪不回头，河内的流血事件因而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凌晨二时许，戴笠从重庆打来极密电报，陈恭澍请人代译，电文大意是：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这是一份未曾加盖印信的“制裁令”！字数虽少，却含有三层意思：“着即”，表示时间概念之快，应从“现在起”；“对汪逆精卫”，是指制裁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就是给以最重的处分——死刑。

陈恭澍接到戴笠的电令，一面复电，声称“遵即积极进行”；一面召集全体特务人员，宣布了如下事项：

“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住所为攻击目标；

出动后，由本人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脱去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

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行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三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同志指挥；

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

出发的时间，自即刻起，请各同志在战备状况下，听候通知。”

《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险记——中日交涉秘话之二》，转引自《和运史话》，新中国报社 1943 年 7 月版，第 21—24 页。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第 195—196 页。

布置完毕，陈恭澍要各人作准备，好好休养，绝不能走开，免得临时找不到人。他自己则前往“徐先生”处讨教，徐希望他们做得干净俐落，千万不要拖泥带水。并要他们干得越快越好，以防夜长梦多。

其实，经过前一阶段的侦察，军统特务不仅摸清了“二十七号”周围的环境以及住宅内情况，也掌握了汪精卫等人的生活起居规律，并在汪宅四周派有密探，汪一有行动，即可获得情报。现在，“戴老板”命令已下，就专候时机了。

三月二十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上午九时许，汪精卫、陈璧君等分乘两辆黑色轿车，离开汪宅，前往位于河内至西贡间的游览地——三桃山，去解解闷气。这是一个可以下手的好机会！陈恭澍接到情报，立即带着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陈步英、张逢义六人驾驶福特牌小车尾追而来。车过红河大桥不久，他们便发现前面八、九百米处，这两辆黑色轿车正停在跨旁的一块空地上。但陈恭澍心虚，害怕车上有越南警察，也怀疑汪精卫是否真在车上，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驱车去看个究竟。车子速度太快，有如浮光掠影，但还是看到车上确有汪夫妇和曾仲鸣等人。当陈恭澍的车子开过载汪的黑色轿车几十公尺时，载汪的车子突然开动，沿着原路疾驰而去。军统特务追赶不及，失去了一次“良机”。

当天下午四时，陈恭澍又接到一份电报，说汪精卫夫妇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谈话，似乎在争论什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陈当即召集王鲁翘、张逢义两人，随他一起出发。他们奔上汽车，直驶高朗街而去。可一到那儿，门前查无一人，二十七号大门紧闭着，和往常一样显得十分冷清。

扑了两次空，这批以杀人为职业的特务分子十分光火。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汪宅进行一次夜间突击性强攻。第二天晚上十一时四十分，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张逢义、陈步云等六人，仍由陈恭澍驾车，乘着夜色，前往汪宅。

高朗街二十七号汪宅的左邻右舍，大多住的是法国人。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所居住的地方，当然成了高级住宅区。因此平日行人疏落，车马稀少，一到深夜，那高耸的大王椰子和参差丛丛的老榕树，一经夜风吹动，树枝摇曳，犹如魔影怪手，显得阴森森的。“二十七号”一面紧靠另一幢楼房，一面单边，是巷道。沿着巷道走，就是它的后门。陈恭澍将王鲁翘等六人送到那里，令张逢义、陈步英留着呼应，其他四人逾墙而过。

陈邦国力大身粗，勇猛强悍，由他当开路先锋，唐英杰事先几次前来侦察，就由他在前引导登楼。他们劈开楼下的小门，飞步跃入三楼，冲进预先侦察好了的汪精卫房门外，用利斧将木制的房门劈开一个大窟窿。这时，汪宅一片漆黑，特务们凭手电光，发现屋内有一男一女，男的正趴在床底下，腰背双腿却露在外面，女的也缩成一团。这不就是汪精卫夫妇吗？他们立刻开枪射击，这一对男女应声倒在血泊之中。特务们以为目的已达，仓惶逃跑，当地军警闻讯赶到，将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三人捕获。

枪声一停，凶手远飏，汪宅的人才跑出来大呼“救命”。一查，被击倒的男女西人却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将卧室让与他们，自己住到隔壁房间，因而毫毛无损，曾仲鸣却“被击中数十枪，其夫人亦中三枪”，待被送往医院没几小时，便一命呜呼，当了替死鬼。

曾仲鸣，一八九六年生于福建福州一家贫苦的书香门第，由寡母和大姐曾醒抚养成人。一九二一年，曾醒与其亡夫的两个弟弟方声涛、方声洞及妹妹方君瑛东渡日本留学。一九二五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曾醒与方氏兄妹三人同时加入同盟会，一时在留学生中传为佳话。由于共同加入反清革命斗争的行列，曾醒、方君瑛等与汪精卫、陈璧君如同一家。一九一二年，曾醒、方君瑛以官费留学法国，曾仲鸣亦随往，他们与汪精卫、陈璧君等住在一起。曾先后就读于波尔多大学、里昂大学。期间，他在汪精卫的指导下，学文习字，并模仿汪的笔迹，日子一久，与汪所写维肖维妙，几可以乱真。加上曾仲鸣办事精明，因而倍受汪精卫宠爱。从一九二五年七月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开始，曾仲鸣就一直在汪的身边，形影不离。由于汪的提携，曾历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副秘书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铁道部、交通部次长，是汪精卫最亲近的心腹。汪逃至河内后，又将曾仲鸣留在身边，为他处理一切事务。

曾仲鸣一死，顿时断了汪精卫的一只臂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使汪感到万分悲痛，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写下了《曾仲鸣先生行状》，哀叹：

“呜呼！余（汪精卫自称）诚不意今日乃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指汪对曾尊称）来视余，戚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一瞑弗视也。国亭至此，死者已矣，生者当以死继之，其有济于国与否，未可知也！即幸而济，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汪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中，汪精卫还详细记述了曾仲鸣一生的经历以及同他的深厚渊源，表示自己要继续曾的“遗志”，以从事“和平运动”。

然而，由于林柏生被狙击、曾仲鸣被枪杀，香港和河内成了危险的地方，这不能不叫汪精卫胆战心惊，极度害怕。痛定思痛，激起他对蒋介石集团的重大仇恨，他决定对蒋进行反击。

鸣死后半个月所写的《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中也说：“凶徒数人，持械突入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但据陈恭澍所称，那晚执行任务的军统特务只开了三枪。汪夫妇身临其境，且陪曾夫妇同住医院，因此，此说似较可靠。

即民国二十四年，为1935年。

发表《举一个例》

汪精卫清楚地知道，他眼下的处境十分狼狈，既无一兵一卒，也无一寸地盘，要反击蒋介石，唯一的办法就是揭露他与日本“和谈”的内幕，为自己的求和寻找根据，以骗取舆论的同情。曾仲鸣一死，他就关起门来，整日蛰居屋内，准备写一篇文章反击。此时，汪已成惊弓之鸟，偶尔间他俯瞰高朗街街面，发现在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徘徊，还不断抬头向楼中窥察，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以防重演血案，汪立即将写字台从窗口移往墙边，才“安心”写作。

就这样，曾仲鸣死后第五天，三月二十七日，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即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了。江声称：“我国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

于是，汪精卫将自己出逃前偷偷携带的一份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公诸于世：

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

地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祥熙），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宠惠），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复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7页。

徐谟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的协约国集团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缔结和约会议。6月28日，签订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所有的殖民地由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以“委任统治”形

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指南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尤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

本人答：陶大使所提皆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

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汪精卫举出的这一例子，说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还说，象上述例子，虽然何止千万，但考虑到严守秘密之必要，就仅举出已成过去的陶德曼调停之事。写到这里，汪精卫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了三点质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举一个例》一发表，犹如一发冷炮，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一击。蒋介石骂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是捏造污蔑。但是，就在一片叫骂声中，吴稚晖却泄露了天机，他在一篇题为《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的文章中，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以泄漏秘密，处刑更严。”原来，汪文所据并非无中生有，而只是“泄露机密”而已。

当然，汪精卫的用意也并不只是想揭露蒋介石的谈和行径，藉此反击蒋介石集团的暗杀活动；同时更想用这个记录给自己的投敌卖国活动作辩解。

为了扩大影响，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又发表了《复华侨某君书》，他借

式加以瓜分。

即顾祝同，墨三是他的字。

即白崇禧，健生是他的字。

即唐生智，孟潇是他的字。

即徐永昌，次辰是他的字。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8—10页。

转引自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第263页。

吴稚晖：《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1939年4月11日），转引自国民党中宣部印：《汪兆铭通敌求降案有关文件》，第35页。

回答“某某老兄”的“怀疑”，重弹“如今抗战实实在在一无比一天艰难了”，“自抗战以来，所失去的地方，其幅员之多，时间之短，历史上宋亡明亡的时候，都无其例”等谰言。

宣扬“共产党所谓游击战，不过是流寇的别名”，要举发“共产党之趁火打劫”等反共谬论。标榜自己从抗战以来“时时刻刻想着抗战怎样可以持久，怎样可以获得胜利，同时也想着怎样可以觅得和平”。指责“重庆诸人”，对近卫声明和他的《艳电》，除了谩骂之外，看不见一些理性的话头”，假仁假义地要他们“幡然觉悟”，“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来讲和”。这一大篇汉奸怪论，同洋洋四万余字的《举一个例》互相补充，成为姊妹篇。

汪精卫《举一个例》的发表，进一步暴露了他自己屈膝求和的面目，因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汪讨逆新高潮。香港《申报》指出，汪精卫的“例”，“迎合日本侵略者之意，挑拨离间我全国的团结，破坏我政府政党与人民间的共信互信，以图实现破坏抗战出卖国家的阴谋。”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指出“汪逆贼心不死，如此作怪，似应早为防范”。四月十三日，龙云也致电蒋，责斥汪精卫“在外招摇，有意簧鼓”，“被敌利用”，表示“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汪精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处境更加孤立。

正当汪精卫一伙焦头烂额之际，日本政府派来了影佐祯昭，帮助他脱离危境，由此日汪间的勾结又进了一大步。

汪伪宣传部编：《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第21—28页。

《汪精卫的“例”》，香港《申报》，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

《冯玉祥呈蒋介石之蒸电》（1939年4月10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龙云呈蒋介石有函》（1939年4月13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八 潜赴上海

影佐祯昭赶来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即河内汪宅刺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政府接到其驻河内总领事的报告，当日召开五相会议，

商量对策，决定派遣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前往河内，根据汪精卫的意见，将他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再作进一步的磋商。

影佐接到命令后，考虑到他的身份，认为这种事不能光靠陆军单方面干，必须加进海军、外务省、兴亚院，可能的话，还得有民间人士。这一想法，得到了陆相板垣征四郎的同意，向有关方面提了要求。结果，外务省与兴亚院同意派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事务官矢野征记，后米内海相也答应派须贺彦次郎参加。影佐还特别推荐犬养健作助手。犬养健是日本前总理大臣犬养毅的儿子，时任众议院议员，递信省（交通部）参与官，为近卫文麿的智囊团人物，与近卫关系密切。同时，影佐又选择军医中佐大铃、宪兵准尉丸山、军曹（中士）松尾等人为随员。他们向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租赁了一艘五千五百吨的“北光丸”货船，专程前往越南。矢野征记和伊藤芳男等先坐飞机到河内。

这项任务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准备了整整两周。四月六日晚，影佐等一行即至九洲下牟田港，登上“北光丸”，第二天启碇。当船驶离海港一小时后，影佐才宣布此行的目的地在越南的海防。

“北光丸”在海上走了十天，于四月十六日黄昏，缓缓驶入越南红河。为了应付海关人员检查，影佐已经脱去军装，改穿西服。他告诉犬养健，此行负有特殊的秘密任务，必须隐瞒原来的身份，他自己将用日本糖业联合会的庶务课长的名义，犬养健则为该会的书记。而身份证明书已先由糖业联合会会长藤山爱一郎所签署，连两人的姓名也早被更易了。犬养健预先对此事一无所知，影佐向他交待任务后，他一面表示接受，一面为事前没有得到通知而深感遗憾。影佐再三向他表示歉意，说是为保守秘密而不得不这样做。

骗过了海关人员的检查，天已黑了。这时，日本驻越南领事馆武官门松少佐才匆匆赶到，他向影佐转达了领事馆的意见：

（一）预定当晚住宿于海防的石山旅馆，河内方面则已商定假台湾拓植株式会社河内支店长坂本的住宅为居停；

（二）此次“北光丸”开抵越南，系托辞为台湾装运铁矿石；

（三）与汪精卫方面联络的任务，由同盟通讯社

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指示该社的越南特派员大屋久寿雄负责。

在影佐到达海防前，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早于四月十一日到达河内，伊藤芳男于四月十五日到达，他们住在河内的日本领事馆内。影佐等人在海防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到河内，进入坂本的住宅。这幢楼房虽不华丽，

“兴亚院”是直属日本内阁的一个殖民侵略机构。1938年12月16日，日本为了集中统一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扶植伪政权，加紧经济侵略等活动，近卫内阁设立这个机构。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兼任。它的本部设在东京，在上海、厦门、北平、张家口有四个联络部，又在广州、青岛设两个派出机构。

[日]犬养健：《长江还在流着》，文艺春秋新社1960年版，第134—135页。

但它的特点是与领事馆前后相连，两宅间往来，不必经过楼外。同时，二楼又各有遥相对称的一个小窗，便于用暗号互通消息。影佐等人一到，大屋久寿雄立即与汪方取得了联系。

此时，汪精卫的处境十分狼狈。香港、河内的暗杀事件吓得他心惊肉跳，深感自己四面楚歌，进退失据，再耽在河内，恐怕仍有生命之忧；走吧，立足点选择在什么地方呢？途中是否再遭狙击？原来由曾仲鸣与日方建立的一条联络线，现在又断了，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月上旬，再派周隆庠直接与日领事馆联系求救。影佐到达河内的当天，大屋久寿雄通过暗号电话与周隆庠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于十八日下午一时半在高朗桥二十七号汪宅碰头。

第二天，影佐、犬养及矢野征记三人化装成旅行家，驱车前往。汪精卫派周隆庠在途中迎候，将三个日本人按排上周预先备好的汽车，直驶汪宅。在周隆庠的引导下，影佐等人拾级登楼，被延请到一间会客室坐候。不一会，只见室门呀然而开，汪精卫身穿白色西装，强颜欢笑地走进来，由周隆庠作了介绍，一番寒暄之后，即转入正题。

“我奉敝国政府命令，来协助先生迁往安全地区，故今天特意前来奉谒。”影佐祯昭露出一副友好关怀的样子。

“承三位远道来访，至为感谢”，汪精卫用一口杂有粤音的普通话说：“我也觉得在河内不但有危险，亦且无意义，我正在准备如何逃离此地。适承贵国政府派各位来此，很感谢对我的关怀。”

影佐问：“听先生的话，重庆方面是否有新的袭击计划？”

“有的。”汪答：“譬如在二、三日前，邻居的三楼突然有人租去，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由远处监视。越南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有好感，但对我的政治行动则采取禁止态度，深恐卷入政治漩涡。如继续留在河内，将无法与香港及上海的同志取得联络。”

“先生想迁到何处居住呢？”影佐问。

汪答：“经过多方考虑，现已决定到上海。另外作为后补地点的有香港和广东。香港的英国官员监视甚严，目前在该地陈公博、林柏生等无法活动；广东对孙中山先生和我自己说来都是关系很深的地区，但现在已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有可能给国民以一种印象，认为我是在日本军队保护下搞和平的。和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运动的诚意。”汪精卫苦心孤诣，力求把自己的活动同“卖国”两字截然分开，这当然是一种自我解嘲而已。当时影佐未加任何评论，继续问道：

“先生要离河内，准备怎样与越南当局接洽？”

汪答：“总以不给予越南当局任何刺激为主，现正在研究接洽的方式。我想，越南当局对于我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虑，如一旦我要离开此地他往，他们断无不予赞同之理。”

影佐又问：“那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五千五百吨的货船，以供先生的应用。”

汪说：“谢谢对我的好意，但我已经租了一艘法国的小船。”

影佐问：“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的？重庆政府对先生已下通缉令，在中国沿海航行时，需要特别小心。”

汪精卫回过头去问了周隆庠，告诉影佐，这条法国船是七百六十吨。三

个日本人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如此一条小船，怎么可能将汪精卫一行载到上海？但汪执意地表示：“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战后我第一次去上海，如乘坐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或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准备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

话谈到这里，三个日本人已经明白了汪精卫离越的“原则”。于是矢野对周隆庠说：“请汪先生去休息吧！现在要谈的只是事务上的细节，可否请办理总务的再来共同商量一下。”汪精卫把陈昌祖叫来后就退了出去。这样，影佐、犬养、矢野和周隆庠、陈昌祖五人又详细谈了两个小时，制订了如下“细目”：

- (一) 注意到汪没有出国护照，以保密观点看来，又是最安全地逃出，当在法印当局保护下逃出为最上策；
- (二) 由河内经海防至上海法租界秘密藏身处，使法国方面担任运输指挥官，使其负责运输；
- (三) 对准备的法国船 Von Volkenhoven[冯·福林哈芳]的船员实行检查，中国人全部下船，以越南人补充；
- (四) 船中进行武器检查，除了汪方和官方的以外，其他武器弹药全部没收。
- (五) 法印方面派足以维持船中治安的武装警卫上船。
- (六) 汪方也要多带武装警卫，时常在汪身边保护。
- (七) 影佐搭乘的“北光丸”，距离不引人注目的程度，尾随保护汪搭乘的轮船。
- (八) 日本方面事先在公共租界或日本占领区准备两三个秘密藏身处，如果汪能进入法租界，马上布置能转移进入上述的藏身处。
- (九) 关于汪等在上海的检疫及报官方法，由日本方面秘密斡旋。

上述方案经汪精卫查阅，认为大体可以，三个日本人才告辞而去。

汪精卫脱离河内的具体事务由陈昌祖一手负责。经过几天的联络交涉，越南当局也明确表示同意汪精卫离境，并答允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加以严密保护。同时，陈又绘制了为汪租来的法轮“冯·福林哈芳”号停泊的地点简图和无线电联络用的符号及其应该详细注意的事项，交与日本方面。为了安全起见，又按双方制订的“细目”，将“冯·福林哈芳”船上的全部中国水手统统解雇，改雇越南船员。另外，又添装淡水，购备粮食等，这样忙碌了三、四天，全部准备工作才算完成。与此同时，日方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影佐和犬养坐汽车离开河内至海防，回到“北光丸”上，矢野则留在河内，等汪精卫出发后，即先行赶往上海，协助上海日特机关进行各种布置。次日下午五时半，“北光丸”驶入公海，按照约定接应汪所乘坐的“冯·福林哈芳”号法轮。

“北光丸”上倾吐真情

四月二十五日夜间，细雨濛濛，汪精卫、陈璧君、周隆庠、陈昌祖及其随从一行十余人，偷偷地乘车来到海防附近的卡特巴岛北面，登上“冯·福林哈芳”号法轮。可是，老天不作美，纤小点滴的细雨将海天连成一片，能见度极低。因此，该船只好推迟了五个小时才起航。

这下可急煞了影佐祯昭他们。按原定计划，二十六号中午两船应在离海防五海浬一个名叫“拔奇朗平”的无人岛附近海面上会合前进。这时，“北光丸”已经到达，并在那个无人岛的四周航行巡视，而汪所乘坐的小货轮却杳无踪迹，万般无奈，只得怅怅独自向海南岛方向开去。这样经过三天无线电联系，“冯·福林哈芳”号仍然一无消息，影佐等人陷于绝望之境，以为“苦命的汪精卫已经葬身鱼腹”了。

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天皇裕仁的生日，“北光丸”已经驶近汕头东南、陆丰正南的碣石湾。船上悬挂着“太阳旗”，全体船员都分到了食品和啤酒，预作庆祝。下午三时，电报员意外地收到“冯·福林哈芳”号发出的密码，一阵阵微弱的“我们平安，我们平安……”之音传来，影佐等人的精神为之一震。断绝通讯四天后，两艘船终于取得了联络。这时，海面上风急浪涌，“冯·福林哈芳”号船身太小，颠簸剧烈，把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搅得晕头晕脑，呕吐不止。周隆庠认为这样危险太大，不能再继续乘坐此船，汪精卫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了，于是急电“北光丸”呼援。第二天正午，两船在碣石湾的湾口靠拢，汪精卫由人扶着爬上日船，与日本帝国主义“同舟共济”了。他不禁“万感俱集”，写下七律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此诗的前半部，为描写当时情景，实质上反映出汪精卫凄凉、哀愁的心理状态。汪触景生情，深感踏上了“贼船”，前途“微茫”、险恶。诗的后半部则借用晋代征西大将军桓温谴责王夷甫的典故，暗示蒋介石集团不能逃避中日战争的责任；同时，又以重新估价文天祥著名诗篇《过零丁洋》，抒发其“尽心”开展、“和平运动”，充当汉奸的意愿。

由于汪精卫一行上了船，“北光丸”载人加多，枪食与淡水均感不足，不得不改变航线，前往台湾基隆港，加以补充。航行途中，汪精卫与影佐祯昭、犬养健等进行多次会谈。据影佐后来回忆，汪倾吐了自己的全部打算和对日本希望，其内容主要如下：

一、以前和平运动的展开是根据这样的方案进行的，组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的和平团体，用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错误的原因，宣传和平是拯救中国、拯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而终于使重庆转变过来。可是认真考虑，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如推进百步，建立和平政府，除了通过以上言论进行启发重庆的工作外，更用事实证明，如果日华提携就可以改善到这种程度，从而抗战已经没有意义，由此决定舆论的趋归，使重庆政府的动向转向和平，只有这样办较为适当。

因此，如果贵国政府没有异议，希望变更以前的计划，改成建立和平政府的计划。

二、如果贵国政府同意我通过建立和平政府展开和平运动的方法，这里有种种要奉托、希望的事项。主要切望近卫声明不仅仅是日本表面的宣言，而要如实地见诸实行。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地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说是受了日本的欺骗。重庆就不相信日本，把日本看成嘴上说得好，肚子里实际上不一样。并且如果近卫声明如实地实现时，我相信，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的确失掉根据，即使是重庆政府，也不得不随着舆论大势所趋，倾向和平。其次，纵然建立和平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形成全面和平，其间必然要遇到许多波澜曲折。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期待和平政府的发展。

三、建立政府，则必然要具备兵力。

四、希望能够认识，日本光用武力不能从心底里改变抗日论者的认识，只有靠日本对华措施，用事实才能改变他们的认识，这是达到目的的最好策略。——

汪精卫的这些想法，使影佐等人感到意外。原来，汪在重光堂会谈时，就设想在西南日军尚未占领的地方建立起类同重庆蒋政权的是一个国民政府，由这个政权与日本交涉“和平”。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曾计划将政府建于四川、云南等地。《艳电》发表后，他们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响应者却寥若晨星，原先的设想已无可实现，加之日本政府在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后的一段时间里毫无反映，这使汪精卫怀疑日本是否变卦。为了解日本方面的态度，一九三九年二月初，汪与高宗武提出了收拾时局的三个方案，不仅放弃在四川、广西等地建立政权的设想，而且声称如果日本政府愿意同蒋介石妥协或希望由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等人出面组织中央政府，汪精卫都愿意积极协助，努力促成。如果日本要他出马， he 可以先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以后条件成熟，再建立政权。时隔三个月，汪精卫改变了以前的设想，明确提出由他出面在沦陷区组织象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傀儡政权，这能不叫影佐意外吗？影佐缺乏思想准备，听了汪的话，只好说：“什么时候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精卫随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

为了讨好日方，汪精卫表白说：“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同时，汪还一直表示说：“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判。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汪精卫信誓旦旦的表白，并不能真正打动影佐的心，他狡黠地问道：“日本人中间，有不少人对他批判，以前以为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作时却就分离，以为分离时却又合作，变化无常，缺乏政治节操。对此，您的意见如何？”听了影佐的话，汪毫无羞愧之色，反而笑了笑说：“这样的批判也不是没有缘故。然而这是以蒋介石为不变的中心的想法。至少在蒋介石心想和日本提携的时候，我和他没有分离过。”言下之意十分清楚，他是为了要同日本提携，才与蒋分离的。一副媚日丑态，令人作呕！

五月二日，“北光丸”在台湾基隆停泊，专程来此等候的西义显上船拜访了汪精卫。西义显是引诱汪精卫集团出逃的始作俑者之一。但据他在战后自称，台湾之行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防止日汪“和平

[日]影佐祯昭：《漫谈》。

运动”变成反蒋运动。西义显在他的《悲剧的证人》一书中，写下了他曾对汪精卫所说的一番“忠告”：

近卫声明由我们自己言之，仅认为系对现状表示日本民族最低限度之自律的规范，不论对方态度如何，至少我们应该实行这些事。如先生这样的伟大人物出台，保证中国民族为可信任之民族，则不必拘泥于此最低标准，应主张将长城以南之中国土地，不附任何条件，全部交还中国民族管理。

此事是日本民族于承认中国民族自主性当然应该作的事。日华间之永久和平，于此始能获得，新东洋于此始能奠其基础。我以日本人之一，认为日本民族若不如此，则不能生存于世界，亦无生存于世界之价值。

因此，由日本人的立场，我愿先生：将和平运动之

目标，不拘泥于近卫声明。叱吒之方向，与其对重庆，勿宁对日本政府，勇敢地主张：应将中华民国全域无条件交还中国。

西义显这一番话，出自日本人之口，似乎使人难以理解。实际上，汪精卫提出要在沦陷区依靠日本侵略军刺刀建立伪政权，这是汪的所谓“和平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而最早与汪接洽“和平”的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人，认为汪已改变了初衷，“和平运动”成了反蒋运动，汪也成了日军手中的傀儡，这种“和平运动”是不可能获得中国民众支持的，“和平”当然实现不了。因此，西义显才说出了这些话，这也是他们后来退出“和平运动”，另找与蒋对话路线的主要原因。然而，汪精卫对于这番“苦口婆心”的“忠告”，未有半句答复，足见他甘作傀儡的决心之坚定。

“北光丸”在基隆停留一夜，五月三日，又朝上海方向驶去。

土肥原公馆里被“保护”的人

还在汪精卫赴沪之前，周佛海就奉命于四月二十一日，偕同梅思平离开香港到上海，住在虹口区东体育会路汪日重光堂会谈所在地——原土肥原公馆里。周、梅此行的目的，就是为汪的到来，作必要的准备。

期间，他们向日方进行疏通。四月下旬，周佛海乘与西义显会面之机，提出希望能获得日军的谅解，“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实施和平工作”。并反复向西义显说明采取言论之“和平运动”，是汪精卫的原案，但从目前形势看，只有言论是不够的，完全依靠于所谓“理想主义”，那任何事都不能做。他说：“近卫已发出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声明，我们组织政府，反而有利。若日本政府忠实实行近卫声明，我们亦能成立强有力之政府。”这些言论，与汪精卫几天以后在“北光丸”上所言，原则上完全一致。日本人还称之为“周佛海路线”。

为了开辟制造舆论的阵地，“期望在文化界的反对范围内打开一条出路”，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着手准备恢复他在一九二八年与陈布雷、陈立夫等人创办的《新生命》书局，并准备恢复原汪派报纸《中华日报》。当然，办报开书局，总需要人，周佛海就利用老关系，拉拢一些意志薄弱的“报人”下水，请他们“帮忙”。同时，又要香港的林柏生带着《南华日报》的伙伴早日赶来上海。周还妄图用巨款收买上海的报刊编辑，希望他们为汪的“和平运动”当啦啦队，至少不发表攻击性言论。周佛海等人一面在沪积极工作，一面专候汪精卫的到来。

五月六日，“北光丸”载着汪精卫等人驶入黄浦江，停泊于虬江码头。不料，汪精卫将到上海的消息被泄露了出去，一批新闻记者闻讯而来，日方认为这件事关系到汪的生命安全，在防卫设备未完成前，其住所不应使人知道，因此决定让汪精卫在船上停留一宿，等到将新闻记者打发走了以后，再行上岸。可是，陈璧君不同意，她执意要立即上岸，当晚非回到法租界自己的寓所不可。影佐劝她这样恐怕有危险，陈璧君威胁说：如再阻止，她就要跳到江里，游水而过。影佐等人怕再坚持下去，就会发生误会，伤了“和气”，只好同意陈璧君先下船。同陈一道上岸的还有陈昌祖、汪的女儿、女婿及随从多人，日方将他们装入车内，放下三面车帘，以快速飞驶而去，使人误信汪就坐在车里，将新闻记者引开。

这一天，汪精卫在“北光丸”上接见了刚从东京赶到上海来迎接的今井武夫。汪重申了他在“北光丸”上与影佐等人所谈的意见，另外又向井今武夫提出，自己决定亲赴日本，就建立政府一事，同日本当权人士进行磋商，请今井转达给日本政府。

就在这天晚上，土肥原公馆里闹了一场风波。事情是这样的，由于那晚汪精卫住在船上，影佐等人到后，即与专候在那里的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起用过餐，高就向周、梅说声“少陪”，准备离开土肥原公馆。影佐能听懂中国话，见高宗武要走，就问他到那里去？高说：“到法租界我兄长家里去。”影佐说：“这不方便，我等同志暂时应住在这里。”高说：“我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247页。

[日]野村中将：《在上海汪精卫一派的活动》（1939年4月25日），见[日]《日中战争》5（《现代工资料》13），第237—238页。

兄长家里防范得很好。”影佐带着命令的口吻说：“今晚就请住在这里！”而高也以强硬的口气说：“我要回家。”影佐听后，生气地说：

“你要破坏同志之间的团结吗？周、梅诸人都住在这里，你大概不愿住日租界吧！但以汪先生为中心，我们都应忍耐，而一人清高有何价值？”双方抬槓，演成僵局。这时，周佛海跑出来排解，他对高说：“宗武，你还是回家去吧！”影佐只好默许。

于是，周佛海与犬养将他送到门口，高还气愤地说：“影佐有什么权利，可以对中国人随便发脾气？我为和运拼着生命，绝不能接受影佐的命令！”说完，上车而去。

影佐与高宗武这一冲突，是有原因的。高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牵线人。但高与蒋介石集团藕断丝连，保持一定联系，因此有些消息就通过高被泄露了出去。当日政府派遣影佐祯昭乘“北光丸”出发到河内助汪离越之时，《大公报》马上发表了汪精卫与日勾结主持“和谈”的消息，日方断定此举必出于高所为。当时，日方派了一名名叫一田的中佐，以出售蚊香作掩护，在香港活动，专门与高联系。日方发现，《大公报》上刊登的消息，一部分正是一田与高宗武之间密谈的内容。于是，一田前来责问高宗武：《大公报》消息来源何方？高诿称是日本方面所泄露，一田听后大为恼火，厉声问他：消息中有一点是只有你我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对此你又将作何解释？高宗武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就这样，日本人对高宗武的行迹起了疑心。影佐到土肥原公馆，为防止高再将汪的住所泄露出去，因此令高不要离开。在汪精卫到达前发生的这场风波，成了日后高宗武叛逃而去的一个原因。

五月八日，汪精卫在外界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离船上岸，坐上日军的小轿车，直驶土肥原公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会合。从此，汪伪“和平运动”的中心也就移到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是一个畸形世界。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国守军因淞沪抗战失败，全线西撤。上海除公共租界以外的地区即陷入敌军的铁蹄之下。上海租界地区，这时包括东自黄浦江以西，西至法华路、大西路以东，北自苏州河以南，南自肇嘉浜以北，尚在英、法等国的统治之下，日军在这时尚未向英、美等国宣战，因而还不能直接占领租界。这里便形成了所谓“孤岛”。在这个“孤岛”上，依旧是五光十色，无奇不有。它一面是帝国主义时“天堂”、冒险家的“乐园”；另一面则是中国人民的“地狱”。在这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仍然设有办事处，其通讯、金融、宣传等机构照常营业，国民党的官僚、特务混入其间进行活动，而上海人民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着抗日救亡运动。

这种形势，给汪精卫等人的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虽然，土肥原公馆因汪的到来，作了周密的防范工作，在汪的住屋里安上了防弹窗，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此地的安全倒不成问题。但他们不能老是呆着，到了夜间，就偷偷摸摸潜入租界活动。为了预防不测，汪精卫到上海后第四天，在日本宪兵的护送下，汪以下数十人一齐来到日本

[日]犬养健：《长江还在流着》，第170—171页。

今新华路。

今延安西路。

驻沪海军陆战队医院检验血型，以应付紧急情况。

这是初到上海汪精卫等人的狼狈相！其实，汪精卫一伙不仅害怕蒋帮特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更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的“保护”，但心里谁都明白，他们受到的是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征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三十四号汪公馆，所不同的是，在土肥原公馆里日本宪兵是住在楼下“保护”，到了其他地方则另辟一室而已。

九 赴日谈判组府条件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

以汪精卫为首的卖国集团，在日本侵略者的庇护下，进入上海虹口日军控制区，他们把建立伪政权的计划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汪精卫深知，要在沦陷区建立伪政权，首先是取决于日本的支持与否。因此，他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汪精卫先让周佛海、梅思平在土肥原公馆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进行预备性谈判，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现近卫声明，用实际行动证明“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接着，他又与周、梅、陶希圣、高宗武以及褚民谊等人反复商讨，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是汪精卫的连襟，他的妻子陈舜贞是汪妻陈璧君母亲卫月朗的养女。此人生于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原名明遗，字重行，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一九一六年，褚民谊随同乡张静江去法国，途经新加坡时，由中国同盟会会员尤烈、陈楚楠两人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抵法国巴黎后，即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世界画报》等刊物，出版各种小册子，“鼓吹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主张民族解放、教育平等、思想自由”，宣传反清思想。一九二

年，与吴稚晖、李石曾等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该校副校长。同年，进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专攻组织学，以“兔阴期变论”论文，得该校医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四年年底，褚民谊回国，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并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广州负责后方医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共事变后，褚民谊追随汪精卫，参予武汉政府的反蒋活动。一九三二年蒋、汪合作，褚应汪精卫之邀，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不久又兼任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褚不但办事糊涂，连起码的官场惯例都不懂，而且标榜从事所谓“国术”

的研究，提倡踢毽子、放风筝、打太极拳，有时还登台唱“大戏”。后来，蒋介石集团在攻击汪精卫集团时，就拿褚民谊做例子，以证明汪派执政无能。但褚毕竟对汪精卫很顺从，这使得汪既讨厌他的无能，又舍不得抛弃他。褚民谊也确实有他的“修养”，虽屡遭汪责骂，也从不在意。抗日战争爆发后，褚民谊在上海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汪精卫逃出重庆，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褚为了表明自己“清白”，于一九三九年春召集工学院教职员及学生，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并于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表示对汪的“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到上海后，立即秘密召见褚民谊，在汪的“启发”、“诱导”下，褚决定参加“和平运动”。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原来就享有较高的地位，同时又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因而落水后，就成了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汪要商讨赴日谈判组府之事，褚民谊当然参予。

汪精卫等人在《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中，首先规定了“和平运动”的主旨：“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

褚民谊：《参加和运自述（1945年11月）》，汪伪档案。

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基于这一“重要观念”，他们提出了建立伪政权的三个必要的环节。

第一步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集团认为，“目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为党治，依照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法统，如欲变更国策，则非根据党的决议不可”，只有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才能使国策的变更成为合法化。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失去法律上的“依据”，使汪精卫无可以国民党的立场，“进而使号召国民党员的工作发生困难”，并且“将给重庆方面以破坏工作的机会”，也“给反对政府者随意召开国民会议留下恶劣的前例”。为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汪精卫集团拟订的具体办法是：

- 一、由汪精卫指定人员组织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
- 二、推举汪精卫为国民党总裁，授权他指定中央委员。
- 三、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总章。
- 四、重新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政策。
- 五、宣布重庆国民党中央今后一切措施及文告概属无效。
- 六、宣布“实行三民主义”，“彻底肃清共产主义思想、行动及一切组织之宣传”，“调整国际关系，确立东亚和平”为国民党的最高指导方针。
- 七、授权汪精卫以党内同志及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起改组国民党及还都南京之责”。

第二步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后，组织中央政治会议，由汪精卫招聘党内外人士参加。通过会议，指定还都南京的一定期限，推举五院院长并任命行政院各部部长，同时改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集团标榜，他们将废除一党专政，一切政治问题均由包括各党派人士组成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决定。

第三步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集团声称，伪政权必须统一，因此在还都南京的同时，临时、维新政府应立即“自动宣告完成任务，自行取消政府的名义”。待国民政府发表还都宣言后，宣告重庆国民政府为伪政府，其对国内发表之法令、规章及对外缔结之条约协定，一律无效。宣告以“和平建设、睦邻反共为指导方针”，并发布前线各军停战的命令。

上述提案，是汪政权建立过程中一个纲领性文件，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而贯穿于汪伪集团的活动之中。在拟订了上述提案后，汪即与周佛海作了分工：他自己将同近卫文麿公爵、平沼首相以下各重要大臣进行“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而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为了“和平运动”的开展，日本应表示“丝毫没有侵略、统治中国或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为使中国国民谅解，必须向日本政府提出“有关实行尊重主权原则的各种要求”。二是向日方强调，新政府不是因日本的压迫而成立，有必要不使法制中断。所以，新政府的名称定为“国民政府”，建立的形式是“还都”，以三民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国旗为青天白日旗。以这些作为绝对条件，求得日本政府的谅解和同意。

五月三十一日，一架神秘的飞机从上海大场机场起飞。这时，机场附近

转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29—332页。

[日]《影佐祯昭供词》，见[日]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1946—1948），[日]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第307—308页。

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原来这一天，汪精卫亲自带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一行十一人，在日方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薰三、矢野征记等陪同下，赴日谈判组府条件。

当天黄昏，飞机在横滨须贺迫滨机场降落，在机场迎接的，既不见日本官员，也没有东洋群众，只有几个策划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日本“同志”如伊藤芳男等，场面够冷落的了。下机后，汪精卫等被告知：汪下榻之处，在东京北郊泷野川古川男爵的一幢别墅，那儿离机场还有八十公里路程，要坐两小时汽车。为什么不由上海直飞东京再驱车前往，而要绕道横滨须贺，舍近而就远？这是因为汪精卫此行原是见不得人的事，必须掩人耳目。

这时，日本内部对汪精卫等人的赴日和他们所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正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汪精卫一行的到来，使他们手忙脚乱，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研究对策。

日本五相会议的决定

当汪精卫拿着《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赴日谈判组府条件的时候，日本方面却“全然没有足以与之相对应的准备”。这种状况，说怪也并不怪，原来，日本政府的“对汪工作”另有所图。

还在重光堂会谈时，汪日双方所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就取得了以近卫为首的日本五相会议的许可，但当时日本政府却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利用汪精卫集团的出逃，以达到其分化、瓦解中国人民抗日阵线的目的。据接近近卫的当时人回忆，近卫对汪组织政府的设想，表现了“冷淡的、猜疑的、悲观的”态度，他感兴趣的只在于鼓励汪的叛变及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倾轧。他“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调解人，使[日本]得以跟中国谈判，这样一来，事情就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一些。”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比近卫采取了更加悲观的“等着瞧”的态度，因而他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的活动感兴趣，而是让汪呆在河内“静观”。战后，影佐祯昭所说的“日本政府当时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也没有怂恿汪氏建立政府”，就是指这些事。四月一日，在日本政府兴亚院会议上决定要在四月以后的六个月内，“从海关余款中每月支付出三百万元，合计一千八百万元，作为汪兆铭一派的救国反共同盟会所需的经费。”五月十一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等人陈述利害关系，说“现在好不容易鼓足了劲，而且汪的周围，有日本政府有意同蒋交涉的传闻，踌躇形蜚渐有露头，为此，无论如何请准予按预定的安排偕其来东京。”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

这时，日本内部各种势力也都在拨弄着算盘珠，以便通过汪精卫的赴日和汪伪政权的建立，为自己谋求更多的侵略利益。由有田八郎主持的日本外务省，其工作的依据主要来自在华外交人员的报告。五月三十一日，有田外相接到田尻爱义发来的“关于汪工作”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田尻一再强调说明，重庆方面的抗战气氛是很浓厚的。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五十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至于有的情报说，他们有向蒋表明不继续抗战的动向，那可以说是梦想。”田尻还分析了重庆方面以孔祥熙为首，“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且在重庆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出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还没有到公然主张和平的地步”。田尻认为：“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时机，则目前我国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通过这个政权再加调整各地的地方政权，“使防共国家予以承认，这样使战争变为内乱”，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田

[日]风见章：《近卫内阁》，第176页。

[日]《影佐祯昭供词》。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章第2节《汪政权的树立工作》。

[日]田尻爱义：《关于汪工作给外务大臣有田的电报》（1939年5月31日），见[日]《日中战争》2（《现代史资料》9），第563页。

[日]田尻爱义：《关于汪工作给外务大臣有田的电报》（1939年5月31日），见[日]《日中战争》2（《现

尻的电报，代表了外务省的企图。他们打着“迅速恢复外交关系”的幌子，决定“推进汪的新中央政府树立工作”，甚至“希望以双十节为目标付之实现，在适当时期予以承认，向中外阐明日本的坚强决心，使各国放弃援蒋。”

同外务省的主张有共同之处的是海军省。海军省也表示支持汪政权的建立。虽然，海军省并不否认汪的工作“其前途还难于预测”，“但也可承认，汪的出现，使在全中国各部内在充溢的和平希望的底流表面化，可以成为予以一大刺激的动机，这就是日本的目标所在。” 基于此认识，海军方面表示对汪的工作“极力予以支援”，同时提醒日本政府：过去实施结束中日事变的各种措施之所以“没有奏效”，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陆军的决心和态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三心二意”的。海军省认为，陆军目前首先有必要对“对华处理的根本指导方针加以重新检查”，“使之从对苏、中两国正面作战的迷梦中摆脱出来，以便倾注其全力于结束事变”。出自对陆军的不信任，海军还对陆军设置新政权指导机关的做法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陆军一个方面的事，“这是涉及日本帝国国务和统帅的根本问题”。按照海军的意见，与新政权工作有关，“最好采取大使、大都督（或大联络部长官）与军司令官三位一体的体制”。上述情况表明，海军支持汪政权建立的目的是：一方面借此阻止陆军独占中国的局面；一方面则是通过汪政权的建立，以巩固和扩展海军的既得利益。

对汪精卫赴日和汪政权成立最为关心的莫过于陆军。无论从已经占领的地域还是从今后作战的目标来看，汪政权要在日本陆军的占领区成立，无疑与陆军的利害关系最为密切。平沼内阁成立后，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板垣生于一八八五年，是日本岩手人。他青年时入日本士官学校，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永田铁山同为十六期生，曾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云南、汉口、沈阳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公使馆武官等。一九二九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与石原莞尔等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军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师团长，参加侵华战争。一九三八年五月平沼内阁登台时，日本军部内的多田骏、石原莞尔等为了改变日军陷入对华长期战争的不利境地，正谋扩张自己一系的势力，他们和大川明周等一帮人，策动板垣出任陆相，以为这样可以压住陆军方面的气焰，以早日解决中日事变。于是，板垣被奉调回国，并于六月三日以一个陆军中将、师团长跃入台阁，代替杉山元大将为陆相，主持军政，这在日本很少先例。

板垣上台后，曾表示说自己已经下了支持汪的决心，声称“要把反对汪的人调职到对华处理无关的职务上去”。但板垣的这种“决心”是有条件的。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板垣采纳了所谓“汪——吴合作”方案，即让汪精卫与吴佩孚共同出面建立新的政权。第二天，参谋本部谋略课就此起草了题为《汪——吴工作指导腹案》的文件，防述了对待汪赴日的态度，其指导要

代史资料》9）第564页。

〔日〕海军省军务局长：《关于建立中央政府的文件》，见〔日〕《日中战争》5（《现代史资料》13），第239—242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章第2节《汪政权树立工作》。同上

点是：“在现阶段，我方的指导在于争取重庆各派势力特别是其中的要人，并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准备实力。”这就是说，陆军最重视的是能否建立起一个持有强大实力的政权。五月二十九日，陆军省军务课的永井八津次中佐访问了有田外相，进一步说明了陆军的主张，申明陆军省关于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及其建立日期，必须强调“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主观点处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换言之，新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交给汪精卫一手办理，而是要由日本方面的判断来作决定。这是日本陆军的主张。

为了统一内部的意见，使汪精卫组织伪政权的全部活动纳入日本侵华战争的轨道，在汪精卫一行到达东京后，日本政府“被迫作出了决定方针的工作”。于是，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及兴亚院分别命令驻中国各地的日军及各机关参谋长一级，迅速回东京与中央各机构进行协商。六月二日至三日，陆、海军举行了“驻在地与中央恳谈会”，陆军驻华军方面对汪精卫要求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以及解散临时、维新政府，表示反对，但鉴于中日战争延长，渴望尽速摆脱困境，因此对于建立以汪精卫为中心的新政府，一致商定予以援助。

六月六日，日本政府汇总了“恳谈会”的意见，召开了有首相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交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参加的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规定：

（一）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该政府作为中国方面的问题，由这些构成分子作适当协力以建立之。

（二）新中央政府以《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为准绳，正式调整日华国交。构成分子当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新中央政府的构成与建立的时期，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主的观点处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当适应其历史与现实，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准则。有关内容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外，内政问题以交给中国方面为原则，尽量避免干涉。在适应新中央政府的体制并尊重其执政者的意向的同时，特别要考虑到我国对现有政权的特殊关系的处理。

（五）关于国民党以及三民主义，在其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时，当与其他亲日防共为主义者一样，允许其存在。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分子之一。

这一决定，大大背离了“重光堂会谈”所制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内容，也离开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表明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懈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为了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对于这次谈判，在不重要的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章第2节《汪政权的树立工作》。这条建议，后为1939年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一字不差地摆进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第3条。即指临时、维新政府。

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然而，汪精卫一伙却蒙在鼓里，对日本政府的上述决定一无所知。

板垣征四郎面目狰狞

古川从纯男爵的东京郊外别墅，古树参天，环境优雅。但是，住在这里的汪精卫一行，却毫无欣赏之意，在百无聊赖中焦急地等待着日本政府首脑人物的接见。整整过了十天，六月十日上午，汪精卫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首相。

软硬兼施、恩威并举，历来是帝国主义者的惯用伎俩，日本侵略者更是娴熟此术。平沼一见汪精卫，立刻表现出一副诚挚的神态，他大谈所谓“上戴万世一统”的日本皇室的宗旨，是“以仁爱之道维持人类和平”，说日本“尊重武力”是为了“争取东亚，特别是日华两国间的永久和平”，进而“维持世界人类和平”，但是，这一目标未达成之前，日本的军事行动决不停止。平沼强调日华提携必须以“道义”为基础，贯彻日本皇室的这种“仁爱精神”，称赞汪精卫为此而努力，“为解决日华间不幸的事变而挺身而出的热情”，并鼓励汪“积极奋斗”，“负全责致力于这一事业的完成”。接着，汪精卫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藏相石渡，前首相、时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近卫进行会谈，还与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总裁松冈洋右等人作礼仪性的会见。所有这些日本人，都全部掩盖了五相会议决定的方针所规定的内容，他们一致声称对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信心，假惺惺地表示“绝对相信”、全力支持汪精卫“完成大业的方针”，说对于汪与蒋介石“脱离关系，重新起来建立中央政权，不胜钦佩”。日方的“赞扬”、“激励”，不仅使汪精卫得到了某些笼统的“保证和希望”，更使他感激涕零，说要“勇气百倍”地去实现日方的“期望”，要“更加决心为东亚永久和平而努力”。

但在六月十一日，特别是六月十五日，汪精卫与板垣征四郎的两次会谈，汪看到了另一副面孔，了解了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十五日上午八时，汪——板垣会谈在讨价还价之中进行。板垣见到汪精卫后，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这话无异是在奚落汪精卫。因为汪非但自己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而且汪企图发动两广张发奎、云南龙云和四川军队参加他的“和平运动”的计划早已成为黄粱美梦，无法实现，要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虽然不可能。既然是这样，汪精卫就得听凭日本的摆布了。

汪精卫明知此意，但为了求得支持，忍气吞声地向板垣分析了重庆“要人方面”和中国军队内部情况。他说，先从要人而言，“不能不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因为“大部分的要人心里希望和平”，而且“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只是由于交通关系和蒋介石集团的严密监视，因而要想逃出重庆，这是极为困难的事，但“有这么多数的反共和平分子留在重庆，为了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重庆崩溃，也感到有其必要”。关于军队方面，汪精卫认为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以使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因此，汪希望日本要“深刻考虑”中国军队和民众的“民族意识”，

[日]《汪精卫与平沼会谈的内容》（1939年6月10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87号》。

[日]《汪精卫与石渡会谈内容》（1939年6月13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87号》。

“为日本计”，应“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言下之意，是要板垣了解他的“民族意识”，以便保留他的“希望”，支持他按用自己的如意算盘建立伪政权。

但板垣并不理会汪精卫对日方这种“好心”，反而老实不客气地针对其《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了种种指摘。按照汪的设想，一个国家不可能有几个政府同时存在，一旦汪政权成立，临时、维新政府应立即宣告自行解散，让他们成为历史的“陈迹”。板垣对此提出非议，他重申了日本“分治合作”的原则，告诉汪：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他说，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防卫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的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由于对南方的国防上的必要，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但不能不考虑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这等于在警告汪精卫，日本已经得到的在华北、蒙疆、华中以至华南沿海的所有权益，都不许汪染指。

听了板垣这番话，汪精卫感到大失所望。他自从重庆出逃后，就一直吹嘘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对中国无领土要求”，现在，这位掌握军政实权的内阁陆相，却如此露骨地强调要保留日本所扶植的那些老牌傀儡政权，这不就一下戳穿了他的谎言了吗？同时，这与汪精卫自己所设想的成立一个统一的、有实际权力的“中央政府”也大相径庭。在心灰意懒中，汪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他对板垣说，与临时、维新政府的关系，归根结蒂是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问题，“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有把两个政府的实体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再进行中央政府的组织。”企图以此来要挟板垣。

汪精卫刚说完，参加这次会谈的影佐祯昭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影佐话中有话。汪精卫一听连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指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那么除了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表现出一副哀哀上告，涕泣以请的可怜相。于是，影佐又说：“如果为了收拾时局，还是赶快组织中央政府为宜。归根结蒂，只要研究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不就行了吗？”板垣也接下去说：“不用说，不是指让地方政府有大得可以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权限。当然，只要在中央政府下给予相当的权限就够了。维新政府、临时政府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产生的，和日本方面已经有了种种既成事实，也已经组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487号》。

“蒙疆”是指当时日本对内蒙古，包括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所用的专用名词。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

同上。

成关于地方经济开发的机构。前面所说的尊重事实，就是指的这种既成事实”。

就在板垣、影佐的胁迫下，汪精卫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那样的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对维新政府，希望日本方面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对此虽然表示同意，但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成立的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方面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汪精卫言不由衷地保证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争论的另一个问题关于“国旗”。汪精卫认为，对“国旗”的选择是一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因此力主中央政府应沿用青天白日旗，而板垣却强调必须在“国旗”和“党旗”的上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三角形黄色布片，为了避免混淆纠纷，还主张军队要用“写着反共和平的黄色旗”。汪精卫则提出，军队如果只用黄色旗，而不使用“国旗”，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有损体面”，而且必将带来不好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和精神上的统一性。但板垣坚持说：“从军方的立场来说，现在日军正在和用青天白日旗的中国抗日军进行战争。即使在占领地区，所谓游击队很是跋扈。军队的敌忾心由此旗子而产生，从军队心理来说，也是当然的。老实说，军方甚至对于日军占领区内除了军队以外的政府机关，或一般民众使用国旗都有相当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取严格取缔的方法，不使为此产生误解。何况中国军队突然升起国旗，其情况极为危险，自不待言。所以我想，无论在前线或是后方，至少在军队方面使用国旗，会造成误解。”

最后，日方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在“国旗”的上方加着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以区别于重庆用的国旗。板垣说：“这一点是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一贯标榜继承国民党“党统”和国民政府“法统”的汪精卫，居然表示在原则上接受日方的方案，并答允在技术上想出一些办法来，“在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之前加以研究，作出具体的决定。”

对这件事，在汪精卫集团中引起很大的反响，连周佛海也不满意，称这样的三角小黄旗象条“猪尾巴”。

至此，汪精卫与日方军政界要人的谈判已告结束。为汪的赴日进行联络工作的西义显认为这次谈判是失败了。他说：“把平沼首相坚持近卫声明的要点和板垣陆相肆无忌惮地交换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说，日本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这只是日本罗列片面的要求，根本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平沼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超越近卫声明，而是从近卫声明后退，虽然表面上依照声明，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就想用旧有对华权益思想无多大差别的消极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为汪所接受，这只能说汪的宽宏大量。单就这一点，已毁坏了和平工作的基础。至于说什么继承三民主义的法统，显然完全是废话。”

汪精卫在日本前后近二十天，六月十人日，他带着沉重的心情，黯然回国，结束了东京之行。周佛海受汪的委托，则留在那里，继续与日方进行交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

[日]《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要点》（1939年6月15日）。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史》，第265—266页。

涉。

十 与南北日伪要人初次交涉

吴佩孚拒绝回访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八日，汪精卫结束了在日本的活动，由影佐祯昭、犬养健以及外务省书记官清水董三等人陪同，乘坐山下轮船公司提供的“五星丸”，离开日本芝浦。航行途中，汪虽伤感于这次东京之行的碰壁、呕气，但也庆幸自己能得到日本政府首脑支持他建立政府的保证，他望着茫茫海天，一股“壮志未酬”的念头油然而升，写下了《夜泊》七言诗一首：

雨底孤篷梦乍回，蘋花香傍水田开。
浪声恬适知风定，云意空灵识月来。
鼃蛤吠人如有恃，鬻蚊绕鬓若无猜。
寻思物我相忘理，演雅当年费尽才。

汪似乎一改过去“雨底孤篷”情绪，“浪声恬适知风定”，他感到心里踏实了。然而，这次华北之行，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

还在东京时，日本军方人士就一再示意汪精卫在返沪途中，最好去拜访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以取得这些人的谅解和支持，汪表示同意。在汪精卫看来，他与吴佩孚的合作是有基础的。汪知道，日本政府专门设立了对吴佩孚的工作机关，土肥原贤二等日军将领出入于吴寄居的北平什景花园。汪逃至河内后，一面派高宗武拿着他的方案去东京联络，表示愿意以在野党的身份，支持吴佩孚等人出山；一面致电吴佩孚，声述“和平”主张。吴也复电汪精卫表示赞同。不久，汪精卫到了上海，于五月二十二日派赵尊嶽（叔雍）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信中写道：

“去岁冬间，曾致电左右，略陈悃悃，惟辞意未尽，而耿耿之诚，幸蒙监察。旋奉复电，意味深长，循读之余，弥深向慕。中日两国为敌则两败俱伤，为友则共同发达，其理自明。不幸数十年纠纷胶结，郁结至于今日，遂败坏决裂一至于此。欲谋收拾，且引之入于正轨，其事诚难，然又不可以己，且舍此实无他道也。

“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惻然有动于中也。

“铭（汪自称）自去腊之末，发表艳电，棲迟河内，未尝别有谋划。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憚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

“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汪精卫把自己打扮成“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除了骗人以外，别无其他用处。他要吴佩孚相信，他们出来收拾时局，组织政府，是为了“挽救”国难，将中国的抗战形势引入对日“和平”的“正轨”。以此来引诱吴佩孚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75页。

《汪精卫致吴佩孚书》（1939年5月22日），转引自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87—88页。

出山跟他合作。

当时，吴佩孚也在主张“中日和平”。赵尊嶽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以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面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在赵南返时，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吴在信中说，他“拜展[汪]手书，读竟怆感不置”，对汪的行止“至堪敬佩”，对汪的“和平”主张表示赞同。他声称：“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豸抗战之中”，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故自卢沟桥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吴自称，汪精卫的所谓“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立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不过，吴佩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个人的意图。在中国全民族抗日的汹涌浪潮中，吴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他在回信中说：“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又说：“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表现了与汪精卫的不同立场，对此，汪自己也承认，他与吴佩孚之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汪、吴间的对话，由汪、吴自办”。六月二十四日，“五星丸”抵达塘沽港，汪精卫一行进入天津意大利的旧租界。二十七日，汪赶到北平，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和吴佩孚面商一切。这时日本方面企图利用这个机会，促使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为此特地将总司令官住宅作为双方会面的地点，并计划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性的回访。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的理由是，既然大家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但拒绝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对旧有的一套礼仪很讲究，以为这样做，就可确立他同汪精卫之间的正副关系。而汪精卫自视甚高，不愿意屈居人下，他为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哪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但是，汪毕竟吃了这个闭门羹，受到一次打击，不得不断了同吴会谈的念头。

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后来，汪精卫还一再对吴佩孚进行拉拢。他先派广东人、原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的顾问陈中孚前往北平，代表汪与吴协商合作事项，但吴提出的要求是：一、吴对外发表政见汪须采纳；二、汪不得干涉军事；三、汪不得私与外国签订任何条约；四、汪施政方针须得吴同意。表示与汪的不合作。同年十月九日，汪又写信给吴，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鉴于反汪讨逆的巨大声浪，更加不愿与汪同流合污，他坦率地在汪精卫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捭，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日本帝国主义者精心制造的汪

同上书。

《汪精卫再致吴佩孚书》，转引自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89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章第2节《汪政权树立工作》。

《顾祝同报陈中孚代表汪与吴佩孚商谈合作之寝电》（1939年6月26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吴佩孚先生集》第443页，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5月版，第517页。

吴合作蓝图，就这样为现实所撕破，吴佩孚也终于保全了他的晚节。

日本人知道吴佩孚不愿和汪精卫合作，又提出划湘、鄂、赣、皖、豫、鲁、冀七省归吴佩孚统治，请他于1940年元旦就职，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劝进，但吴始终未允。1939年12月4日，吴因患牙病并发败血症死亡。

王、梁醉翁之意不在酒

汪精卫在吴佩孚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就开始同王克敏、梁鸿志打起了交道。这一步棋子，汪精卫是非走不可的。

如上文所述，日本奉行的是“以华制华”、“分治合作”的方针。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铁蹄所到之处，便立即扶植汉奸，建立伪政权。然而，日本不仅需要个别地区的控制，更妄想独占全中国。随着战争时空的扩大，作为地方性汉奸傀儡政权，临时、维新政府越来越不能适应日本侵华战争全局的需要。同时鉴于引诱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投降的阴谋未能实现，日本急切要求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发言的“中央政府”。当然，要使其能履行“中央政权”的职能，就不能不包括原有的地方性傀儡政权。“满洲国”早就成了日本的附属国，再也不好让其合并到新政权中。临时、维新政府不同，这两个政权所管辖的华北、华中地区是举世公认的中国领土，在尚未完全用武力征服中国之前，日本还不能如同“满洲国”那样处理临时、维新政府。它既要强调这两个政权的特殊性，以便保持它既得的侵略利益，又要促成新老汉奸之间的合流，以扩大新的成果。因此，汪精卫要成立“中央政府”，就势必要与临时、维新政府的北王、南梁在满足日本侵华欲望的前提下，谈妥如何分赃的事情，这不仅是决定汪伪政权能否建立的一大关键，也直接触及日本侵华政策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六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在北平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官邸会见了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被称之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值得一提的”王克敏进行会谈。

王克敏，字叔鲁，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清末举人，曾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负对留日学生监督之责。他一生狂嫖滥赌，由于斫丧过度，使他两眼畏光，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镜，人称“王瞎子”。清政府被推翻后，王投靠北洋直系军阀，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成为直系的“夹袋人物”，曹锟贿选，他出了不少力。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失败后，王克敏曾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缉，他象一条丧家之犬，栖栖皇皇，逃往日本避难。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沉渣泛起，王才回国。同年十二月，张学良筹建北平财政整理委员会，张自任委员长，任王克敏为副委员长。一九三三年五月，王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务主任。一九三五年曾任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平津沦陷。时任华北派遣军司令的寺内寿一奉日政府之令，派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具体策划在华北建立伪政权。虽然，日本人也认为王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因此一开始未能看中他。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日方因对曹锟、靳云鹏、吴佩孚等人的工作遭到挫折后，便在王克敏身上打主意。这时，王正避居大连，日方委派一名少将军官找王谈话，要他出来担任华北伪政权主席。王听后，一口答应。并飞往日本福冈与日军部负责人密商有关事项。同年十一月底。王与日方签订了一项密约，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 一、华北矿产完全归日人开发经营。
- 二、临时政府最高指挥权及行政设施悉由日人计划。

三、军政指挥调动完全由日人主持。

四、教育亦由日人计划指导，傅走上亲善之路。

五、北京近郊及冀东二十二县划为日本移民试验区，原住民众，计划他迁。

六、华北棉业归日人管理经营。

七、交通各机关均由日方计划、布置、管理。

八、电灯、自来水、煤炭、木材、森林，完全由日方管理经营。

九、政府所用之人员，须经日本调查检别后，方得录用，若有三日人以上之介绍，亦

得录用。王克敏卖国条件颇彻底，因而博得了华北派遣军的支持，十二月十四日，临时政府成立，他跃登群奸之首，当上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对自己卖国换来的这个宝座，一向视为命根子。因此他一开始就对汪抱有警惕。

汪、王一见面，王克敏就先发制人。他假惺惺地向汪精卫表示愿意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但申明“不接受担任委员”。他说：“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他还要求汪精卫，如果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应考虑在北平召开，“北平在治安上也许适当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王克敏所言十分清楚，他可以考虑与汪精卫“合作”，但应该以临时政府为主体组织中央政府，否则就只有留在北平，以华北为小天地，还当他的“委员长”，但不许汪精卫染指。果然，汪一走，王克敏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政府决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又给汪精卫当头敲了一记闷棍。

汪精卫的华北之行毫无收获，他心灰意懒地回到了上海。这时，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控制汪伪“和平运动”，已经在上海设立了“梅机关”，以影佐祯昭为负责人。日本陆军方面除影佐外，参加的还有谷萩大佐、一田中佐、晴气中佐等；须贺少将、扇少佐等作为海军方面代表参加；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等作为外务省代表参加；此外，还有兴亚院的代表冈田酉次、小地笈以及以“民间”身份参加的犬养健、未广幸次郎、神谷茂等人。影佐要求梅机关成员切实执行近卫声明，他声称，“实现近卫声明是决定汪精卫运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是决定日华事变结果的重要条件，并为此全力以赴。”

“梅机关”开张后，考虑到汪精卫一行还住在日军直接保护下的土肥原公馆里，必然引起外界猜疑，对汪的活动不利，因此，特将沪西愚园路一二三六弄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拨给汪精卫做公馆。这是一所华丽堂皇的洋式花园，是当年主伯群就任大夏大学校长、为娶该校校花保某为妻，而特地建造起来藏娇的。该弄是一条较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十分幽静。弄内还有十余幢独立的花园洋房，由周佛海、梅思平、陈春圃、林柏生、汤良礼、罗君强以及日本沪西宪兵队特遣小组成员，分宅而居，成了清一色的汉奸巢穴。这时，以李士群、丁默邨为首的日伪特工已经投靠了汪精卫。为了安全，丁、李在每家房屋围墙上都加装了铁丝网，门窗也都装上铁栅，其中汪精卫住宅周围、周佛海住宅后面，还加设了瞭望楼。此外，丁、李还派了一个警卫大队，专门负责保卫全弄的安全，没有特别通行证，或者预先通知为特定宾客，任何人也无法进入弄内。后来，汪伪

[日]《汪精卫与王克敏会谈内容》（1939年6月27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S157号》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下册，第346页。

[日]冈田酉次：《日中战争内幕记》，日本经济新报社，1975年11月版，第

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设在这里。一一三六弄成了汪精卫集团组府活动的中心场所。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汪精卫就在该弄“汪公馆”接见了梁鸿志。梁是福建长乐人，生于一八八二年，原字仲毅，后改为众异。他的祖父梁章矩是清朝嘉庆进士，曾任广西、江苏巡抚，“颇有政声”。梁早年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还当过清学部小京官，为袁世凯的御用机关报——《亚西亚报》，充任新闻编辑，写写政论文。此人熟谙史事，所写的诗文，曾为当时文人墨客所欣赏。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立坛上颇有名气。一九一六年，他结识了北洋军阀皖系大红人、安福系主揖唐，在王的推荐下，梁鸿志入了段祺瑞的幕，并当上了北洋政府陆军部长、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的秘书长。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失势，梁鸿志被列为八大“祸首”之一，跑到日本兵营避难。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的统治，段祺瑞再度出山任执政，梁鸿志时来运转，又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他得意非凡，搬进了西城一幢当年袁世凯智囊团人物杨度曾经住过的楼房，并写了一副门联：

旁人错认杨雄宅，
日暮聊为梁父吟。

借用“梁父吟”，自比诸葛亮。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二六年四月，段祺瑞通电告退，回到天津做了寓公，梁鸿志也唯有随之下台，他深感失时又失意，常年闷闷悒悒。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失陷，同年十二月日军攻占南京，极端残忍的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实行大屠杀，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三四十万中国同胞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可就在这时候，官瘾十足的梁鸿志经不住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引诱，居然出任伪职，当上了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在同胞尸骨未寒的石头城坐上了伪府第一把交椅。此时，他野心勃勃地写下了“齐人初返汶阳田，世难千钧我一肩”，“雄谈破夜吾犹健，野哭终年众已暗，只手待援夫下溺，吏休宾退一沉吟”等诗句，居然以救世主自居。

梁鸿志上台后，标榜“绝对否认国民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对日密切提携”三大原则，他先后与日本签订密约、合同多达九种，其中包括华中之资源、矿业、铁路、航空、电讯、水电、上海和附近港湾土地以及都市建设等等，以长江下游的全部主权换取日本侵略者的支持。同王克敏一样，梁鸿志也怕汪精卫的出山会威胁他的地位。

两人一经交谈，汪精卫就发现，和梁鸿志的会谈，比他与王克敏会谈更加不理想，王克敏在表面上还表示了“合作的气氛”，“而梁鸿志似乎不赞成汪的企图”。他们有如下一段对话：

梁问：“阁下在东京会谈时，没有提出排除中国特殊化的问题吗？”

汪答：“所谓中国特殊化是什么意思？”

梁问：“没有要求取消蒙疆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吗？这就是说，不仅否定这些名称，而且否定成立政务委员会等，是不是适当？”汪答：“蒙疆作为防共地区，情况特殊；华北也作为特殊地区。因此，特殊情况必须有特殊

机构。”就这样，他们在各自玩弄着心术。汪、梁都避免提及华中问题，汪只强调华北、蒙疆的特殊性，暗示反对在华中成立特殊机构，以吞并维新政府，而梁则竭力否认华北和蒙疆的特殊性，暗示华中应该同华北同样处理。七月五日，汪精卫应梁鸿志的邀请，到达南京，在“聚星俱乐部”与梁进行第二次会谈，梁更加明确地提出：新中央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各院、部长人员维持原状，仍由梁鸿志任行政院长，与王克敏的主张一样。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同温宗尧、任援道、陈群等人进行会谈，结果也都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温、任、陈三人都是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温宗尧，字钦甫，广东台山人，生于一八六六年，早年入香港皇仁学院，毕业后赴美留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一九一三年回国因天津事件被清廷委为中英谈判团副团长。后历任两广总督洋务顾问、外交部参议、驻藏大臣参赞。辛亥革命后曾任外交部次长、上海通商交涉使、西藏巡按使、广东肇庆总司令部外交使、西南军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后寓于沪滨。一九三七年底南京失陷前投敌，维新政府成立后任立法院院长，兼任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是个失意的官场政客。任援道是江苏宜兴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号良材，保定军官学校卒业，曾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投敌后任维新政府绥靖部长。陈群是福建闽侯人，字仁鹤，生于一八九一年。因在结拜兄弟中排行第八，人称“陈老八”。陈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一九二一年任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秘书。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后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上海清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的急先锋和刽子手之一。后因与蒋介石不合，居住上海，与杜月笙有八拜之交，任杜办的正始中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投敌，任维新政府内政部长。他做官，懂得旧官场的诀窍，也懂得党人做官的一套；他会做名士——买书、看书，对版本有相当的涉猎；他会做流氓，上海滩上的三大亨以至小瘪三，他都会对付。尤其他会在日本占领区当汉奸，他巴结了华中日军特务部的两个翻译大冈田、小冈田和中国班的日本将校，成了维新政府掌实权的人。

有趣的是，他们在同汪精卫的会谈中，表演各异。温宗尧对汪出马组织政府表示支持，甚至认为汪没有必要同梁鸿志、王克敏商谈，反映出他与梁的矛盾，想投靠汪来压梁；任援道却始终起“探听的作用”，除询问国民党各要人的动态外，没有发表特别意见，反映他人情世故的圆滑；陈群长期身处党同代异之间，他怀疑汪的“和平运动”得到了蒋介石的默契，因而一见面就向汪诉说“自从在维新政府任职以来，因为本人是国民党员，是孙中山的弟子，对于维新政府的反国民党和反三民主义的政策，异常苦恼”，再三表白他没有攻击过蒋，说建立维新政府纯粹是二种“临时措施”，如果“一旦时势允许[蒋]返回南京，大家都会表示高兴。”听了这香活，汪精卫啼笑皆非，急忙表示：“我们没有必要改变以破坏联俄、容共、抗日的重庆政府

[日]《汪精卫与梁鸿志会谈内容》（1939年6月29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 Sp157号》。

[日]《汪精卫与梁鸿志第二次会谈要领》（1939年7月5日），同上。

[日]《汪精卫与陈群会谈记录》（1939年7月7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 Sp157号》。

《中同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下册，第346页。

为目他的政策和态度，但我们必须不让假货冒充”。

汪精卫与临时、维新政府首脑的首次交谈，表明了新老汉奸之间互不信任，各怀鬼胎的丑态。在这前后，汪精卫又先后拜会了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森岛参事官及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等人，乞求他们的支持。驻华日军头目，在口头上除表示要与日本政府一致给汪以充分援助外，还指责临时、维新政府首脑的不合作态度，声称“这决不是为了日华利益”，给汪精卫鼓劲，怪不得汪抱怨说：“关于和平运动，对中国方面，比对日本方面更难说话”。

[日]《汪精卫与梁鸿志会谈内容》（1939年6月29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 Sp157号》。

[日]《汪精卫与及川司令长官会谈要点》（1939年7月4日），同上。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章第2节《汪政权树立工作》。

三篇广播词

汪精卫自《艳电》发表以来，一直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偷偷摸摸地进行他的“和平运动”。七月九日晚上，他在上海广播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演说，公开露了面。这篇被日汪称之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的广播词，实际上是一篇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声明书，是宣扬反共卖国理论的汉奸代表作。此文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有一通“高论”

“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

既然日本如此了不得，它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中国就非屈服 投降不可。这就是汪精卫“开始实际和运工作”的最高目标。那么，“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汪精卫居然连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搞不清楚了，他以一个日本帝国臣民的口吻说：“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汪精卫要中国把外交、军事、经济全部听命于日本，好让日本“有利”，这是彻头彻尾的汉奸论调。

在这篇广播词里，汪精卫还一再老调重弹，说明中国应和之理，非和不可之故。他说：“我的和平建议，是赞同日本近卫内阁声明的。我为什么赞同呢？我依然是向来一贯的观念，对于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结。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国力，中国的民族意识，都已充分表现出来，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的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出手来，正如兄弟两个厮打了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欢喜的事？”在汪精卫一伙看来，日本帝国主义残暴地屠杀中国人民，霸占中国领土，摧残中国文化，掠夺中国财富，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厮打”，应该抱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诚意”，同侵略者握手和好。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面前，汪的这些主张，完全是在白日说梦话，自欺欺人而已。不仅如此，他还表示，为了挽回“当前的劫运”，“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可以补救一些。”刘坤一、张之洞是清廷两江和湖广总督，他们曾在英帝国主义策动下，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却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上海商定《东南保护条款》，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从而助长

《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同上

同上

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气焰。而李鸿章则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被任为全权大使，与奕劻代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现在，汪精卫就是要效法其前辈，进行公开的卖国投敌活动了。

同往常一样，汪精卫在这篇广播词里，又使用了极其恶毒的语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肆攻击。汪历来视中国共产党为其“和平运动”的最大障碍，非要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汪一面采取颠倒历史的手法，歪曲义和团的历史，攻击“共产党的罪恶，浮于义和拳，而为共产党利用的人，其罪恶又浮于刚毅诸人以上，虽然尚有忠勇的军队，忠勇的人民，至多不过如聂士成一般”；一面采取否认现实的手法，混淆黑白，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战争，诬蔑为“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的工作”。这种违背历史、违背现实的反共叫嚣，当然只有象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卖国贼才说得出口。

最后，汪精卫向日本侵略者大献忠心，说要“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并保证：“我决心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心团结同志并团结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

汪精卫讲完了这篇广播词，放下话筒才片刻，他唯恐还说得不够透彻，又以沙哑的嗓音，发表了另一篇题为《敬告海外侨胞》的广播词。在这里，汪除继续鼓吹反共卖国理论外，对重庆蒋介石政府，也进行了一番攻击。他指责蒋政权还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政府“爱国”，清政府在战败后“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得住大部分未失的大地人民主权。”而如今重庆蒋政权，却“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起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十分清楚，甲午战败，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没有抗御外敌的决心所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当年人们就发出了“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呼声，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华罪行和清政府的卖国活动。这个曾经有过一段反清革命历史的汪精卫，居然称赞起清政府“还算有爱国心”来，这不是背叛了他自己的历史了吗？其实，从背叛自己到背叛祖国，这正是汉奸卖国贼所要走的必经之路，汪精卫是这样，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汪精卫对重庆蒋介石政府的攻击，其目的就是要证明重庆政府“误国”，这也是他的汉奸理论之一。六天前，他在上海“汪公馆”曾向日本森岛参事官分析过当时华侨的状况是：“在这次事变中，华侨却被蒋介石的抗日宣传

刚毅，清末大官僚。1894年任军机大臣，1898年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主张围攻各国驻北京使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随慈禧太后西逃，途中病死于山西。

聂士成，清末将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曾率军抗日。1900年春，残酷屠杀义和团，后又抗击八国联军，在天津八里台成死。

《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同上

《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所欺骗，彼蒋的英雄言行所迷惑，因而支持蒋介石”。所以，为了使华侨支持他们，汪精卫主张“用实际行动加以宣传”。

上述两篇广播词，于次日全文刊登于汪精卫集团所主办的《中华日报》复刊号上。汉奸们大吹大擂地说这是开展“实际和平运动工作”的宣言，可是上海租界内各中文报纸对此都嗤之以鼻，连一条消息也没有刊载。相反，租界内的报业工会则公开拒绝销售《中华日报》，使该报“在市场上——一时陷入不能销售的境地”，尤其是租界内广大民众，“受抗日分子及文化界、新闻界的熏陶，抗战及反汪空气当然浓厚”，因而汪精卫的广播词，“收效甚少”。

两个星期后。七月二十四日，汪精卫顶着南国盛复的酷热，飞往广州。他此行的计划是想在临时、维新政府不合作的状况下，撇开他们，在广东寻找立足点，建立一个“华南政权”。按照汪精卫的设想，这个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而是通过它，达到这样的目的：“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其与日本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协助，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实行推翻重庆政府”。为此，汪精卫先后拜访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等日方要人，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当时，日本华南派遣军也企图效法华北和华中，在华南建立类似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政权，因而对汪作出了“关于行政、警备各权限移让协定等等的全面援助”的保证，使汪深感满意。但是，如果没有当地重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支持，他的计划就会落空。八月九日，汪精卫在广州用粤语广播了一篇题为《怎样实现和平》的演讲，以挑拨离间的卑劣伎俩，进行无耻煽动：

“只要在前方后方的行政当局，以及带着军队的人，明白了和平有了希望，而且这和平无害于国家之独立自由，破除了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摆脱了蒋介石的钳制力量。第一步公开的赞成和平，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肃清共产党的一切阴谋罪恶，保卫地方的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自由、财产的安全；第二步将赞成和平的联合起来，公开的要求蒋介石以国家民族为重，不再做和平的阻碍。”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汪精卫所言，主要是针对华南实力派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等人而发，以诱使他们脱离抗日阵营，公开降日，为汪搞个地盘。于是，汪精卫口沫四溅地吹嘘安藤利吉与他会谈时所许下的诺言，说什么“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必能以极友好的考虑实现以下几件事，即是：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

[日]《汪精卫与森岛参事官会谈纪要》（1937年7月3日），日本大使馆档案。

《中华日报》为汪派创办。1932年4月创刊，1937年11月25日因八一三事变而停刊。1937年7月10日在上海复刊，为汪精卫集团的机关报。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章第2节《汪政权树立工作》。

[日]《汪精卫与华南派遣军协商事项》（1939年8月16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 Spl57号》中华日报》1939年8月10日。

同上。

同上。

汪精卫这三篇广播词发表后，汪以下诸奸也都纷纷跑出来，乘时而起，桴鼓相应，大肆宣传反共卖国的汉奸理论。汪的亲信林柏生学着汪的腔调，发表了题为《一个根本信念》的议论文，他说：我们对于中日关系，有一个根本的信念是：“中日两国，壤土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无论为各别的利益着想，为共同的利益着想。总之是：义应为友，不能为敌。”他声称“誓必以身许和平”。被称之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的周佛海也撰文，竭力吹捧日本侵略者的“公正”、“诚恳”，讲“信义”。他说，近卫声明所述各点，“不割地、不赔款、不驻兵，这能说是亡国的条件吗？”“抗战到现在这样的情形，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条件，平心静气，也可以满足。”他大声叫嚷：

“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和平？为什么要抗战到亡？”“我们要一致奋起，参加和平运动，促成和平实现，以保障国家的生存和民族的独立！”

与汪精卫一伙的主观愿望相反，这股反共卖国的逆流刚掀起，回击它的是更加强烈的反对声浪。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为汪精卫招降的对象，反汪色彩也浓。八月十五日，李汉魂致电蒋介石，说“此间亦收到汪逆此项广播，当即饬属严密防范，削切晓谕官兵民众勿受骗惑”，并连日广播演讲，“对汪逆之谬论及其叛党叛国行为，痛加指斥”。十七日，张发奎、余汉谋、梁寒操等人也表示坚决揭露“汪逆精卫近潜广州，益肆其奸谋丑行，摇惑人心，危害党国”的罪行，他们除采取广播驳斥并通电声讨外，还拟订了发动广东省各县一致举行“斫奸大会”，“彻底粉碎逆谋”。

在新的反汪浪潮中，重庆国民党政府于六月八日发布了《以汪兆铭通敌祸国通令全国严缉法办令》，指出：“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生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严令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七月十三日和八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又先后宣布开除周佛海、陈壁君、梅思平、高宗武、丁默邨、林柏生等人的党籍。汪精卫集团越来越孤立。

八月十四日，汪精卫毫无收获“室路离粤”，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他终于认识到，要建立伪中央政权，就离不开日本的支持和临时、维新政府的合作，伪政权的地点，除南京以外别无他处。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2辑《论文》“中国之部”，第77—81页。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李汉魂以汪在广州广播演说官兵民众断不致稍有动摇呈蒋介石之删电》（1939年8月15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张发奎等以汪在广州肆意其奸危害党国除已广播驳斥并通电声讨外拟具办法四项呈请电示之籀电》（1939年8月17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国民政府令》（1939年6月8日），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

设立“招贤馆”

在公开进行舆论宣传的同时，汪精卫集团又在上海展开了招兵买马活动。

在汪精卫一伙看来，只要能赞同其卖国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悉数搜罗，来者不拒。上海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形势，曾授意各界代表人物，从近卫文麿的儿子小近卫到近卫“智囊团”的主要成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蜡山政道、日本同盟通讯社社长古野伊之助等人先后在上海活动，开展“和平”攻势。在汪精卫集团尚未逃离重庆之前，一批堕落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和国民党政府留沪官员，就暗中与日本侵略者根勾结，在上海开展对日“和平运动”。汪精卫集团到上海后，这批人就成了他们网罗的主要对象。

这批人中间，最早响应汪精卫《艳电》，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和傅式说等人。赵尊岳，字叔雍，出身名门，儒学之家。曾任上海《申报》记者、《申报》馆董事兼秘书、采访部长，是当时江南有名词家，一个堕落文人；岑德广是清末面广总督岑春煊的儿子，字心叔，此人名不见经传，只有在花柳丛中及一般纨绔弟中，颇有点小名气。他在兄弟中排行居三，其父岑春煊也排行三，因此熟识他的人，背后都唤他为烟花浪子“小岑三”。岑又是唐绍仪的“乘龙快婿”，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就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暗中策划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唐被军统特务砍死后，他又积极协助梁鸿志，为南京维新政府的卖国活动献计献策。赵、岑两人为汪精卫夫妇特别赏识，认为这是他们来沪后所发掘出来的“杰出人才”，后来他们作为无党无派人士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并被延聘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傅式说，字筑隐，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二四年参与创办上海大厦大学，曾任教授、会计室主任和教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仍在上海执教鞭，近卫即派人前来联系，要他出来斡旋“和平”。汪精卫出逃前夕，日方还示意他协助注一起搞“和平运动”。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傅附汪后得到了重用，先后担任了伪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浙江省长、建设部长等要职。在这同时，汪精卫集团对原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进行拉拢、收买。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中那些有钱有势的党老爷，早已溜到大后方去了，那些留沪的听谓“地下工作人员”，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由于战时经费紧张，薪俸极低，而这些人又是除了“吃党饭”以外，不要说经商营业，就是连跑单帮都不会。更何况他们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对象，整天避东避西。就在他们惶惶然无所适从之际，汪精卫集团一面采取“钢弹”攻势，通过汉奸武装特务对他们进行威胁；一面又采取“银弹”攻势，通过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于是，这批人中不少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成为汪伪国民党的一支新军。

为了全面网罗“人才”，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其中由周佛海出面，设立了类似汉口时代艺文研究会那样组织，暗中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里成立了一个机构，委派罗君强任总干事，美其名曰：“招贤馆”。于是，一些投机分子就钻头觅缝，如蚁附膻地来到这里，他们有的直接报效，有的经人介绍，只要填写一张履历表，即可拿到一笔钱，以后每月都有干俸，待伪政权成立时，量才录用。周佛海还指定傅式说在亚

尔培路 二十号，挂起“财政经济研究所”招牌，招徕若干具有财政经济方面知识的专业性“人才”，每月奉送相当的生活费，预约他们将来出任伪财政部的伪官。后来伪财政部的关务署长张素民，盐务署长阮毓祺，会计司长薛光钺，国库司长俞绍瀛，钱币司长梅哲之，参事刘星晨等人就是从那里来的。汪精卫也派陈君慧在愚园路设置经济资料室，罗致一些留日学生中经济“人才”，备作将来充任经济行政机构的“骨干”，从这里招徕的成员有后来伪广东省银行总经理、伪实业部总务司长刘炜俊，伪浙江省建设厅长冯忠兴，伪实业部次长姜佐寅等人。

除此而外，汪精卫集团还把手伸向华中、华北、东北等地，网罗人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就是通过这条途径主动靠上去的。徐良字善伯，从小生活在日本横滨，曾跟梁启超学过中文，就算是梁的学生，又算是康有为的小门生。后又留学欧美，对英文也有相当造诣。回国后当过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助手。一九二四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在宫中搜出一批文献，其中有徐良的一封信，信内对孙中山进行辱骂，是一个开口闭口称康有为为“南海先生”、溥仪为“康德皇帝”的保皇党余孽。抗战爆发后，徐在天津中原百货公司任经理，与昔日相比，总感到郁郁不乐。就在这时，陈璧君要陈君慧去天津找人入伙，陈找到了一个住在那里的长亲，即徐良的亲戚鲍文，约他南来上海“共事”，陈打电报请徐良代转。徐接到电报，认为机会难得，竟打点行装，捱日启程赴沪，随后才将电报寄给鲍文。徐良此人，既懂外文，又认识不少日本“朋友”，还与伪满洲国有这层关系，因而极受汪精卫夫妇所欢迎，后来果然受到重用，当过伪外交部次长、伪驻日大使、伪国府委员等职。

在招兵买马过程中，汪精卫集团特别注重扩充军事实力。由于拉拢龙云、张发奎等国民党内有影响的军人已经毫无希望，汪就只能招徕一些下台军人。其中来自大后方的有杨揆一，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军驻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的参谋长，是个嗜烟好色之徒。来自北方的有刘郁芬，他是河北清苑人，字兰江，保定军校步兵科毕业，后历任陆军第十七混成旅参谋长、河南省警察厅长、国民党新编陆军第二师师长、绥远都统、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战前就已经落魄。还有鲍文樾，此人是东北军旧部，曾任北平卫戍司令；郑大章，曾任东北军骑兵司令。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汪伪军事头目。汪精卫搜罗了这些人之后，一心想仿照黄埔校制建立一所新的军事学校，以培养军事骨干。一九三九年夏秋之际，汪根据叶蓬的推荐，派刘培绪为代表赴北平活动。刘是河北沙河人，号冀述，又名吉树，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北洋军阀靳云鹏部的师长。北伐时靳垮台，刘即投靠唐生智，仍任师长。抗战初期，刘部驻防宁沪线苏州附近，因作战不力，蒋要对刘严办，刘逃至香港，经叶蓬介绍参加汪伪“和平运动”。刘培绪奉命前往北平，打起“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募了两千多名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让他们前往上海入伙。同年十二月，汪精卫集团依靠这批人，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

即现在的陕西南路。

陈春圃：《南京会谈前后》，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 月版，第 405 页。

汪精卫自任团长，叶蓬为教育长，黄曦为总务处处长，郭尔珍为教务处处长，罗君强为政训处处长。“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的开张，为建立汪伪军打下了一个基础。

十一 建立“七十六号”特工总部

李士群投敌

特务活动，历来是一切法西斯政权强化其反动统治的象征，而汪精卫集团却以特工打天下，可谓一大杰作。

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他是浙江遂昌人，生于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早年丧父，与胞妹靠母亲种田为生，自幼在本乡私塾读过几年书，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就读于美术专科学校及上海大学，后曾赴苏留学。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不久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士群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

三十年代初，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当局推行“屠杀”与“自首”双重政策，在这大部世界，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进步团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一九三二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逮捕。这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斗争正处于艰危的状况下，李士群贪生怕死，很快投降，被任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与另外两个革命叛徒、后来也参加汪伪“和平运动”的丁默邨、唐惠民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同春坊书局编辑《社会新闻》杂志。这个刊物为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主办，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共产党及反蒋派进行诬蔑诋毁。

一九三三年春，李士群在中统特务内部狗咬狗的角逐中，栽了一个筋头。事情是这样的：“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人称马大麻子的马绍武上任后，与李士群、丁默邨有矛盾。李、丁朝夕相处，臭气相投，为给自己的前途扫清障碍，他们密谋了杀马的计策。一天晚上，由丁默邨陪同马绍武，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碰好和”（打牌）、吃花酒，闹了大半夜。马被灌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与丁默邨走出弄堂，这时，潜伏已久的李士群朝马绍武暗暗一拍，有人便向马开枪射击，当场将他击毙。案发后，南京调查科电令上海区限期捉拿凶手。经过多方侦查，丁、李两人作为重大嫌疑犯，一并逮捕。丁默邨因有他的老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留押于上海，后仍由吴保释。李士群因无靠山，被解押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经调查科特务股股长顾建中、组员徐兆麟会审，饱尝酷刑后关押于走马巷侦行股办事处。李士群的妻子、CC上海区情报员叶吉卿，带了大量珠宝首饰赶到南京营救，她上下使钱，左右贿赂，买通了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由“徐科长”下了一纸“条谕”，才使李获释，但规定不准他擅离南京。此后，李士群先后被委任为调查科编译员、南京区侦察员和国民党办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留俄同学会”理事，大有怀才不遇之感，郁郁不得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士群蠢蠢欲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与另外两个中统特务石林森、夏仲高奉命留守“潜伏”，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材根七十六号一幢小洋房里，但不久即逃往汉口。李本来就怀着强烈

即现在的凤阳路。

即现在的广西北路。

的政治野心，而自己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又没有根基，竞争不过别人，总想改换门庭。

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李士群趁中统组织委派他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的机会，席卷了全部川资和特务经费，由汉口出发，经广西、云南，绕道越南河内、海防，逃至香港。李士群到香港后，拜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生地不熟，难以发挥作用，于是让他带了自己的亲笔信，到上海去投奔日本驻沪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清水让李士群为日本大使馆做情报工作，李满口答允。就这样，李士群由革命叛徒，变为中统特务，又堕落为汉奸，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以后，李士群常对人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那边很多有资历的人已经挤满了，这边（指上海沦陷区）随我爬多高就多高。”他还说：“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这番自白，把一个汉奸的丑恶灵魂暴露无遗。

历史的演变，往往有其偶然性。由于李士群的投敌，为汪伪特工队伍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大西路 六十七号

李士群到上海后，直接接受清水董三的指挥，他租定了当时属公共租界的大西路六十七号作活动据点。李士群选中这幢洋房，是经过再三考虑的。

当时，上海租界尚未为日军占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汉奸们还不敢在那里公开活动。同时，一九三八年初维新政府成立前后，上海暗杀之风盛行，国民党潜伏特务与日本侵略者豢养的青帮流氓常玉清的“黄道会”暴徒，互相厮杀，制造恐怖事件。从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文化汉奸余大雄、旧军阀周凤岐，以及唐绍仪等，先后被国民党特务刺杀。李士群对这种情况看得十分清楚，他深知自己的处境。而此时他还尚未取得日本侵略者的完全信任，连一支烂枪都没有搞到。为了站稳脚跟，不使自己成为上述汉奸之续，李士群不得不谨慎行事。于是，找到了大西路六十七号。

大西路六十七号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它的对面路北是一片汽车行，门前有一道数十米长的墙头，墙边行人暴露，无法隐藏。西邻六十九号住的是不法商人、经济汉奸谢筱初，这是无需防备的。东邻六十五号是美国军队的一个驻沪兵营，门前警备森严。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李士群还对住房内作了一番布置：在沿马路的楼梯转角处，设立瞭望哨，让一个名叫张鲁的保镖站在那里警戒。将面向马路的汽车间大门，从早到晚敞开着，让自己的车子停放在那里，以表示车的主人还在家里。其实，李外出时，总是临时雇车，从不坐自己的车子，从而造成假象，使人无法捉摸其行踪。怪不得李士群常常向人吹嘘说：“人家坐的是保险汽车，而我却住了保险房子。”

李士群住进了大西路六十七号，立即着手进行情报活动。他利用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编辑《社会新闻》时的老关系，把手伸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等机构，引诱“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人下水。他这样做，既可拉起一支队伍来，又可达到与国民党某些要人保持联系，以取得他们的谅解，同时也利于自己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开展。在这方面，李士群的一大收获是结交上了汪曼云。

汪曼云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大流氓杜月笙的“学生”，与军统、中统都有联系，在上海滩上“兜得转”。李士群认为，如能搭上汪的关系，必定给自己的生命安全及今后行动带来好处；同样，汪曼云也有自己的目的。当时上海租界年英、美帝国主义者，对日本处处退让，日本宪兵队要在租界年抓人，虽然要通过一定手续，但却能为所欲为，如果有了象李士群这样一条可向日本人说“情”的门路，万一被捕，也不会吃眼前亏，还可以“脱稍”（上海俗话，即脱逃之意）。李、汪两人各自怀着不同的打算，经章正范牵线，一拍即合。

一天，汪曼云到大西路六十七号去见李士群，两人素不相识，但一见面，李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汪他是在为日本人办事。但他辩解说：“我投奔日本人，是因为过去中统对我的手段太辣，要借此报复一下，出口鸟气。同时也因为太穷，想在日本人那里骗到二十万块钱，就准备滑脚溜走，因此不想大干，仅答允给日本人做些情报，不做行动。希望老兄能了解我的苦衷，如有对我不谅解的人，则请代为解释。总之，如能照顾的地方，望多多照顾。”汪曼

即现在的延安西路。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62页。

云觉得李和他初次见面，就对他如此“诚意”，当即答允与李合作。同时，也向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上海已成孤岛，万一我被日本人抓住，老兄将何以善我后？”

李不假思索地回答：“简单得很，你只要说与大使馆的清水书记官有关系就行了。”

就这样，双方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汪曼云与李士群之间此后不时有些酬酢往来，通过汪曼云，李士群又与社月座发生了联系。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改名镛。他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生于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阴历七月十五日），从小混迹于上海滩，后与著名大流氓黄金荣、张啸林结为兄弟，三人狼狈为奸，买卖鸦片，开设赌场，并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广收门徒，结交权贵，成为上海滩上无人敢碰的恶势力。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共事变时，他与黄、张等人接受蒋介石的指使，盗用辛亥革命时“共进会”的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镇压革命的急先锋。因而为蒋介石看中，先后被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并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中汇银行、中国通夜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相勾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力支持戴笠建立苏浙行动总队（后改名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前夕，杜月笙逃往香港，但他在上海滩仍留有很大的势力。李士群深知杜月笙的潜在力量，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与杜月笙拉关系。

“欲取先予”，这是李士群的处世哲学。有一天，李士群收到日本方面发给他的一份材料，标题是《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李看后异常高兴。原来，这份材料出自杜月笙一手扶植起来的上海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秘书张师石之手，由于情况熟悉，这份材料对杜的出身、经历，法租界烟赌和杜的关系，杜与上海市地方协会以及与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等人的关系作了详细介绍，也罗列了杜月笙手下小八股党、得意门生、贴身亲信等一批人的情况，同时特别强调了杜与戴笠的关系。这正是“天假其缘”！李士群深深懂得，如果将这份材料送给杜月笙，与杜联系的关节自然可以打通。因此材料一到手，立刻打电话约汪曼云前来会晤。

汪曼云到了大西路六十七号，李士群一见他便说：“汪兄，我因激于义愤，才把你请来的。我觉得张师石太没有良心，老杜（指杜月笙）待他不错，他却把老杜出卖了。你看这份东西，就是他写给日本人的。”说着将一份厚厚的材料，递给汪曼云：“我因看不过张师石这种卖友行径，所以也不管他与我们的关系怎样，我把他衣裳剥掉，给你看看。”这份材料很长，不能一下读完，汪曼云只能约略地看了看内容。李就说：“东西太长，你带回去看吧！不过你看过后，应将原件还我，因为这上面已有日本人签了字，一旦要时还得把原件给他们。”接着，他加重语气说：“你看得时间长一些，甚至要抄一份给老社都可以。”汪曼云见李既然说到这种程度，便进一步问道：“能不能让我把原件带到香港去，让杜看一看？”李士群满口答应了下来。

汪曼云拿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马上动身去香港，将它送给杜月笙过目。杜对此十分重视，就把这份材料交由他的秘书王幼棠，关起房门，整整抄了三天。为了表示对李士群的“感谢”，在汪回沪前，杜关照他：“我们

也表示表示好感，你回去时买些东西送给他（指李士群）吧！”汪自然用办，便在香港买了一只两面透明的金挂表，和两套西装料，送给了李士群。就这样，李士群用这份材料，总算搭上了杜月笙。通过这层关系，李士群与汪曼云之间的关系也就更进了一层。

李士群在六十七号期间，除进行各方拉拢外，最主要的活动是建立一支初具规模的汉奸特工队伍，并由搜集情报工作到开展特工行动的转变。

一九三八年底，汪精卫逃离重庆，并发表了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具有特殊环境的上海，在汪伪“和平运动”中越来越显示其地位的重要性。次年春，汪精卫就决定以上海为中心，开展建立伪政权的工作。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李士群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重视，清水董三示意他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但是，李士群知道自己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的声望与地位，是不足以号召的。于是便想把自己原来的顶头上司、患难之友丁默邨拉下水，以便合伙经营特工行动。

说来也巧，丁默邨此时正在潦倒之际。丁是湖南常德人，生于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早年曾参加革命，后叛变投靠国民党。三十年代初期曾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其地位一度与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抗战后，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因为贪污招待费，戴笠乘机在蒋介石那里告了他一状，丁因此受到追查。一九三八年八月，军统局第三处被裁撤，丁默邨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心怀不满地跑到昆明养起“病”来。李士群得知这一情况，在征得清水董三同意后，派了丁的同乡、已经投敌的中统特务剪建午专程前往昆明，转达李推戴他为首领的意向，邀他入伙。丁一听正中下怀，表示同意，随即起程，赶到上海。

为了不使人知道自己是受排挤落魄而来，丁默邨一到上海，便吹嘘说：“我这次是奉立夫之命而来的，因为在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如此进行下去，实在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抗垮国民党，是唯恐中国不乱。为了国家的前途，立夫要我到上海来开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来的。不过，在条件未成熟的时候，我们应替他保守秘密。”但李士群与丁见面时，就毫无掩饰地对他说：“听说国尺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混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老实告诉你，我已经同日本鬼子挂上钩，决心当汉奸了。”说完，李掏出一支手枪和一叠钞票，朝桌上一放，又说：“怎么样？你愿意干，就收下这钞票开销，我们一起干，你仍然是我的老上司，一切听你的话行事；不干呢，也不要紧，我李士群是汉奸了，丢了你的面子，你就拿这支手枪打死我。”结果，丁默邨便当仁不让地坐了第一把交椅，也种下了日后汪伪特工内部丁、李交恶的根子。

丁默邨、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一九三九年二月初的一天，他们在清水董三陪同下，拜见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当时，土肥原因唐绍仪被杀和对吴佩孚工作的“搁浅”，正感到无计可施，丁、李找上门来，给土肥原带来了“希望”。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65—266页。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精工国民政府成立》第267页。
胡英甫：《敌伪时期群奸剪影之一——李士群与丁默邨》（未刊）。

这次会见，也是在重光堂举行的。土肥原对丁默邨、李士群的到来，表示十分欢迎，他按照中国人的方式，亲自给他们递了香烟，还有“礼貌”地一个个点了火。这个为中国人所咒骂、憎恨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和特务头目，为了笼络人心，对丁、李的来访，“流露出招待客人的真心实意”，双方在“亲切的气氛中感情融洽在一起”。

“这两位是我们的同志。据说他们想就日华两国的发展趋向，听听阁下的高见。”清水董三首先向土肥原说明了丁、李的来意，然后将两人的情况作了介绍。丁默邨表示，他要为“争取东洋的和平与繁荣”，同日本“携起手来”。于是，土肥原问丁默邨：

“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残酷了。对上海出现的恐怖活动，也得想个办法。”

丁默邨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土肥原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在幕后指使凶手进行现场活动的那些家伙。毫无疑问，这就是重庆特务工作队的蓝衣社地下组织。”

“在蓝衣社的服务大纲中，写着蓝衣社进行恐怖活动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防止毫无爱国心的冷血汉、奸商、卖国贼的猖獗活动，杀害他们，使民众陷入恐怖之中……’这不过是为了达到其特工（特务工作）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特工就是政治活动，它通过组织力量，从幕后来推行政府、政党和社团的政策。上海的恐怖活动，其罪魁祸首是敌人的特工，所以要取缔这种恐怖活动，必须粉碎敌人的特工组织。”

“我们想在上海开展救国运动，但首先必须同敌特活动进行斗争。干哪行的通哪行。好在我们对敌人的力量和弱点都了如指掌，想一定能够战胜他们。希能理解，这个运动的

目的决非抗日。如有可能，还希望对这个运动予以领导和援助。”_听完丁默邨的话，土肥原满意地点着头说：“谢谢，这对我有很大参考价值。”他表示“我很想对你们的运动进行援助，可是感到遗憾的是，实在不能以个人意见马上作出回答。然而，我打算设法进行妥善处理，请稍等一段时间。”并希望丁、李以后再回去。土肥原的态度，使丁默邨、李士群“感激”万分，李事后回忆这次会晤的情景时曾说：“土肥原先生是位那样和蔼的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丁默邨更是受宠若惊，他说：“没想到，土肥原将军非常热心地听取了我们说的话。请想象一下我们是多么地喜出望外呀！我们见到了上肥原将军才对日本人第一次感到亲切和尊敬。”

第二天，晴气庆胤奉土肥原之命去会晤丁默邨、李士群，进一步向他们了解组织特工队伍的详细意见，好向日本大本营汇报，以决定对策。见面后，丁默邨立刻交给晴气两份材料：一份是《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该表由李士群调查编制，对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下属的十个党部及学校、工会和文化团体等组织中的特别党部；对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抗日锄奸团以及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救国会、人民阵线等；对指挥上海周围地区“游击队的统制机关”江南游击队总司令部；对国民党特工组织蓝衣社、CC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各团体的组织机构、领导人、势力范围和经费情况，都有详尽的记述。同时，该表还介绍了军统局的情报网，以法租界为中心，已经扩展到

南京、杭州，遍及维新政府内部和上海特别市政府、工部局、铁路、码头、电话局、市场、娱乐场所以及主要百货公司，以侦知日中要人的行动，民众的动静，掌握局势的变化。这是当时日本方面无法搜集到的情报。另一份是《上海特工计划书》，由丁、李合作制订。这份计划以获得日本的经费、武器援助为前提，详细写明了组织特工的方针、要领、工作据点的开辟、情报活动的开展、人员的网罗、行动队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的运用、武器的保管和修理、防谍、纪律守则等项目。这两份材料，使得晴气对丁、李的工作情况和今后的行动方案，都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几天以后，晴气庆胤前往东京汇报。丁默邨、李士群的计划受到陆军省影佐祯昭等人积极赞成。二月十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向晴气发出训令，决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并决定自“三月份以后，每月贷与三十万日元，借与枪支五百枝、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同时要求这支特务组织，“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果然没有几天，三十万日元分装在两大柳条箱拿来了。晴气的助手冢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也赶来上海，专门负责与丁、李联络。

有了枪和钱，有了日本侵略者做靠山，丁默邨、李士群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忙得不亦乐乎。期间，李士群通过季云卿的介绍，收买了以吴四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而丁默邨则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其核心人员，除丁、李两人外，还有唐惠明、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章正范，即所谓“七人委员会”。

丁默邨疏通周佛海

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开“局面”，丁默邨、李士群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开始寻找门路，投靠汪精卫集团。

丁默邨、李士群知道，他们手中掌握的这支特工队伍，充其量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的一支别动队而已，说捞点“外快”，搞点钱，那是不成问题的，但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难了。当丁默邨刚到上海时，汪曼云就直接了当地提醒他说：“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过去你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的。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题，而是号召力方西，确有一些事倍功半的困难。”因此，汪向他建议：“事到如今，当然不能因为困难而不做，为求事的迅速成功，我觉得倒不如去接上汪精卫的关系，好在汪精卫已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丁点头称是，说“我也有同感，汪先生方面，我可以派人去联系。”

但丁默邨心里明白，三十年代初，他与李士群在上海滩编辑《社会新闻》时，曾秉承陈果夫、陈立夫的意旨，专以共产党和改组派为攻击对象，双方的历史成见很深，旧恨能否冰释，一时尚难预料。为了使此事办得稳妥些，丁默邨决定不直接找汪精卫系统的人联系，而是先向周佛海疏通。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周佛海，不仅与丁有同乡之谊，又曾同属于“CC”的高级干部。因此，通过周来搭上汪精卫的关系，可算是一条捷径。

可事情并不一帆风顺。开始，丁默邨派翦建午去香港联络。

翦虽然并不认识周佛海，但他与周妻杨淑慧却是熟人，他想请杨淑慧引见，然后与周接触。不料此时周佛海等人已成惊弓之鸟。

一九三九年春，由于在香港、河内相继发生刺林、刺汪事件，周佛海等人草木皆兵，他们对来自重庆或上海的原蒋介石圈子里的旧人，都怀有戒心，处处提防，不敢轻易接头。因此，翦建午到

香港后，杨淑慧总是对他远而避之，即使有时回避不了，见面

后，只要翦一提到周佛海，杨就支吾其词，连地址也不肯相告。翦一时无法见到周佛海，只好空手回沪。

丁默邨、李士群并不知道其中原因，翦建午回来后，他们就考虑另外派人去接头。刚巧，蒋介石要在重庆浮图关（后改为复兴关）举办第二期“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汪曼云被指定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前往受训。丁默邨得知这一消息，就把汪请来，说临行前要同他谈谈。两人见面后，丁问了何日启程与受训时间后，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千元，对汪说：“这个微不足道的小数字，请收下，聊壮行色。”汪假意推辞一番后就收了下来。丁说：“我这里的情况，在重庆务必严守秘密。如果见了立夫（指陈立夫）千万不要提起，免得戳穿了他与我的关系，使他不好意思。”随后，丁又拿出了两张铅印的表格，对汪说：“为了彼此信得过，我请你也加入我们的组织，这两份表格请你填一填，这是手续，我与正范也都填过的。”这时，坐在一旁的章正范点头称是，汪曼云也表示同意。于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宣誓仪式，由章正范作介绍人，丁默邨当监誓人，他们分别在“誓词”上签了名，算是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67—268页。

正式吸收汪曼云加入特工组织。宣誓之后，丁默邨便向汪曼云交代了赴渝途经香港时与周佛海取得联络的任务，他说：“我有一封信，请你在见到佛海时交给他，并代说明我现在的情况。”说完便从抽屉里取出早已写好的信，交给了汪曼云。要丁、李投靠汪精卫，本来就是汪曼云的主意，而汪又与周佛海熟悉，他自然满口答允。

几天后，汪曼云乘昌兴公司“广东号”邮船赴港。第二天下午三点半，汪曼云就到九龙约道五号周佛海家，与周会面。周听说汪来了，便与梅思平一起下楼迎接。双方寒暄之后，便谈到“正题”，汪曼云把丁默邨在上海的情况叙述了一遍，才从怀里掏出丁的信，交给周。周对丁先于他在上海投敌，而且已经拉起特工队伍，既感到意外，又暗自高兴。因此看完信，就说：“怪不得日本人一再问我，丁默邨与汪先生有什么关系，我总觉得问得奇怪，可又答不上来。同时淑慧告诉我，翦建午在尖沙嘴码头老是盯着她，我就对她说，翦是CC特务，要她随时当心，尽量回避，不想一直误会到今，现在默邨既有信来，我也可以见他了。”说完，面露喜色。

原来，周佛海早已着手物色“和平运动”的对象，积极拉人下水，并准备赴沪活动。如果能有丁默邨这一支特工队伍作帮手，势必有助于打开上海的局面。因此，对丁默邨主动前来疏通，当然受之不拒。

一九三九年四月，周佛海、梅思平乘坐“浅间丸”客轮从香港到达上海。晴气庆胤上船拜访，他根据日本大本营的“训令”，要从旁促成双方合流。因此一见面，晴气就对周说，要在上海开展和平运动，不妨把丁默邨等人一起拉进来，要以毒攻毒，用恐怖活动来制止重庆方面的恐怖活动，否则就根本不可能顺利开展“和平运动”。周佛海已经同丁默邨取得了联系，一听晴气的话，就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们正想取得他们的协助，现在就去拜访他们吧。”但晴气告诉他：秃鹫般的勇民党特务正监视着大街小巷，要是在白天上岸会有危险。这样到天黑以后，他们才匆匆地进入礼查饭店，在这里与丁默邨、李士群会面。日本方面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由林少佐指挥的宪兵队士兵在饭店内外暗地里严加警戒，在礼查饭店不远的外白渡桥，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兵手持刺刀掩护。他们的会谈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黄昏才结束。五月初，汪精卫也来到上海。汪果然因为过去丁默邨编辑《社会新闻》，揭过他的痛伤疤，仍耿耿于怀。但周佛海认为，这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就向汪精卫进言，要好好利用这班人来搞“和平运动”，并转达了日本方面的意见。对此，汪精卫是无法加以拒绝的，同时，也考虑到在上海要保住生命，非有一支武装队伍不可。所以汪到上海后，就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

为了正式协商联合的条件，丁默邨、李士群前去拜见汪精卫。汪在周佛海、褚民谊的陪同下，在土肥原公馆里与丁、李进行会谈。丁默邨提出了他们参加汪伪“和平运动”的条件是：

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69—270页。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71页。即现在的浦江饭店。

工总部)，十月份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二、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

显然，这个价码很高，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走到另一个房间，与一些人商议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还有，我认为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从内政部中将警察行政分离开来，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汪的这个答复，丁默邨是不满意的，他仍然坚持要得到上海特别市市长的位置，李士群在旁劝丁妥协，汪精卫接着又许诺说：“八月份左右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这样，双方才算正式合流，丁默邨、李士群即向汪精卫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从此，这支由日本侵略者直接扶植起来的汉奸别动队，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汪伪汉奸特工队伍。

[日]晴气庆胤：《上海阴谋机关——76号》，第120—121页。

应是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日]晴气庆胤：《上海阴谋机关——76号》，第121页。

“七十六号”魔窟

丁默邨、李士群的汉奸特务组织在与汪精卫集团同流合污前后，已经两易其驻地了。由于特工队伍人数迅速增加和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他们先从小西路六十七号搬到了忆定盘路九十五弄十号的一座洋房，对外由李士群的妻子出面，称“叶公馆”。但不久，他们又感到这里并不理想，因为“十号”位处弄堂里，连一辆汽车都无法掉头，平时为了安全，只好在弄堂口摆起两个水果摊，作为望风瞭哨，还派人不时在弄堂里进进出出，这既不体面，又不大方便。最后，由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搬进了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这就是后来上海人一提到它，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极司非而路属越界筑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筑起来的一条马路，因此路权归工部局巡捕房管理，路的两侧仍属华界。“七十六号”就坐落于极司非而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的私宅。陈原系北洋军阀直系将领，曾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当年，这里是陈做寿、唱堂会的地方。按习惯，马路两侧属华界的房屋，每户门上都钉有白底黑字的门牌号，唯有这“七十六号”与它的东邻“七十四号”，以及和它望瞭对宇的“七十五号”三幢大的花园洋房，门上钉的却是蓝底白字的门牌号。据说在前清时，外国人在中国购买土地，它的执行凭证经过洋商挂号，再由旧中国道台衙门登记认可，称之为“道契”。而这三幢洋房都拥有此种“道契”。抗战爆发后，“七十六号”为日军占领，经晴气庆胤的撮合，把它拨给丁默邨、李士群做活动场所。

为了适宜特工工作的需要，根据丁默邨的设计，他们首先对“七十六号”内的房屋构造作了改进，把原先的洋式二道门改为牌楼式，在两侧的墙上开了两个洞，安装两挺轻机枪。二道门内的东边，南北相对地新盖了二十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西边添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讯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样新颖精致的三开间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进行现场“指导”和监视。“七十六号”的主要建筑物是正中的那座高洋房，楼下是会客室、电话接线室、贮藏室以及餐厅、会议室等，楼上是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丁默邨虽在室内搭了张床铺，但从不睡在那里，却睡在旁边的浴室里。因为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他每晚在浴缸上放一张棕棚，早晨一起床就把棕棚拿掉，以防不测。三楼有两个房间，作“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上一个讲台，算是大礼堂。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就在这里举行。

除在“七十六号”大兴土木外，丁默邨、李士群又在日本特务机关的许可下，强行将“七十六号”右侧一条名叫“华邨”弄内的住户统统迁出，占领了该弄二十余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的家属住宅。为了安全，他们将靠马路的弄堂口堵死，在“华邨”东首与“七十六号”大门内相隔的墙壁上开了一个便门，所有居住在“华邨”的人，一一发给出入证，概由“七十六号”大门进出。

即现在的江苏路。

即现在的万航渡路。

为了加强警备，丁默邨、李士群还让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七十六号”西邻“华邨”西头墙沿下，搭了一间木房，派了几个特务，开起一爿白铁店。又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开设一家什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另外，从曹家渡新康里起以迄地丰路秋园附近，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取得经常的联系。“七十六号”内的戒备就更加森严了。过去，警卫人员一个个身穿黑衣衫袴，敞开胸襟，歪戴帽子，嘴里叼着香烟，手里转动铁弹子，一副地痞流氓的丑相。进“七十六号”后，除吴世宝外，都穿起草绿色的制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七十六号”门外是越界筑路，他们不能在门外设岗，便在门内层层加设门警。“七十六号”大门除汽车进出外，平时总是关着，人由旁边的小铁门出入。这里经常驻守一个班武装，遇有紧急情况，还要增加人数。凡要进“七十六号”的人，都必须持有淡蓝色的通行证，上面印着“昌始中学”与本人的姓名号码，并贴有照片。如果要进入其他几道门，还得备有一本贴满照片的簿子，并编好号码，让警卫验明正身后，方可进入。至于出入丁默邨、李士群所居住的高洋房，就更困难了。该处楼梯口设一道铁栅拉门，派有便衣特务警戒，虽持证件，但未经丁、李特许，任何人也不能上楼。这就是“七十六号”！它是汪伪特工进行罪恶活动的理想场所，作为汪伪特工的代名词，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

“七十六号”开张后，丁默邨、李士群一伙为压制上海的抗日反汪活动，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上海新闻界，是他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自从上海沦陷后，在沪爱国报人利用报刊，宣传抗战，激励民众爱国救亡热情。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消息传出，上海爱国报人义愤填膺，揭露日汪勾结的阴谋，汪伪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铲除而后快。从一九三九年春开始，“七十六号”即向上海新闻界开刀。六月中旬，丁默邨、李士群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的名义，分别向上海各抗日报刊负责人和有关编辑、记者发去恐吓信，威胁说：“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无论是否中央社（指重庆国民党的通讯社）之稿件，均认台端为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并公开发表一道对八十多人的“通缉令”，将一批新闻界人士列为通缉对象。威胁之外，他们进而利用汉奸武装先后袭击了《中美日报》、《大晚报》、《大美晚报》等报馆，戕害爱国报人，殴打报贩，妄图堵绝抗日反汪报刊的发行。而对坚持抗日的共产党人，他们更是恨之入骨，不肯放过，当时上海妇女界著名抗日领袖、共产党员茅丽英，就是被“七十六号”特务用带毒的子弹头打中而身亡的。如果说汪精卫集团建立伪政权的活动是在“和平”口号下展开的话，那么“七十六号”则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味。

丁默邨、李士群还秉承汪精卫的意旨，靠“七十六号”的武装力量，运用各种威吓利诱的手法，将人拉入“和平运动”行列，为汪精卫集团罗网党羽，扩充队伍。他们通常是先派一个与对方比较熟识的汪派人士出面游说，鼓吹汪伪“和平反共建国”的汉奸理论，并以金钱和地位来打动对方的心。如果游说不成，他们就派人将一封恐吓信直接送到府上，里面还附有一颗子

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北路。

钱俊瑞等著：《我们的撤书》，集纳出版社1940年版，第16页。

弹，限一星期内离开上海，使对方坐卧不安，蒙受重大的精神压力。倘若这一步还达不到目的，他们干脆用汽车将对方强行绑架，送进“七十六号”内，“囑令宣誓，签署和平运动誓书”，逼其就范。凡是参加者，都要先填一张宣誓书，上有“和平建国”、“拥护领袖江精卫”一类的内容，然后在“七十六号”会客厅内举行宣誓仪式，由介绍人担任司仪，而由丁默邨、李士群等中的一人担任监誓。宣誓后，将宣誓书交到登记科，换得一叠新的钞票，算是完成了卖身的交易。如若这时还不从，就有性命之虞。实际上，被“七十六号”所寻觅的对象，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或逃往外地，便是命归西天，很少有能在上海照旧生活下去的。

就这样，“七十六号”为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运动”充当打手，为汪伪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一九二九年九月汪伪“六大”召开后，在伪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里，特地设立了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任主任委员，丁默邨副之，李士群为秘书长，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指挥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副之。开始，特工总部组织机构比较简单，在正副主任之下，设有主任秘书、秘书、外事秘书、会计主任，以及总务科、交际科、警卫大队、第一、二、三行动大队、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招待所、看守所、警官训练班（即特务训练班，对外称聚川学院）等。不久，增设了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二委员会及抚恤委员会。到九月底，又增设了一、二、三、四四个厅。为时仅一个月，则把各委员会与各厅一并取消，改为四处（一、二、三、四处）四室（督察室、专员室、审讯室、化验室），至一九四一年春汪伪政权成立前，“七十六号”的组织人事又经过了一番较大的变动，将警卫大队改为警卫总队，下辖五个大队，并增设了特工总部行动总队，下辖六个大队。还设立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等行动组织。同时还建立了几个外围组织，如“海社”、“上海法院同仁会”、“立泰钱庄”、“国民新闻社”、“东南贸易公司”、“上海实业银行”等，把魔爪伸向各行业。除此而外，“七十六号”还在其他沦陷区设立特工组织，如特工总部南京区、特工总部杭州区、特工总部华南区等。总之，在汪伪政权成立前夕，特工总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特务机关，至一九四三年十月李士群被日本宪兵毒死后进行改组。其组织人事见下表：

“七十六号”汉奸特工组织，成了汪精卫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他们还越出了政治暗杀的轨道，在黄浦滩上，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当时，沪西一带赌台林立，丁默邨、李士群就指令吴世宝，令他将沪西所有赌台纳入“七十六号”势力范围。在日本宪兵队的支持下，他们以娱乐为名，大登广告，招徕赌客，“七十六号”坐地分赃，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汪伪特务处长级的头目每月可分得五百元，以下三百、二百不等，丁默邨、李士群和吴世宝本人，自然要高得多。赌台而外，“七十六号”又染指烟、毒。烟，指的是鸦片烟；毒，就是吗啡、红丸、高根、咖啡因等，这些东西是帝国主义者汲取中国人民血汗、残害中国人民的杀人软刀子，而“七十六号”将此视为珍宝，仍然由吴世宝出面，指挥其徒弟徒孙，到各处土膏行、售吸所“登门拜客”，以各种借口，甚至用手枪威胁鸦片烟瘾大的人，强迫各行各所向他们交纳“月规”。与此同时，吴世宝还在沪西郊区开设一爿制造吗啡的工厂，并在八仙桥首安里开店，专售白粉（吗啡），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而“七十六号”却由此牟取暴利。

所有这一切，都是“七十六号”汪伪特务们于出的罪恶勾当。昔日簪纓

满座、裙履翩翩的陈调元公馆，现在成了这群歹徒们无恶不作的罪孽的渊藪。
当时曾经有人这样描写过它：

“这二十世纪的人间活地狱，每个角落都充满了：

血腥、黑暗、卑劣！

紧张、毒辣、神秘！

这一切的黑幕，

是汪逆罪行的总暴露！”

蒋汪特工战之剪影

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和汪伪政权的秘密筹建活动，对重庆蒋介石集团来说，确是一个“隐痛”，潜伏在租界内的蒋方特工为了打击汪伪汉奸，使用其恐怖手段，以阻止汪政权的建立。因此，对付蒋介石“军统”及“中统”特务的威胁，保卫汪精卫一伙的生命安全，是“七十六号”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双方以牙还牙，刀来枪往，造成了蒋汪特工战的残酷争斗场面。

蒋汪特工战是以“七十六号”枪毙军统特务詹森为起点的。詹森，又名哈特，原姓尹，由于胡乱使用化名，其真名反而失传了。一九三九年秋的一天，詹森奉命在威海路智仁勇中学对面、上海青帮“通”字辈流氓季云卿家的后门口将季击毙。季与“七十六号”关系极深，不仅是“七十六号”大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的“老头子”；而且一手推荐了吴世宝、张鲁等“七十六号”几名最得力的打手，为汪伪特工的发展立下大功，因为这一原因，“军统”才决定将季除掉。

季云卿死后的一天，在“七十六号”大礼堂举行所谓“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七十六号”后台日人晴气庆胤等在会上致词，“悼念”季云卿等十二个丧命于“军统”枪弹、利斧之下的汪伪“和运”人士。“追悼会”结束后，周佛海刚回到办公室，十二个死者家属五、六十人跟着一涌而进，一个个披麻戴孝，全部跪在地上，嚎啕痛哭，要求周佛海为他们“报仇”。此时，暗杀季云卿的凶手詹森已被抓进了“七十六号”拘留所，为了安抚死者家属，也为了替活着的特务汉奸打气壮胆，以便稳住自己的阵脚，周佛海提笔批准将詹森处决。

从此，双方引开了杀戒。蒋方特务因詹森被杀而激怒，他们决定对“七十六号”进行报复。于是，双方各自施展浑身解数，今天你杀我二个，明天我还你一双，一时间把上海推到了腥风血雨之中。据《大美日报》统计，在一九三九年一年时间里，在上海租界内发生的各类狙击案中，死伤人数达四十四人之多。其中最突出的一例，是发生在沪西兆丰总会的枪击案。

沪西兆丰总会位于兆丰公园对面，是一个赌窟，内有舞厅，狂伪集团的上层汉奸在“七十六号”武装警卫的保护下，常到这里寻欢作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之夜，汪伪国民党的所谓上海五个中央委员——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在“七十六号”大礼堂宴请刚从香港来沪的大汉奸陈公博。席间，王天木、何天风酒足饭饱，突然想去兆丰总会跳舞，悄悄地对汪曼云说：“我们今天晚上去玩个痛快吧！”汪摇摇头说：“不行。”王天木、何天风以为汪曼云胆小不敢出去玩，便说：“你放心好了，我们自己带十杆枪去。”汪说：“我今天做主人，不能先客人溜走。”于是，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冯国桢四人，带了几个武装保镖悄然离席而去。

王天木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早年迫随胡宗南，曾与冷欣、肖洒、马志超、陈质平等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这个组织是比“复兴社”更早的法西斯团体。后来，王又与戴笠、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等结为一伙，从事特务活动。这些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军统”的所谓“十人团”。王天木又是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一九三九年夏，王任“军统”上海区长期间投敌，不久即到“七十六

号”担任“高级顾问”，并提升为汪伪肃清委员会 和平救国军总指挥。何天风，保定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生，也是“军统”在上海的重要干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敌时，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别动总队”第一支队司令，别动总队不久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何又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由于失宠于戴笠，何带着亲信丁锡山等投靠了汪伪，担任“七十六号”第三厅厅长，并任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陈明楚、冯国桢都是何无风部属，过去也是“军统”特务，随何天风一起投汪。

这一行四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兆丰总会，在舞池里跳了一阵，打算到后面的“优待室”里抽几筒鸦片养养神，然后一直跳到天明。由何无风、冯国桢在前，陈明楚居中，王天木殿后，四人相偕离开舞池，向“优待室”走去，所有副官、保镖也簇拥而去。当何天风等人刚走出舞池没几步，王天木的副官马河图突然拔枪向何、陈二人连开几枪，何、陈中弹倒地，冯国桢听到枪声，急忙卧倒，王天木则慌忙退回舞池，躲到舞池边上的沙发椅背后。直到日本宪兵闻讯赶来，才把他找出来。案发后，何无风、陈明楚的尸体被运往万国殡仪馆存放，王天木、冯国桢以及一起去的所有副官、保镖因受涉嫌统统被扣押起来。

原来，王天木的副官已被“军统”收买，他是接受“军统”的指令而将何无风、陈明楚击毙的。王天木虽然幸免，但因为凶手是他的副官，结果先后被关押在“七十六号”和南市警厅路集贤村六号伪政治警察署看守所达两年之久，直到一九四二年，王天木提供了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上海的住址，才因功被释。

在蒋、汪充满血腥味的特工战中，不仅刀光剑影，互相厮杀，还表现在对于特工人员的争夺。早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旬，当丁默邨、李士群初次谒见土肥原贤二时，他们就提出要夺取“军统”和“中统”的组织、人员，以发展自己的队伍。“七十六号”开张后，丁、李就运用过去的老关系，采取各种手法，拉拢蒋方特工人员，夺取蒋方特工组织。其中，有的是“先礼后兵”，即先用金钱、地位引诱，若不肯就范，再进行威迫恐吓，有的是“先兵后礼”，即先予逮捕，甚至施以酷刑，然后拉拢重用。依靠这两种方法，“七十六号”先后破获了蒋方留驻在上海和江苏的地下组织——“中统”苏沪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部、“军统”上海区，这些组织中大部分人员都参加了“七十六号”，不少人受到重用，有的成了“七十六号”的骨干力量。如“中统”苏沪区副区长苏成德，为丁默邨、李士群说服后投汪，成了“七十六号”的一员健将，先后担任了“特工总部”顾问、第三厅厅长、南京区区长、汪伪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伪首都警察厅厅长、伪上海警察局副局长、伪上海清乡事务局局长等职，并被汪精卫委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又如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主要成员掌牧民，一度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秘书长；石顺渊做了伪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处长兼电台总台长。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关系密切的张北生，被“七十六号”收买后官运亨通，先后任伪江苏省警务处长、江苏省民政厅长、苏州地区清乡督办专员、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办专员、苏北清乡公署主

“肃清委员会”是汪伪为策反重庆国民党军队而成立的一个机构。

“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别动总队”是由戴笠、杜月笙等发起组织的“军统”人员组织。

任，甚至担任了军委会苏北绥靖主任公署中将参谋长，代行由汪精卫兼任主任的职权。

蒋、汪特工战，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汪伪政权成立前后，最为激烈。当时，日本侵略者气焰正炽，争斗的场所又是在日军势力包围下的上海，“七十六号”显然占着优势，使蒋方留沪特工组织遭到很大打击。“七十六号”特务，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在与蒋方特工争斗中，还杀害了不少无辜，充分暴露了汪伪汉奸特务穷凶极恶的残暴面目，也使汪精卫集团更加声名狼藉。

十二 登台的序幕

汪记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有了“七十六号”特工武装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汪精卫集团加快了建立伪政权的步伐。

八月中旬，汪精卫风尘仆仆地从广州回到上海，立即召集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褚民谊、丁默邨等人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公馆整天开会讨论，策划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取得所谓“党统”的法律依据，好名正言顺地上台。

但是，按过去国民党的规定，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必须有各省市、各特别支部和海外支部推选的代表参加，汪伪在毫无基层组织基础的情况下，要产生各级党部的代表，谈何容易！为了拼凑代表，汪精卫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指派“特派员”分区包办招揽。那些“特派员”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力，只要他们证明，就可充当代表。野心勃勃的周佛海利用这个机会，伙同梅思平、丁默邨等人从江浙沦陷区内就地取材，充实数字。丁默邨在周佛海支持下，包办了上海市、江苏省两个党部，尽量把原属“中统”系统的特务都拉来当“代表”，还想染指南京市及安徽、浙江两省。适逢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区各级委员蔡洪田等三十六人联名发表反蒋拥汪宣言，老 CC 系就在党务方面占了优势。陈璧君则让他两个弟弟、三个侄儿一齐与会。李圣五更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统统提携为“代表”。负责华南和海外的林柏生，则把《南华日报》、《中华日报》一班伙计一起拉来。

但所有这些人合起来与汪精卫预计出席“六大”的三百名代表名额相距甚远。于是他们就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党员冒填党籍当代表。可笑得很，有的非国民党党员，不仅可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有的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是代表哪一个省的。反正是乱点鸳鸯谱，随意指派的。尽管这样，代表仍然凑不足数，就干脆采取威胁，甚至用绑架的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当时吴淞中学校长程宽正，就是这么一个“被绑架的代表”，不久他就将此事披露出来，公诸于众：

“八月廿七晚九时左右，D、E 来我寓所（这时我寓在成都路浦东银行寄宿舍四楼，除少数人外，很少知道，不知他们怎样得知），说明晚七时汪召集谈话，我们必须前去，到时他们再来约我同去等语。第二天早上六时半，我还没有起身，已经有人来叩门了，开了门，又见是 D、E 匆忙地说：‘赶快穿好衣服——汪先生谈话，改在今晨七时，我们快去。’一同下楼，汽车早已等在门口，二人挟我上车，又向沪西进发，一连转弯，到了某巨厦的门口下车，门警特别森严，进去的人，每人全身都须经过搜查。我见情形特殊，就问 D：

“是不是开代表大会？”D 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是，不是”。然而声音已经勉强而略带颤抖了。稍进十数步，招待员已经在胸前标着绸条，叫我们签名，签了名，随手接得标着“代表”二字的红缎带，这时如梦初醒，觉得我已在“荣任”伪代表了，不知 D、E 对我尚有什么可以遮掩。

“快要九点钟了，我想我每天上午八时前必定到校，今日参加伪代表大会究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恐怕校内同事悬念，要求 D 指示电话机所在地，打一电话回校。那知提起电话听筒以后，接线生就说今日不能打电话出去，废然而返，呆立如木鸡样者，久之又久。差不多到了十点钟光景，所谓‘代表’也者，都到会场去了。

你看我，我看你，大多不知是什么一回事。”

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拼拼凑凑地搞了二百四十人。

会议地点就放在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内那间三开两进的石库门房子里，由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负责大会的保卫与汪精卫的安全。为此，丁、李作了精心布置：严密封锁会议的消息，连那些“代表”们也都是进了会场才告诉他们的。会场警备特别森严，进来的“代表”，每人都必须经过搜查。开会那天，在“七十六号”大门外，还特地高高搭起了一座彩牌坊，中间用电灯缀了一个“寿”字，伪装这宅子里有人在做寿。同时还由日本人出面，与沪西意大利驻沪军司令联系，要他们派一小队意大利士兵，于当天携带机枪，荷枪实弹，驻守在“七十六号”对面，名为监视，实则戒护。

汪精卫住的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与“七十六号”相距不远，往返甚便，但对汪精卫来说，毕竟目标太大，万一发生意外，这台丑剧岂不是还未开锣就要宣告散伙？所以丁默邨与李士群提出，为汪精卫的“安全”起见，要他早一天到“七十六号”，迟一天回一一三六弄，予人以不备。汪精卫虽老大不愿，又不能不迁就。于是开会前一天晚上，汪精卫带着陈春圃和几个保镖，从“汪公馆”预先搬进了“七十六号”，就住在李士群的房间里。但汪对丁默邨、李士群并不很信任，为防止意外，汪让陈春圃搭起一张临时床铺，同他睡在一起，汪带去的几个保镖，都拦睡在房门外面。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汪记国民党“六大”在大雨滂沱中正式开锣，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恩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幕词，大谈所谓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是和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是一致的，他说：“上届大会提出抗战建国的口号，本届大会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所谓建国是什么呢？是完成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之建设，因为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生存，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独立自由，这是目的。至于抗战和平不过是达到这目的之一种手段，为达到这目的，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手段有不同，目的则无异致。”汪精卫还把这种卖国投敌的汉奸理论，说成是“中国国民党全体同志的公意，也就是中华民国全体同胞的公意”，真是厚颜无耻！接着，会议宣读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追认大会秘书长人选及通过大会议事规则。

这时，有人发现职员名单中有卢英的名字，表示不满。原来，卢英是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是湖北江陵人，字楚僧，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畿南招抚使暂编第四师参谋处长，暂编第七十军第一二师指挥部中将参谋长，第二十六军第三师第七团团团长，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上海市公安局侦缉总队队长等职。八一三事变后投敌，参与组织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维新政府成立后，任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到中午休息时，由伪上海、浙江和湖南党部推派代表前来责问，周佛海接见了他们。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会中，于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其中一人提出责问：“以汉奸而任大会的秘书，我们羞与为伍。”

“六大”的代表名单与职员名单，是经汪精卫、周佛海他们最后审定的。现在有人不满，这使周佛海深感恼火，于是他来记杀手锏：

“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

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

周佛海这番话，使这些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周佛海见此情况，干脆向他们亮了底牌：

“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

这时，这批新汉奸中反而无人敢站起来说“羞与为伍”了。最后采取一个折衷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按照木会顺序，上午还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其要点为：（一）自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起，本党（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二）所有中央党务机关，均着暂行解散，听候改组；（三）各级地方党部及特别党部，均着暂行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四）修改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五）除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由本届大会推选继任原职外，并由本届大会增选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八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人，中央监察委员二十六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十六人；（六）由大会电请尚留重庆或其他受共产党胁持各地点之中央执监及后补中央执监各委员，立即集中上海，共商国是；（七）在中央各委员未能齐集以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八）中央党务机关，各级地方党部，各特别党部，均由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尽速恢复工作。并由八十四个“代表”提出临时动议二件：（一）汪精卫“倡导和平，艰贞奋斗，挽救危亡，解民倒悬，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由主席团及全体代表起立向他鞠躬致敬；（二）依据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整理党务案》和上述两件临时提案的通过，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

下午，会议根据“和平反共建国”宗旨，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该案对国民党抗战期间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的方针政策，进行全面修改，把汪伪“和平运动”完全纳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轨道。此外，又通过了《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提案，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了一张又一张的标签。

接着，大会授权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交大会“讨论”。在这张名单中，卢英确是做了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底脚货，可在中央委员中还有更大的老牌汉奸，如维新政府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于是，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就在这时，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二个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代表”左右，丁默邨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弄得胡志宁已经到了口边的话，只好咽了下去，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卫一看这尴尬场面，急忙站起来说：“代

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

在会议过程中，还闹过一段插曲。事情是这样的：按照大会规定，会议所印发的一切文件，只准代表在开会时即席阅读，不许携出会场。可李士群却将一套全份偷偷地交给日特晴气庆胤。不料日方看后，发现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感到气愤，即由“梅机关”成员犬养健前来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为何派代表来开会呢？”日本人一发怒，汪精卫十分惶惊，急忙临时召集大会主席团开会商量对策。有人说，大会印发的文件，一部分是照过去老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不能没有这一条；有的则提出：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留此一条，确系秘书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但事实上并无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大会秘书长梅思平照此前去敷衍一番，才算了事。可是，汪精卫却打肿脸充胖子，在大会闭幕时致词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侮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真是做贼心虚，演出了一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丑剧。

这次会议通过并发表的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汪精卫集团宣扬“和平反共建国”谬论的代表作。

《宣言》声称根据“和平反共建国”方针，“授权汪同志”领导同志积极进行和平运动”。《宣言》还特地声称，他们“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挥原理”，然而，汪精卫集团所标榜的是伪“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要“贯彻睦邻政策之精神”，美其名曰：“决不以狭隘的爱国主义自囿，而陷于排外思想之歧途”，要同日本侵略者实行“亲善”外交，“以兼相爱交相利之精神相与努力，以期于东亚和平暨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所谓“民权主义”，就是废除重庆国民党之职权，以汪伪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亦即网罗汉奸，与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和平”，宣布“战争既息”，“国民大会得以召集，宪法得以制定颁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完成民权主义之阶段。”所谓“民生主义”，就是要以“消弭阶级斗争为念”，“划分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固根本不同，在方法上更相水火”，因而“去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显然，汪精卫集团的“三民主义”，只是一种反共降日，出卖民族利益，侵犯民权，危害民生，实行汉奸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伪三民主义！

汪记“六大”只开了一天即草草结束，但在汪伪喉舌报上，却大吹大擂地说开了三天。九月五日，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公馆”又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汪精卫任大会主席，作了对国际形势及党务政治情形的演说，并对“六大”交议各案进行讨论，并加推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最后成立“中央党部”，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邨为社会部部长，汪

马啸天、汪曼云：《“七十六号”的一场开锣丑戏》，见《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334页。

罗君强：《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69页。

马啸天，汪曼云：《“七十六号”的一出开锣丑戏》。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33—34页。

曼云、顾继武副之。汪精卫投敌集团就在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

三巨头南京会谈

汪记国民党“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为了加快筹划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汪精卫集团急于要同临时、维新两伪政府头目进行谈判，商议“合作”的条件。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汪精卫带着复杂的心情，偕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一行，前往南京。

汪精卫这次南京之行，是要同王克敏、梁鸿志进行一次正式会谈。王、梁是臭名昭著的老牌汉奸，汪精卫一伙曾经竭力攻击他们是“没有灵魂的傀儡”、“出卖民族的败类”，现在要同他们坐下来商量“国家大事”，这不仅需要有与他们不“羞与为伍”的勇气，而且还要将汪伪集团企图独占的中央权力，分些给临时、维新政府这批汉奸，就汪精卫等人的愿望来说，确是一件不愿意干，但又不得不干的事情。这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和汪精卫本人的处境。日本政府早就把“分治合作”作为其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伪“六大”召开之前，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就决定不能单独由汪记国民党一党独揽建立中央政府，而要与“既成政权”建立“适当协作”的方式，这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同时，汪精卫也考虑到，自从开展“和平运动”以来，他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而且也受到国民党内坚持抗战的人们同声谴责，处境极端孤立，不同临时、维新政府这批老牌汉奸合作，取得他们的支持，伪中央政府的成立，必将成为一纸空文。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情，汪精卫到了南京，在下关车站下车，由日本宪兵队的摩托车、兵车护送，住在傅厚岗一幢花园洋房里。

第二天，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巨头在南京“聚星俱乐部”进行会谈，汪开门见山就要求王克敏、梁鸿志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十月九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

对于汪精卫的意图，王克敏、梁鸿志早在意料之中。他们虽然认为自己投敌早于汪精卫，但看到日本方面对汪的重视程度甚于“既成政权”。因此，他们存在着既不愿意痛痛快快地交出权力，甘心情愿受制于汪精卫，从儿皇帝的地位降为儿皇帝的臣仆，但又不能不考虑日本方面的意旨，与汪精卫作表面上的敷衍，进行讨价还价。会上，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原来，政治会议暂定的二十四至三十名委员中，作为“社会重要人士”参加的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额只占六人。尤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规定对华北不给予行政权，只给处理华北“剿共”、地方绥靖、经济建设之权，连政务委员也要由中央派遣，这更使王克敏不高兴。于是，王、梁二人借口因为没有从日军在华北、华中机关接到任何关于汪的提案的通知，所以无法答允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王克敏还直言不讳地对汪精卫说，喜多诚一（日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长）到东京去了，喜多临行前叫王不要同意中央政治会议，即使他答应了也无效，非得喜多回来决定不可。这既反映了临时、维新政府头目不愿意被汪精卫集团吞并的心情，也说明南京三巨头会谈的实质，只是一次完全由日本人操纵的地地道道的傀儡会议。

就在这一天，日本方面在南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邸内，会集了山田乙三司令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樋口季一郎、影佐祯昭以及日本华中派遣军联

络部长原田熊吉等人协商关于三方会谈的对策。特地从东京赶来的樋口对他们转达阿部首相支持汪精卫的意向。这时，由于日军在中蒙边境哈勒欣河边远地区的诺蒙坎村附近挑衅，受到强大的苏联红军打击，吃了败仗。同时，在诺蒙坎之战进入高潮时，德苏之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使得亲轴心的平沼政府由于德国的“出卖”受到国内政潮的冲击而迅速垮台，“素以同情汪精卫著称”的阿部信行大将组阁。当阿部上台后没几天，欧洲大陆已硝烟滚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为摆脱其陷于中国长期抗战中的困境，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正在制定其一手扶汪精工上台，一手拉蒋介石投降，促使蒋、汪合流的政策。但日本朝野弥漫着对汪精卫的不信任气氛，认为单靠汪出马组织傀儡政权来解决中日战争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如果不包括重庆，“新政府”就没有武力和财政的基础，即使汪发布停战令，也决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酿成永久抗争的情况”。然而，重庆蒋介石集团又不愿按日方所提的条件谈和，阿部面对困难局面，只好采取“现实主义”政策。九月十三日，阿部内阁发表声明，声称将努力支持汪伪中央政府的成立，“实行适当方案，以期达成处理事变之目的”。为此，樋口奉命到南京向驻华日军头目作了传达。

九月二十日上午，影佐、原田和刚从东京回来的喜多，参加了汪、王、梁会谈，影佐当着大家的面宣布阿部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汪听了，满心喜欢，以为日方既有如此决定，会谈一定可以顺利进行下去了。

谁知到了晚上九点钟，王克敏、梁鸿志匆匆忙忙跑来声明：

“我们对中央政治会议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临时、维新政府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不是唯日本马首是瞻吗？何以阿部内阁表示支持的事，王克敏、梁鸿志竟表示不合作的态度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王、梁都是老牌汉奸，他们自以为投敌比汪精卫早，不愿寄人篱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这点，连日本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影佐就断言：“在时间上来说比他们迟出来的汪精卫要组织中央政府，把临时政府降格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正处在解散的命运，这样一想，两政府要人也不能安心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更何况，临时、维新政府都受当地侵华日军所控制，临时政府的太上皇就是喜多诚一，维新政府的太上皇就是原田熊吉。当时，日本侵略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充满了矛盾，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军队之间，各军兵种、各驻屯军之间，军令不一，各自为政，对上帝的指示，凡不符合自己需要的，照样可以推倒，各行其是。尤其是在华日军，更是拥兵自重，形同割据。他们都想操纵其支持的傀儡政权，扩大自己的势力，而不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伪中央政府。因此，临时政府与其说是日本的傀儡，还不如说是华北派遣军的禁脔，维新政府自然也就成了华中派遣军的禁脔了。这样，汪精卫出马建立中央政府，要取消临时、维新政府，王、梁固然不同意，喜多、原田也不愿意，王、梁有喜多、原田作靠山，当然就不买汪精卫的帐，竭力反对汪为他们安排的命运。

王克敏、梁鸿志的声明使汪精卫感到大失所望，他心灰意冷地准备明天回上海。

第二天一清早，周佛海急忙去找影佐，把王克敏、梁鸿志的意见和汪精卫的态度告诉了影佐。影佐一听，马上打圆场，说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

[日]影佐祯昭：《漫谈》。

他们的话不可当真。于是，周佛海又兴冲冲地将影佐的话报告了汪精卫。汪转忧为喜，取消了回沪的决定，与王、梁继续会谈。这一喜剧式的变化，陶希圣把它比作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每一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参谋——喜多、原田、影佐等日本官员。打到两圈之后，几个参谋即从后面把手伸过他们的肩头，来替他们摸牌、出牌，作决定，那座位上的几个角色反而束手。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名额分配上作了些让步，九月二十一日，三巨头才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其要点是：

一、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建中央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的主要项目，以汪精卫的提案为基础。

二、政府建立后，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担当议政。

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汪精卫所准备的条例为草案，王克敏、梁鸿志努力做到不加修正通过。

三、中央政治会议名额的分配，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维新政府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分配给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

四、中央政治会议的议决方法，重要的事须全体或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决定，一般的事，可由二分之一以上委员决定。

五、在中央政治会议中应讨论的政府名称、首都位置、国旗问题等重要事项，事先须充分协商，以便会议中尽量做到全体一致通过。

上述《决定事项》虽然对中央政治会议作了原则上的规定，但对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限以及如何建立政府的具体问题，则未涉及。

三巨头南京会谈充分暴露了新老汉奸之间的矛盾角逐、尔虞我诈的丑态，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对新老汉奸的操纵。因此，这次会谈没有收到“实质性的效果”，汪精卫甚至不愿意发表公开声明，只是考虑到对外的影响，特别害怕重庆方面可能趁机宣传，才于九月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之了解与热烈之赞同”。大家不会忘记，汪精卫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把王、梁等人捧上了天，他说：“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因军事失败；先后放弃北平、南京等处，政纲解组，民无所依。王叔鲁、梁众异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汪表示对他们，要“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同一天，汪精卫又在南京接见记者，说他同王克敏、梁鸿志“交换意见”，是为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作准备。汪精卫一表态，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也相继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然而，这些声明完全是表面文章，由于

[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 UD51 号》。

即王克敏，字叔鲁。

即梁鸿志，字众异。

汪精卫：《声明》（1939年9月21日），《中华日报》1939年9月22日。

《维新政府声明》（1939年9月21日），《中华日报》1939年9月22日。

《临时、维新政府联合委员会声明》（1939年9月21日），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

南北日伪要人采取拖延战术，汪伪政府登台的日期，不得不从一九三九年十月九日向后推迟。陶希圣事后曾描述汪精卫等人对这次南京之行的感觉说：“谁都不愿意提这次旅行”，“我们全都感到忧郁、屈辱、可耻和后悔。”

签订汪日密约

在与南北老牌汉奸交涉的同时，汪精卫集团正加紧活动，以乞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然而，他们又一心想使将来所建立的伪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权”，从而吸引重庆政府，争取民众的支持，因而不希望日本对它控制得太紧。为此，汪精卫集团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间，曾三次向日方递交了《对日本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的希望》、《有关新中央政府财政问题对日本方面的希望》、《希望日本方面考虑的种种事项》，从内政、军事、经济，以至关税、统税、盐税的收入及长江开放、京沪铁路通行等问题，要求日方以事变前的状态为基准，用事实证明日本对中国的“好意”。但日本方面未能接受汪的要求，十月三十日，兴亚院连络委员会所决定的《日本方面回答要旨》，对汪提出的各项要求全部打了回票。例如，汪方提出为避免引起干涉内政的怀疑起见，希望在中央政府中有关行政的院、部内，不任用日籍职员；日方却坚持日汪间的“互相帮助”，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也在财政、经济、行政等方面。因此，中央政府应聘请日本专家为顾问，中央各直辖机关可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员及技术员等。又如，汪方提出要确立军事指挥权的“独立性”，希望从中央军事机关到各种军事教育机关，招聘日、德、意军事专家为顾问和教官，但日本方面强调商议有关两国军事合作事项，只设置日本军事顾问，不得使第三国加入，完全否认了汪方的意见。

其实，日本侵略者早就企图通过汪伪政权的建立，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并准备签订所谓调整中日关系条约，从“法律”上加以巩固。一九三九年九月，汪、王、梁南京三巨头会谈后汪政权的成立只是时间问题了，日侵华殖民机构兴亚院就借口“和平政府成立后，为中日两国间缔结条约奠定基础”，提出了与汪方谈判的具体方案。这是一张“详细清单”，开列了如果支持建立新政权，汪必须遵从的各项条件，包括一系列要纲、原则和谅解事项。其中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外，另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同时还提出了《秘密谅解事项》八件。这时，日本的所谓“强硬路线派”在内部占了优势，因此日方拟出的条件特别苛刻，其内容之多，范围之广，不仅包括了过去临时、维新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件全部内容，而且更超出了六月六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所作出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内容。参加这次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方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兴亚院的方案，引起了日本内部不少人非议。有一天，参加方案起草的军部堀场一雄中佐悄悄地对影佐祯昭说：

“请你注意，我们提出的年约原案，条件非常严苛。依常理揆度，汪方势难接受。”影佐听了，反问道：“假使汪精卫能照原案全盘接受，对于促进全面和平会有效吗？”

堀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敢保证，即使汪氏按照原案全盘接受，和平亦绝无可能。”

陶希圣：《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3日。

影佐要求堀场作进一步说明，堀场打了个比喻：

“让我们姑且假定，倘若要使汪精卫不当汉奸，他将在内约谈判中争取到六十分，那么，兴亚院的原案就给他打了个对折，充其量只能得到三十分而已。汪君如若竭力争取，一步也不退让，那我们所给他备下的原案，北起满洲，南迄海南岛，就地理顺序划分，一共给他列了若干条。汪君若能每天修正一点的话，务使他们获得六十分不当汉奸的标准，大概要花一年的时间。”

十月初，堀场一雄带着兴亚院的方案，来到上海与“梅机关”商量，影佐祯昭、犬养健、今井武夫等人也都觉得太过分了。从日本内部对汪政权建立所持的态度看，影佐等人属于日本政府和军队中的所谓：“和平亲善派”，他们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潮流面前，悟出了一条道理：中国的民族意识是不可以征服的，诉诸武力解决不了这场战争。因此，他们竭力支持汪精卫的“事业”，希冀另辟蹊径，走向大东亚的“王道乐土”。出于这种目的，他们对兴亚院的方案表示不满。今井武夫坦白地承认，由于权益思想在作怪，政府各省乘机另行加上了不少条款，“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影佐看了这个文件，“不禁为之黯然失色”，断定兴亚院的方案是“一曲挽歌，甚至在汪政权成立之前，就标志着和平运动的失败。”清水书记官认为：如果以此文件为基础与汪精卫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的信义，对日本十分不利，即使汪接受了，对“和平运动”也不见得会奏效。他建议影佐把这一方案退回去，“要求上司重新考虑”。但影佐劝他们说：“对于兴亚院决定事项，我也感到不高兴，有首先把它送回去，促使重新考虑的心情。然而一经奉命以此案进行谈判，正确的办法就是忠实执行。”又说：“本草案是政府负责决定的，梅机关成员如果只凭自己主观予以批评，并送回去，那是不适当的。由此，我认为把这个草案率直地拿给汪看，也听取汪的意见，老实接受其意见中事理明了部分，以修改草案，然后向政府提出意见。”大家表示同意。

就这样，“梅机关”遵循兴亚院意图，催促汪精卫集团与之进行谈判。十一月一日，由影佐出面写信给汪精卫，并将兴亚院草拟的谈判条件原封不动地当面交给周佛海，由周转给汪。汪精卫发现，日方的条件大大超出了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背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精神，因而感到失望和忧蹙。但是，要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建立伪政权，又怎能不听凭人家摆布呢？于是，汪精卫提笔给影佐写了回信，大意说：

“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

但对以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

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库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汪精卫对日本还抱有幻想，希望能通过与日方“肝胆相照”，在谈判桌上取得日方的让步，以便为他的卖国行径装饰门面。就在这一天，日汪双方代表在上海六三花园二座亭榭式的房间里，坐在榻榻米上，围绕着日方分发的“内约”打字油印本，开始谈判。

谈判一开始，影佐鼓起如簧之舌说：日本方面认为毫无保留地将全部要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2页。

[日]影佐祯昭：《漫谈》。

求一次提出来，这是披沥了日本的“诚意”。日本的要求是为了建立“日中永久和平”，而不是从战胜者的姿态提出的，希望虚心开怀，互相讨论。汪方代表认为：读了日方提出的草案，既感惊讶，又感安心。安心的是日本的要求不可能比这更多的了，惊讶的是所涉范围非常之大，表示要坚持今后的讨论应以重光堂会谈、近卫声明及汪精卫访日时的约言为基础，超乎这三者以外的，难于接受。因此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从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共开了七次会议，对日方提出的草案讨论了一遍，提出了一个修改案，但仍然有十七个重要问题作为悬案留了下来，包括：蒙古与华北的境界、华北税收的分配、日本驻兵与撤兵以及海南岛问题、交通运输问题、派遣日本顾问问题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汪双方一方面通过谈判缩短距离，另一方面影佐派犬养健每晚到周佛海家里去，与周夜间折冲。然而，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会议难以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特地请影佐面谈，他带着悲伤的神色说：“日本方面提出的草案实在与近卫声明相距颇远。因此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同志们感到失望，已经有人退出，今后还会有人退出。以后，谈判中虽然有所修改，但现在日华两个委员会之间谈判停顿的事项，尽是对我的和平运动成为致命伤的问题。”为了要挟日方，汪精卫言不由衷地向影佐提出，如果日方的草案不修改，就会难为影佐，因此，要求把这次谈判暂停一下。汪说：“我以和平为宗旨的信念没有变化，只是中途把成立政府的方式停止一下如何？”影佐听后不免一惊，汪精卫如果真的打退堂鼓，日方策划经年，由他提线的傀儡戏就唱不下去了。于是，他安慰汪精卫说：“日本政府对此的最后态度还不知其详，因此我还没有达到悲观的结论。”并表示“今后还要加以努力，不惜对日本政府尽居间奔走之劳，以符尊意。”十一月十六日，影佐回到东京，向陆军大臣畑俊六、参谋次长泽田茂等人说明谈判情况和汪精卫集团的态度，希望取得谅解。影佐反复陈述说：“与汪精卫签订秘密条约的目的在于对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明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程度”，要求越苛刻，就越使中国民众“怀疑”日本的“诚意”。但许多人公开反对，有的说：如果和重庆政府谋求和平，条件可以减轻，而现在下能减轻；有的说：即使对重庆政府，日本还要坚持现在的条件。因此，根本没有接受影佐的意见。临走前，陆军大臣畑俊六命令说：无论如何要努力导致谈判成功。

影佐回到上海后，双方重新开始谈判。日本方面虽然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作了点“让步”，但对实质性问题却寸步不让。十二月三十日黄昏时分，汪精卫最后在密约上签字画押。对此事，影佐曾哀叹道：“作为开展和平运动的招牌、有重大意义的秘密条约，实在消失了吸引力，没有味道，非常遗憾。”

日汪密约的签订，使日本取得了几十年来梦寐以求而在临时、维新政府那里尚未完全得到的权益。在军事上，日本拥有确定防共军驻屯权、确立治安驻屯权；日军保留在驻屯区域所有铁道、航空、通讯、主要港湾、水路的军事上要求权及监督权；所聘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在汪伪军内有其指挥权。在经济上，日本有其全中国航空支配权，有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企业权（在华北，日本有优越地位，在其他地区，中日“平等”）；有掌握华北铁道实权；中日共同经营华北无线电通讯权，日本并占优越地位；有

[日]影佐祯昭：《漫谈》。

开发和利用华北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埋藏资源权；有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年指导经济行政权。总之，条约的签订，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按胞日汪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可是不到一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高陶拆伙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汪伪“和平运动”的“首义分子”，但当他们逃离抗战阵营、随汪投敌后，终于尝到了当汉奸的苦果。

高宗武体会最深。由于日方怀疑高把日汪密谈的内容泄露给了重庆蒋介石集团，因而采取对高的戒备态度。一九三九年六月间，汪精卫一行赴日谈判组府条件时，日方就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安排于东京北郊泷野川的古川男爵别墅居住，而对高宗武则以其有肺病为辞，指定他住在隅田川西岸桥场町大谷米太郎的家里，使高与汪精卫等人隔开，并对他封锁消息。不仅如此，日方还密商乘机扣留高宗武。有一天，影佐祯昭来见汪精卫，告诉汪说：日方有不少人怀疑高宗武，说他靠不住，有可能被重庆利用，主张以养病为名，把高扣留下来，“暂时”不让他回上海，过一段时间再讲。汪精卫听了，认为这样做不妥，这事才未果，对此，高宗武也略有风闻。

回国后，随着伪政权筹建工作的展开，汪精卫集团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权力分配的斗争。汪派汉奸分子，本来就是一批唯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之间无时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高宗武自恃牵线有功，“和平政府”成立，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够平地飞升，可以当个外交部长。不料他费尽周章，汪精卫却以他“年事太轻”为由，实际上害怕日方反对，内定他为外交部次长，部长一职则让汪的连襟褚民谊充任，高的内心极为不满。

同高宗武一样，陶希圣这时也有一肚子怨气。陶是改组派老人，汪精卫一向视他为腹心之寄。到上海后，汪因嫡系人物很少在左右，对陶更加倚畀。但陶对权位志不在小，他原想当实业部长，但这一肥缺汪精卫已先许给了梅思平，陶被内定为宣传部长。而宣传部次长又内定为汪精卫的亲信、“公馆派”的主要干部林柏生。林依仗汪精卫夫妇作靠山，锋芒毕露，根本就不把陶放在眼里。同时，陶希圣同周佛海为首的所谓CC派之间也有矛盾，尤其同梅思平、罗君强平素就极不相容，互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陶希圣被骂后，只好哭诉汪精卫，无奈周佛海大权在握，CC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

正当高、陶忿愤之际，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入。杜月笙首先与高宗武发生了关系。事情是这样的：高有个老长辈叫黄溯初，他是日本留学生，早年当过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抗战前做生意蚀本后，跑到日本长崎晓滨村隐居。高赴日之际曾找过他，向他倾诉自己的苦衷，黄听后就鼓励他回重庆去，并答应帮他的忙。不久，黄亲赴上海，找到他的同乡友好徐寄庠，要他与杜月笙接洽。

杜月笙得知这个消息，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自香港飞往重庆见蒋介石，汇报此事，蒋要他迅速回去处理。几天以后，杜月笙又获悉上海正进行汪日密约的谈判，他再次飞渝。到了重庆，蒋介石立即传见杜，并写了一封亲笔信，托杜转送高宗武，称高为“浙中健者”，对高进行拉拢。与此同时，宋美龄也亲自出马，派人规劝高宗武的妻子，要她说服高离开汪精卫。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而跑来威胁她，说如果高继续对汪精卫效忠，就要对不起了。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武准备拆伙而去，向蒋介石集团“反正”。

为使高宗武顺利逃跑，杜月笙指示留沪的徐采丞助高叛汪。由于日汪戒备森严，防范严密，一时难于使高宗武安然脱险；同时，又考虑到日汪之间

的密约谈判定于十二月底完成，高宗武决定等密约签订后，将原件盗出，加以摘录或摄影，作为向蒋介石集团“反正”的见面礼。鉴于上述原因，高宗武未能马上采取行动。

高宗武、陶希圣都曾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许诺所迷惑，他们在日本的“归还租界”、“撤军”、“不赔款”等“温和”的曲调中，产生过幻想。但是，当他们参与日汪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后，对汪精卫、周佛海的过多让步，表示不满：同时，又进一步看到了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离他们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高宗武即以日本传统诗的形式，写了一首小调：“北方，南方，高山，海洋，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中国百姓将何处为家？”陶希圣则认为象这样黑字写在白纸上，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署，这件事干不得，他意识到再不悬崖勒马，就必然死路一条。于是，高、陶两人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

高宗武、陶希圣态度反常，引起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果然，一九四一年元旦之前，有人密告陶希圣，说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号”特工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深感自危，早晚带着一支手枪护身。

就在这时，高宗武突然来到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家里，两人处境相同，一经交谈，便对汪精卫、周佛海大发牢骚。陶希圣对高宗武说：

“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

高本来就拉陶希圣一道出走，现在陶把事情已经挑明，高就直接了当地说：“走了吧！”事实上，徐采丞等人已经奉杜月笙之命替高宗武预备了船票，同时严密制订了保护高顺利逃跑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会发生什么困难。

为了迷惑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元旦那天，陶希圣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分别向汪、周拜年。同一天，高宗武也到周家，同周进行了交谈，周在日记里写道：“宗武来谈，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提，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指汪伪国民政府）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

高、陶的手法确实瞒过了汪精卫等人。一月四日上午，高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一人则先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之后进入大楼，再从后门叫街车到黄浦滩码头，登上轮船，与高会合，抵达香港。与此同时，由高宗武妻子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约胶卷底片，也携带到港。

但这时，陶希圣的妻子和五个孩子还留在上海。等陶一走，他的住宅门口立刻来了便衣特务，进行侦查和监视。陶希圣知道家属的危险，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要求汪保护他的家属，说如果陷害他们，他就要走极端了。汪精卫见硬的一套行不通，就来软的，叫陶的妻子先带二个孩子去香港，劝陶回沪，还留三个孩子在上海作人质。陶妻到香港后，立即致电陈璧君，说陶希圣“即可偕返上海”。当时，汪精卫等人正忙于要同临时、维新政府头目进行青岛会议，同时也为争取高、陶“回心转意”，因而对陶的三个孩子未加严密看管。没有几天，他们就在杜月笙在沪代表万墨林的策划下，逃出了上海，于一月二十日到达香港。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77—178页。

《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1日）。

第二天，香港《大公报》在“汪的卖国密约”的标题下，公开披露了高、陶提供的日汪密约，同时发表了高、陶致该报及致汪精卫的公开信，声称他们“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但参与《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信中还揭露汪日谈判过程中，“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而汪精卫却“迷途已深，竟亦迁就许诺”。高、陶以一副“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无益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高、陶的出色表演，取得蒋介石的欢心。后来，陶希圣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一变而成了蒋介石的亲信幕僚。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就出自陶希圣的手笔。而高宗武则拿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护照和一大笔美金，在驻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横渡太平洋，跑到美国定居。

汪日密约的暴露，把汪精卫集团内部搞得闹哄哄，乱糟糟，一片叫骂之声不绝。周佛海在他的日记里咬牙切齿地写道：“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汪精卫听到这一消息，忍不住“热泪沸腾”，骂道：“脱党的事件，还可以忍耐；不过，这卑劣的背叛行为是不可恕的。”汪精卫深知，卖国条约的暴露，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透了汪精卫集团“和平运动”的真相，他们更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日子更加不好过。他仰首号叹，连声说：“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家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

为了挽回影响，将其真相掩盖起来，汪精卫集团开足所有的宣传工具进行反击。陈璧君急忙叫陈春圃以汪精卫随从秘书长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三日发表声明，说高、陶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面记录”，而高、陶之所以“蓄意撮合存”，是为了“故意取媚于渝方当局”。陈在声明中还吹嘘说：

“吾人与日方所商订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之生存与自由独立”，凡非中国国民所能接受者，凡有损害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拼命往汪精卫脸上涂脂抹粉。二十四日，汪精卫接见路透社特派员，发表关于高、陶事件的谈话，一会儿称高、陶公布的只是“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人士之私案”，高、陶“居为奇货，向重庆告发，此种行为，不仅怯弱，且适足以表见其蒙受诱惑，自堕人格矣。”一会儿又称“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汪精卫前言不搭后语，反映了他内心的虚弱。更精彩的是，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的社评中，却自认“和议的结果为损失”，而又以“只要屈辱而不至于屈服，

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香港《大公报》1939年1月21日。

《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8日、22日）。

《汪先生苦难回忆录》，见《和运史话》，第19页。

《中华日报》1940年1月26日。

《南京新报》1940年1月26日。

损失的度不至于断送复兴之基础，和了还是比战到灭亡要好”等语进行诡辩。一个声明，一篇谈话，一则社评，矛盾百出，相互打耳光，真是欲盖弥彰，活脱脱地现出了这伙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十三 汪伪政权开场

青岛群奸聚议

汪日关系基本条约签订后，汪精卫集团就积极准备与临时、维新政府等傀儡政权头目，聚集于青岛，就组府问题举行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日本梅机关一手策划而进行的。据周佛海日记记载，从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开始，“梅机关”成员即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多次商议此事。例如：

一月四日，周佛海、梅恩平、林柏生与谷萩、清水、矢野、堀场等日人，“会商青岛会议之各项准备，当讨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组织条例”。

五日，“中日双方开第二次会议，筹备政治会议各项问题，决定华北政务委员会等重要案件。”

六日，“中日双方同志，为筹备青岛会议，开第三次会议。”

七月，“中日双方开第四次会议，筹备青岛会议，并规定会谈日程为四日，大约或须延长一日也。关于会议形式，及各种应注意之点，均顾<考>虑周到，预拟办法。”

八日，周佛海与梅恩平、林柏生等人“审查全部条件，并决定青岛会谈时，对王克敏、梁鸿志公开范围”，会后，“首拟臆呈，一面报告汪先生；一面通知谷萩。”

十三日，“谷萩来接洽青岛会谈各项准备，旋偕思平谒汪先生，商日本承认及青岛会谈各问题。”

十九日，“会同影佐、须贺、清水、矢野、谷萩、堀场及思平、柏生在汪先生前商讨青岛会议各项问题。”

经过周密的策划，十九日，汪精卫致电王克敏、梁鸿志，邀请他们赴青岛进行会谈，讨论“国家大计”。为了安全起见，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奉命带了“七十六号”几名特务当保镖，先于汪精卫到达青岛，检查、布置安全措施。李根据原“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提供的线索，了解了“军统”青岛站特务的活动规律，并逮捕了该站站长傅胜兰。接着，又抓到了青岛站出纳丁美珍、总务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十多人，同时查获了电台。丁美珍是傅胜兰的姘妇，她被捕后提出，只要使傅恢复自由，并同意让他们结婚，她可以说服青岛站所有人员投汪。李士群接受了这一条件，于是，“军统”青岛站集体投靠了“七十六号”，他们原先奉命准备在青岛会议期间狙击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以阻止伪中央政府的成立，现在却充当青岛会议的卫士，担负起警戒任务来。

一月二十一日清晨，汪精卫偕同周佛海、梅恩平、褚民谊、林柏生、罗君强等人，在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萩那华雄等日人陪同下，登上“奉天丸”轮离沪，于翌日下午三时抵达青岛。这时，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朱深因事回北平，未出席此次会议）；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以及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等人都先后赶到这里聚集，于二十四日开始会谈。

这次会议首先肯定了关于伪政权建立的基本指导原则，承认“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的机构应网罗汪精卫等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及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及社

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并且重申“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府之中。”

显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分治合作”方针的具体化。

接着，会议讨论了几乎全出于日人之手的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国民政府政纲及其政策，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文件，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文件，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文件，国民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以及国民政府之机构等各种问题。临时，维新政府的头目表示毫无异议，一致同意。同时，还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于三月初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于三月中旬建立。中央政府建立后，“立即设置有关实施宪政的委员会，以促进训政期向宪政期的过渡。”

人们不禁要问：青岛会议何以没有见到南京会议期间的争吵现象？原因主要有二点：一是因为南京会议后已签订了汪日密约，汪精卫集团以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换取了日本对于建立伪政权的支持，日本方面因而强调了王克敏、梁鸿志与汪精卫合作的“重要性”，而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老汉奸的合流，使得临时、维新政府头目“逐渐理解汪的运动，并有诚意协助这个运动”；二是由于青岛会议进行了明确的分赃。比如对于临时政府，认为华北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治制度”，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规定：一、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范围内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任的政务，并监督各省市。二、华北政务委员会设内务、财政、治安、教育、实业、建设六个总署。各总署设督办一人，由委员兼任。三、委员会有权任免下属各机关荐任官以下的职员，处理本地区的防共及治安，成立绥靖部队并有权指挥；有权处理华北资源的开发，对外贸易及管理华北的国有财产，处理地方对外交涉事项和指挥监督下属各省市政府；有权发布命令及单行法规等。可见华北临时政府仅仅换了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新招牌，其他照旧。对于维新政府，则就其人员并入汪政权的问题作了具体安排，使维新政府头目在“新政府”中各得其所。因此，除梁鸿志原为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无法在汪政权蝉联原职而内定为伪监察院长外，其余温宗尧的伪司法院长，陈群的伪内政部长，任援道的伪绥靖军司令，高冠吾的伪南京市长一律蝉联。至于原有各机关的大小伪官，一律“量才留用”，如有变动，仍然给予津贴以维持生活。通过分赃，这批新老汉奸终于成了同床异梦的伴侣。

会议期间，汪精卫集团还就“新政府”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关系达成协议：汪方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伪蒙疆方面表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力。也就是说，由于蒙疆的“特殊化”，伪蒙疆政权有继续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必要性。后来，尽管伪蒙疆代表参加了伪中央政治会议，还在伪政权中任职，但伪蒙疆政权却“始终屹然独存”，汪伪无权染指。

青岛会议为汪伪政权的开场奠定了基础。汪精卫一伙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二十六日，汪精卫于会议结束的当天发表谈话，声称：“第一次之会谈（指南京会谈），已略具端倪，今进为第二次之会谈，所得结果，

[日]《国民政府要览》，新武汉社 1942 年版，第 29 页。

[日]《国民政府要览》第 30 页。

[日]影佐祯昭：《漫谈》。

李超英：《伪组织政治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 1944 年 1 月版，第 24 页。

更为圆满”，“一扫过去参差隔阂之弊，同心协力，以负责收拾时局之责任”，“青岛会议，实可称为和平运动之一大进步与发露也。”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次会议姑不论将来有无变化，结果实可谓完满也。此皆事前筹备周到之效，吾辈运动又告一阶段矣。”

一月二十七日，汪精卫一行回到上海，他们鉴于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召开，“乃以集合国民党及各党各派，以产生新中央政府为任务”，首先在内部进行动员。高、陶逃跑事件发生后，老的汪派分子屈指可数，于是陈璧君亲赴香港，催促陈公博早日“归队”，到上海共议大事。

陈公博于《艳电》发表后，就一直蛰居香港，深居简出。他一面在撰写《苦笑录》，叙述他在一九二五至三六年间所经历的几件大事，据他自己说，这本书揭了政治上的内幕，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为该书作序时曾表示要等书中人物三分之二以上作古才付刊；一面在观察形势，待机而动。虽然，陈公博也看到汪精卫组织伪政权前途未卜，因而迟迟不愿赴沪公开参加，甚至“力劝，汪放弃组府计划。一九三九年七月，陈公博派了他的亲信何炳贤赴上海，参加汪精卫召开的第一次“干部会议”，何代表陈在会上发言，反对降日组府，说这事毫无保证，请汪郑重考虑。但此后，陈公博与汪精卫仍然保持联系。同年八月，汪精卫赴广州活动时，陈奉召前来会晤。十二月下旬，汪精卫召陈公博来上海，说汪日“基本关系条约的草约已开始讨论”，如陈不来，“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于是陈再次抵沪。其实，这时汪日蜜约的谈判已基本结束，就等签字，汪的用意是：自他至上海后，陈一直蛰居香港，对他的“和平运动”无所贡献，将来伪政权成立，陈又必须安排于高位为他“分劳”，陈无功而受禄他人难免不服。因此，汪让他来上海，安排陈与日本海军须贺彦次郎就海南岛建立日军基地问题进行会谈，让陈有所表现。这是汪精卫的良苦用心。但陈公博与须贺进行六次会谈，毫无结果，陈又回香港。

陈公博靠汪精卫一手提携，长期以来是汪政治上的追随者，又是汪得力的左右手，他政治上的升沉与汪的地位是联在一起的。然而，陈又历来把政治上派别关系、派别利益看得高于民族关系、民族利益，所以尽管他此时对汪的组府主张并不赞同，但当高、陶出逃后，他看到汪政治上受到打击，身边缺少得力助手，认为在汪有困难时应该挺身而出。所以当陈璧君前来催促，陈公博如同出山的隐士，于三月中旬抵达上海，立刻向汪精卫表达了自己的心迹。他说：“九一八事变后，你以跳火坑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劳。”汪精卫听后大为感激，陈璧君夸赞他为“忠臣”。

为了集合“各党各派”，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二月十二日，汪精卫派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邀请了一批“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向他们报告汪日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经过和青岛会议情况，并讨论了中央政治会议各项问题。被汪精卫集团特邀的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所谓“各合法政党的领袖”，一个是江亢虎。此人原名绍铨，别号康瓠，一八八三年七月出生于江西弋阳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早年留学日本，曾为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09—114页。

《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25日）。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袁世凯聘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兼《北洋官报》总纂。辛亥革命后创建中国社会党，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客。抗战爆发后，江亢虎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还要朋友陪他到弄堂饭店去吃饭。汪精卫集团到上海后，江亢虎即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主动靠上去。但这时，该党连一个党员都没有，江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伪“和平运动”。另一个是诸青来，他是清末留日学生，名翔，以字行。曾任清朝农商财政等部官员，他以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的名义，代表该党入伙。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长、中央检审委员会委员长赵毓松，他是青年党党魁曾琦、左舜生的得意门生，是该党的第二流角色。这些“领袖”人物，每月都由汪伪拨给他们二三万元的“活动费”，来替“和平运动”吹喇叭，抬轿子，给伪中央政治会议装饰“多党政治”

的门面。

所谓“无党无派”人士，更是五光十色，无奇不有。除赵尊岳、岑德广、徐良等而外，还有一个杨毓殉。他原是清末山东巡抚杨士骧的侄子，早年入陆军大学，后为袁世凯的女婿，曾任东北军宪兵司令。一九二九年张学良枪杀杨雨霖后，他也离开东北，跑到法国一混好几年，买了一个学位回来，但始终不得志。这次，杨约了几个原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投汪，想在政坛上再露身手。另一个是赵正平，他是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字厚生，清末时在广西陆军小学教过书，后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加入江苏教育学会，曾任暨南大学校长，并替孙传芳办过教育，后又远走华北，在国民党北平第一任市长何其巩手下做过教育局局长，当过青岛市社会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执教鞭，暗中结交了日本驻上海副领事岩井英一，是个冒牌的“无党无派”人士。……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拼拼凑凑地搞了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于是，日汪双方互相配合，开展了一场舆论宣传：

三月九日，日本首相米内光政发表谈话，说什么日本要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断然溃灭中国之容共抗日政权”，而现在“中国方面，体会帝国真意，揭示反共和平方针，以汪精卫为中心之中央政府，行将成立，帝国政府决定从速承认，并予以全幅之援助。”

第二天，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发表《陆军纪念日感言》，也说要遵循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既定方针”，“援助新政权”。

三月十二日，汪精卫发表《和平宣言》，声称“和平运动”已经进入“组府还都实践阶段”，说他们数月以来，“与日本朝野，披沥诚意”，“与国内各已成政权，各已成政党暨贤智人士，悉心讨论收拾时局之办法”，“由是有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中央政府亦将缘是产生。”汪精卫吹嘘道：“自今以后，举国人民皆在统一而有力之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扫除历年之纷争与战祸，而实现和平与幸福之新天地矣。”

在一片鼓噪声中，那两个拿了“活动费”的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也于十四日分别以“政务特别委员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说由“和平运动”进而组织政府，“不但是必然而且是必要”，表示“今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日本之部》，第25—30页。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17页。

后对于新中央政府，认为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出于至诚的拥护与全力的支持。”为伪政权的成立摇旗呐喊。

可就在这时，一幕所谓汪、日、蒋合流的闹剧，又一次使得青岛会议决定在三月中旬成立“新政权”的黄道吉日，延宕了下来，给了汪精卫集团不小的打击。

汪、日、蒋的“全面和平运动”

从表面上看，汪精卫集团对青岛会谈表现了空前的自信心，而且这次会议在客观上也促成了伪政权早日建立的势头，但他们毕竟痛感于自己力量的不足，在内部以周佛海为首的一伙人，又暗暗同重庆发生了联系，早就策划起所谓汪、日、蒋的“全面和平运动”。司徒雷登的调停，就是其中的一幕。

司徒雷登是出生于杭州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自一九一九年起，就任燕京大学的教育长、校长，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司徒雷登仍留北平。由于他同蒋介石、宋美龄之间关系密切，因而每年不辞长途跋涉，南下上海，尔后赴渝。抗战初期，在德国陶德曼大使调停的同时，司徒雷登也曾充当过类似的角色，进行一些试探性活动，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在青岛会谈结束后一个月，司徒雷登又来到上海，他托人邀请周佛海，希望能与周秘密会见。周起初犹豫不决，因为司徒雷登此行，不外是商谈重庆与汪日间的“全面和平”，这就势必与即将成立伪政权的计划相冲突，伺时又不知汪精卫对此的态度究竟怎样。周佛海拿不定主意，就去找岑德广。

岑德广自参加汪伪“和平运动”后，与周佛海臭气相投，两人“往返较密，过从几无虚日”，周佛海心里有事，就找他商量。岑稍加考虑后就说：

“司徒雷登以第三国人的超然地位，对重庆当局更相信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既然自愿挺身而出，这机会倒不容错过。”

岑德广所言，是有背景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早日结束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这场长期战争，在策划成立汪政权之际，对重庆继续开展诱降活动，阴谋实现汪蒋合作，共同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傀儡，进而全面控制中国。为适应这一政策的需要，周佛海积极参予这个活动。周本来就朝三暮四，在他刚逃离重庆到香港后，就曾与戴笠、杜月笙发生过关系。杜还亲自找周面谈，“先后剝切劝导，告以当此存亡紧急关头，只宜服从领袖（指蒋介石），不宜另作主张，以免为亲者所痛，仇者快”，周佛海听了，还装着一副“愧悔”的样子，“当即郑重声明，拥戴委座（指蒋介石）始终如一，周且谓本人此次离职原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到上海后，周、杜之间的联系一度中断了，但周仍然与重庆方面藕断丝连，保持联系。就在司徒雷登赴沪前后，周委派原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之侄段运凯、他的老同学王宏实，以及与重庆有关系的何亚农、李择一、陈警洲等人，通过钱新之、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向蒋介石通话，希望能与重庆合作，实行与日本的“全面和平”。现在司徒雷登找上门来，当然不能错过机会。但周佛海考虑到司徒雷登与他绝无交谊，如果双方相约，这消息容易泄露出去，把事情搞糟。于是岑德广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只要约定一个时间，到时由他派车将他们两人接到自己家里，这样就可以不露痕迹。同时，岑德广还建议他邀陈公博一起参加，因为有陈公博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汪精卫的谅解。周佛海欣然同意。

按照周佛海、岑德广商讨的计划，二月十二日晚上，双方在愚园路岐山村岑德广住宅的会客室里进行会谈。一番寒暄之后，司徒雷登说，他生活在中国数十年，与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对中国受到这场战争的浩劫深表同情。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00—101页。

《杜月笙呈蒋介石之宥电》（1939年8月26日），蒋介石总统府机要档案。

然后，他又说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末了，他又规劝说不宜组织伪政权，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并愿意听听汪精卫的意见，自己可以转告蒋介石。

对司徒雷登的意见，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均表示赞同。接着，周佛海也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以蒋介石目前的处境，已经无法与日本直接“交涉和平”，他愿意从中斡旋，并要司徒雷登转达他的意思，希望蒋介石“捐弃成见，消除意气”。表示如果重庆与东京间的和谈已在进行，则伪政权的成立自可从缓；如果双方达成协议，则伪政权即使成立，仍可随时解散。

初次会面后，陈公博、周佛海于翌日就将谈话经过向汪精卫作了汇报，汪听了虽然不大高兴，但事已至此，只好说：“只要蒋先生肯于此时谈和，则我主张和平的目的已达，尚復何求？”于是，双方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详细讨论了“全面和平”的有关事项。司徒雷登离开后，从此杳无音讯。三月底，伪政权在南京开张，司徒雷登的“和平”活动，便无疾而终。

原来，蒋介石集团鉴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对日本帝国主义狂妄的侵略野心不满，从巩固其统治为出发点，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难怪日本也好，周佛海一伙也好，他们的一切幻想，都很快破灭。对此，周佛海倒看得比较清楚，认为蒋介石对和平并非真心，只是想利用日汪的“全面和平”活动，“欲藉此以破坏我政府则秉实情”，是对日方的一种“戏弄”。

然而，日本方面却乐此一举，因为日本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靠汪精卫能够建立一个解决事变的“实力政权”，认为汪充其量不过是“通过重庆的桥梁”。因此，日本背着汪精卫，为“探索一系列新的行动”，从一九四一年三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谓“桐工作”。

“桐工作”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汪密约谈判时就已开始。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命令铃木卓尔中佐赴香港任机关长，要他设法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铃木到香港后，即与自称为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相会，进行“和平”谈判，日方将此称之为“桐工作”。一九四一年三月七日，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等日方代表和以“宋子良”为首的蒋方代表三人，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三天后，蒋介石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定：“日华两国为确保东洋之永久和平，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缔结和平条约之基础”；规定“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规定“日华两国为实现共同防共，缔结防共协定，而其内容与原则，以及日本要求在内蒙与华北之若干地区一定期间驻扎所需要之军队，以秘密条约缔定之。”在经济合作方面，规定“在华北与长江下游地区，应取得日华经济合作之成就，关于华北重要资源，中国对日本提供便利”。同时，又规定“为求日华提携合作，中国自日本招聘军事和经济顾问”；至于如何处理汪精卫集团，则规定重庆国民政府应与之“协力合作”。“备忘录”还保证“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回派遣至中国之兵力。”

上述条件，可以说是日汪重光堂密约的生动再现。蒋方代表经过协商后，决定大体上同意，但反对公开承认满洲国，主张日华两国缔结特别协定，共同作它的保护国；对于所谓日华共同防共，则表示“绝对不能承认部分日本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03页。

转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1—153页。

军驻扎在华北”。这就是说，蒋介石集团仍然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不仅如此，蒋方代表还坚持不在“备忘录”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到重庆去”，向蒋介石报告，“誓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个备忘录”。

日蒋香港会议一结束，日本即以“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大约二十三四日必有停战消息”为由，令犬养健通知周佛海，中央政治会议可按预定计划召开，但组府必须延至四月十五日。周佛海听了，大出意外。一方面，日方与重庆之间所进行的“桐工作”计划，他们一无所闻，因此不能不叫他们怀疑日本的“诚意”；另一方面，根据青岛会议决议，汪政权定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三月中旬，新老汉奸头目陆续赶到南京，准备登台，组府如果再延期，“则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告失败，必致两头落空”。因此，周佛海急忙邀影佐祯昭面谈，告之利害，乞求日方“最迟不能过三月卅一日”，影佐表示同意。于是，两人又去见汪精卫，汪只好答允下来，而中央政治会议仍如期举行。

当时，重庆蒋介石政权由于受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无意于此时与日方谈和，不过藉此以破坏汪政权的成立。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实际上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的。日本鉴于“跟重庆直接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才批准梅机关着手安排汪政权的就职典礼。

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召开

随着伪政权登台紧锣密鼓，汪精卫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日见激烈。大小汉奸都为自己伪政权中取得高官厚禄而表演了一场群狗争骨头的丑剧。

伪政权各院部的人事安排，几乎由周佛海一手包办。当时，陈公博尚未抵沪，高宗武、陶希圣先是消极，后又逃离而去，汪精卫因鉴于情势，不能不将此“重任”委托于周。周佛海藉此机会，“揽权位，置私人”，竭力在伪政权中安插自己的亲信。但陈公博“归队”后，周为所欲为的局面有所改变。

有一次，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公馆”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人事问题。在谈及政治训练部次长人选时，周佛海提出由罗君强充任，说他过去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时，罗就是他的主任秘书，现在任政训部次长，熟门熟路，可以帮助陈公博的工作。罗君强是湖南湘乡县人，生于一九二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谱名光治，别号庸生、竹侯等。读中学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曾参加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湖南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上半年，罗君强对革命丧失信心，意志消沉，终于脱离了共产党，同年秋参加中国国民党。在周佛海的提携下，先后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武汉行营秘书处秘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兼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上校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罗成了“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罗在重庆大发议论，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中国必愈战愈弱，共产党必乘机得势，日见强大；为了防止共党为患，非早日和日本讲和不可”，他“主张联日以反共反俄”。而此时，罗又因生活糜烂、行为不检，被免去了行政院简任秘书的服务，并得知蒋介石有查究之意。一九三九年二月，罗君强以“治病休养”为名，由重庆飞往昆明，再经河内转香港，周佛海约他加入汪精卫“和平运动”，罗认为自己在蒋介石幕下长期任秘书工作，未曾正式捏过印把子，“大丈夫何日才能出人头地呢”？因此决定入伙，冒一冒险。罗落水后，成了周佛海最主要的帮手。因此，周一提出让罗担任政训部次长，陈公博便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当时，陈已内定为立法院院长兼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他心里明白，周佛海的意图不就是为了在他身边安插一颗钉子，以便扶植势力，控制一部分武装力量吗？这那能瞒得过陈公博呢？

罗君强未能得到政训部次长的职位，周佛海就把一个无人要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给了他。虽然当时人们讥议说：汪伪的边疆是以南京这座石头城城墙为界的，边疆委员会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冷衙门。但罗君强得此一职，自以为三生有幸，十分得意。

因为边疆委员会委员长是一个“特任官”，如同清朝时的所谓“一品大官”。官瘾十足的罗君强，能爬上这个高位，也就心满意足了，对陈的“挡驾”自然作罢。

用五：《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未刊）。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03—107页。

又一件丑闻是关于伪海军部长的人选。伪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前，褚民谊找汪精卫，表示自己愿意象一九三二年那样，仍然担任行政院秘书长，说这样等于官复原职，对社会似乎也有好的影响。汪精卫听了，觉得言之有理，就答允了他的要求，但考虑到褚民谊处事糊涂，过去经常惹他生气，因此又要他内侄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不干，陈璧君问他是何理由，陈春圃直接了当地表示：“要么就是我负责，我当秘书长，如果明知褚民谊糊涂，干不了的，却要我代糊涂人负责，究竟是他糊涂还是我糊涂，我怕这笔账一千日也说不清楚。”陈璧君同意他的看法，结果由她同汪精卫商量，把秘书长一职给了陈春圃，另外让褚民谊任海军部部长。

褚民谊虽系文人，不懂军事，但听到这个消息，却不自量力，乐于担任此职。他马上赶制了一套海军上将服装，顾影自怜，得意非常。这事让陈公博、周佛海两人知道后，极力反对，于是，汪精卫亲笔致函周佛海，坚持让褚担任此职，周发牢骚说汪“必欲为之；殊使人难堪，椒房之害也”。第二天，周佛海借陈公博去见汪精卫，说明此事不妥，他们的理由是：海军部虽无军舰，但也有几只小舰艇，过去蒋介石的海军部就是一直以此作走私的工具，人言啧啧，而褚民谊为人颀颀，部下又良莠不齐，势必重蹈走私复辙，而他还蒙在鼓里，代人受过，所以任何一部都可以，唯独海军部万万不可给他。

由于陈公博、周佛海两人反对，褚民谊没有能当上海军部长，由汪精卫自兼该职。但汪精卫认为陈、周对褚民谊有成见，他们这样做，会使褚民谊难堪。于是使出政客手腕，突然在会议上提出让褚民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官升一级，十分高兴。周佛海则认为让褚当外交部长“当然不甚适合，然较之海军[部长]，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在内部争斗中，“七十六号”两个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闹得最凶。在汪伪集团内部，汉奸们的暂时结合，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的，一俟利害发生冲突，便不可避免地相互争斗。丁、李的结合也是如此。当时，李士群约丁默邨出来做前台经理的时候，无非是想利用丁过去在“中统”特务圈中的地位和声望，以发展特务队伍。但自与汪精卫集团合流后，李士群发现搞特工除了可以捞钱外，还很有“政治前途”，不过丁默邨在前面揽着，该由他当的“官儿”，都落到了丁的身上了，因此懊悔不已。而丁默邨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攀上了周佛海这座靠山，就处处以老来自居，所有肥缺当仁不让，更不把李士群放在眼里。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成立时，周佛海任主任，丁任副主任，丁更一心想全盘控制特工，极力扩张自己的人马。当时由他所主持的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一大批人经过丁的推荐，进入了“七十六号”，他们心目中只有了默邨，而没有李士群，这一切都使得李对丁恨之入骨，处处与丁为难，到一九四一年初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前夕，围绕着警政部长的席位，丁、李冲突便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了。

根据一九三九年五月丁默邨、李士群与汪精卫等人的约定，狂伪政权的警政部长一席，由“七十六号”头目担任，汪精卫原先内定丁默邨任部长，李士群担任政务次长，丁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既是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

陈春圃：《粉墨登场前后群狗争骨之丑态》，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713页。

《周佛海日记》（1940年3月21日）。

《周佛海日记》（1940年3月22日）。

又兼汪伪行政院警政部长，一手操纵民运、特务、警察大权，就可以压倒李士群。不料，李士群展开攻势，公开反对丁默邨兼任警政部长，并要求由他自己担任此职。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难怪周佛海为之摇头叹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由于内部的勾心斗角，周感到前途茫茫，不知如何收拾这个局面，足见其争夺的激烈。结果，李士群虽将丁默邨一脚踢出了“七十六号”，自居特工总部主任，但警政部长一席，却变成了“敲破狗食盘，大家吃不成”，由周佛海以伪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兼任，李士群任政务次长。丁默邨失去了警政部长，便消极怠工，甚至还赌气要将伪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也让他人，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汪伪政权的人事安排，就这样在争争吵吵，千回百转中初步排定。三月二十日上午，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中山北路“国际联欢社大会堂”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除汪精卫外，国民党十名，他们是：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临时、维新政府各五名，他们是：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所谓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八名，他们是：诸青来、李祖虞、赵毓松、张英华、赵正平、杨毓珣、岑德广、赵尊岳；伪蒙疆自治政府二名，他们是卓特巴札布、陈玉铭；另有二名列席代表，他们是伪湖北政府代表何佩瑢、伪广东维持会代表彭东原。汪精卫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致开幕词。他吹嘘参加会议诸人，“或为中国国民党之同志，曾服务于国民政府，深感收拾时局之重大责任；或为事变以来尽瘁于国脉民命之维持，先后成立政权之诸当局；或为国内有悠久历史，曾参加国民参政会之诸政党；或为海内贤达，有忧时先识”，相聚一堂，“期于共同担负起和平建国之时代的使命”。汪要求这些人，对各项议臣，“作缜密之讨论”，“使全国同胞所切盼之普遍的和平，得以从速实现，使全国多时久悬未决之宪政问题，得以确定。”用所谓“结束训政、实现宪政”的谎言，以掩盖其投放卖国的罪行，这是汪精卫的又一卑劣伎俩。

此后两天，汉奸群丑煞有介事地通过了伪中央政府树立大纲；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伪国民政府及五院组织法；伪五院所属各部会组织法；伪国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府文官长、各军长的人选案；伪政院各部会长及秘书长、立法院立法委员、司法院所属的最高法院、行政法院院长，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人选案；伪监察院监察使、监察委员和审计部长人选案；伪考试院所属铨叙部部长及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人选案等提案。同时根据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六名当然委员，由伪府五院院长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四名列席委员由你去立法院外的四院副院长充任；十九名指定委员由汪精卫指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充任；十一名招聘委员由所谓“合法”选举人士及社会知名人士充任：

主 席 汪精卫
当然委员 汪精卫 陈公博 温宗尧 梁鸿志

《周佛海日记》（1940年2月20日）。

汪精卫：《中央政治会议开幕词》（1940年3月20日），《中华日报》1940年3月21日。

	王揖唐	王克敏		
列席委员	褚民谊	朱履齋	顾忠深	江亢虎
指定委员	周佛海	褚民谊	陈壁君	梅思平
	陈 群	林柏生	刘郁芬	任援道
	焦 莹	陈君慧	陈耀祖	李圣五
	叶 蓬	丁默邨	傅式说	鲍文樾
	萧叔萱	李士群	杨揆一	
延聘委员	齐燮元	朱 深	赵毓松	赵尊岳
	诸青来	岑德广	赵正平	纓 斌
	卓特巴札布	殷同	高冠吾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还根据该会组织条例，决定了正副秘书长、各专门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

秘 书 长	周佛海
副秘书长	陈春圃 罗君强
法制专门委员会	
主 任	梅思平
副 主 任	金雄白
内政专门委员会	
主 任	陈 群
副 主 任	刘 云
外交专门委员会	
主 任	徐 良
副 主 任	张显之
军事专门委员会	
主 任	鲍文樾
副 主 任	凌 霄
财政专门委员会	
主 任	陈之硕
副 主 任	梅哲之
经济专门委员会	
主 任	陈君慧
副 主 任	何炳贤
交通专门委员会	
主 任	李祖虞
副 主 任	陈怕藩
教育专门委员会	
主 任	焦 莹
副 主 任	唐惠民
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	
主 任	蔡洪田
副 主 任	凌宪文

最后排定了各院、部、会人选，其名单如下：

汪伪政权各院、部、会主要头目名单
(一九四 年三月)

一、主席、五院院长及副院长

国民政府主席

林 森

国民政府主席代理

汪精卫

行政院长

江精卫

副院长

褚民谊

立法院长

陈公博

副院长

未 定

司法院长

温宗尧

副院长

朱履和

监察院长

梁鸿志

副院长

顾忠琛

考试院长

王揖唐

副院长

江亢虎

文官长

徐苏中

参军长

唐 蟒

二、行政院各部长

内政部长

陈 群

政务次长

江履谦

常务次长

李文滨

外交部长（兼任）

褚民谊

政务队长

徐 良

财政部长

周佛海

政务次长

严家炽

常务次长

陈之硕

军政部长（代理）

鲍文樾

政务次长

鲍文樾

常务次长

陈维远

海军部长（行政院长暂行兼任）

汪精卫

政务次长

凌 霄

常务次长

许继祥

司法行政部长

李圣五

政务次长

汪翰章

常务次长

薛典曾

（二十七日追加决定）

教育部长

赵正平

政务次长

樊仲云

常务次长

戴英夫

工商部长

梅思平

政务次长

蔡 培

常务次长

汤澄波

铁道部长

傅式说

政务次长

赵尊岳

常务次长

周化人

宣传部长

林伯生

政务次长	胡兰成
常务次长	孔宪铨
警政部长	周佛海
政务次长	李士群
常务次长	邓祖禹
农矿部长	赵毓松
政务次长	汪曼百
常务次长	何庭流
社会部长	丁默邨
政务次长	顾继武
常务次长	彰 年
交通部长	诸青来
政务次长	朱 扑
常务次长	李祖虞
赈务委员长	岑德广
边疆委员长	罗君强
侨务委员长	陈济成
水利委员长	杨寿楣
行政院秘书长	陈春顾
三、司法法院	
最高法院院长	赵 韬
行政法院院长	林 彪
政务次长	胡兰成
常务次长	孔宪铨
警政部长	周佛海
(四月六日追加决定)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朱履和
四、监察院	
审计部长	夏奇峰
政务次长	沈尔乔
常务次长	王 修
五、考试院	
铨叙部长(兼任)	江亢虎
政务次长	黄香谷
常务次长	夏肃初
(二十四日追加决定)	
考选委员会委员长	焦 莹
副委员长	吴凯声
(二十八日追加决定)	
六、军事委员会	
参谋本部长(代理)	杨揆一
政务次长	杨揆一
政务次长	刘培绪
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	任援道

军事参议院长（代理）	任援道
副院长	任援道
军事训练部长（代理）	萧叔萱
政务次长	萧叔萱
常务次长	邓大章
开封绥靖主任	刘郁芬
武汉绥靖主任	叶 蓬
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齐燮元
政治训练部长（兼任）	陈公博
政务次长	李讴一
常务次长	富双英
华北政务委员会	
委员长	王克敏
常务委员兼内政总署督办（兼任）	克敏
常务委员兼财政总署省办	王时璟
常会委员兼绥靖总署督办	齐燮元
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省办	王荫泰
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汤尔和
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	殷 同
常务委员兼政务厅长	朱 琛
委员	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
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桂	

人们不禁要问：汪精卫为何把伪国民政府主席一席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原来汪标榜“还都南京”，只要重庆国民党也实行“和平”，宁渝间马上可以合流，将来政府仍由林森任主席，这是汪煞费苦心的政治意图。汪精卫集团终于完成了组织伪政权的全部程序，就要沐猴而冠了。

儿皇帝粉墨登场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汪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卧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虎踞龙盘，气势雄伟，然而这六朝古都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沦陷以来，受到了空前的浩劫，已是满目疮痍。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早给日军捣毁得支离破碎，汪伪国民政府就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国旗”，可在每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上方都附有一片黄色飘带的“辫子”，上面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黑字，字体却五花八门，有楷书、行书、隶书，还有手写体、印刷体，应有尽有，真是“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而鼓楼与新街口闹市区又出现了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更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恐怖的气氛。

按照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以下汉奸文武官员算是完成了任命手续，他们已经挟着由印铸局为之预制的各该机关印信，回到自己的“衙门”，准备启用。伪政府各院、部、会、署所分得的地址是：

会议厅——前考试院明志楼

(甲)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 { 会议厅——前考试院明志楼
办公厅——前考试院衡鉴楼

(乙) 伪国民政府 { 大礼堂——前考试院明志楼
办公厅——前考试院衡鉴楼

(一) 伪立法院 { 会议厅——前考试院明志楼
办公厅——前考试院西部

(二) 伪行政院 { 会议厅——前考试院明志楼
办公厅——前考试院公明堂

1. 内政部——前南京市政府原址
2. 外交部——伪考试院东部十九号至二十二号
3. 财政部——前财政部原址
4. 教育部——前中央庚款委员会
5. 军政部——伪中央党部九号楼下
6. 海军部——前海军部原址
7. 工商部——前教育部原址
3. 农矿部——前中南银行旧址
9. 交通部——前行政院后座
10. 铁道部——伪交通部前座房屋
11. 宣传部——伪国货银行一、二、三楼共三层
12. 司法行政部——新建房舍
13. 社会部——伪中央党部四号楼上
14. 警政部——前中央研究院原址
- (三) 伪司法院——前南京市政府原址
- (四) 伪考试院——前国民政府原址
- (五) 伪监察院——前国民政府原址

(六) 伪五院外，有赈务、边疆、侨务、水利四个伪委员会及各伪院部会署队等伪组织其地址如下：

1. 赈务委员会——伪中央党部八号
2. 边疆委员会——伪中央党部二十四、二十五两号
3. 侨务委员会——伪中央党部二十三号
4. 水利委员会——旧址
5. 参谋本部——前国立美术陈列馆旧址
6. 军事训练部——伪中央党部九号楼下全部
7. 政治训练部——伪考试院西部四、五、六号
8. 军事参议院——伪绥靖总司令部
9. 军事委员会——前国立美术陈列馆旧址
10. 航空署——伪考试院西部三十四号
11. 宪政实施委员会——伪国民大会会堂
12. 伪国府音乐队及卫队——伪考试院西部二十六至二十九号

这天清晨，汪伪汉奸头目一个个衣冠趋跄，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下车后鱼贯进入大礼堂，参加“还都”仪式。会场气氛沉闷，与会者有穿军装的，有穿蓝袍黑褂的，彼此见面后，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便默然地站到早已用粉笔圈好的位置上。汪精卫身穿一套晨礼服，白净净的脸上失去了往日趾高气扬的神采，显得格外的苍老憔悴。他悄然走上主席台，以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身份，有气无力地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当天，伪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阐述其内外方针。对外强调“与日本共同努力，本着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则强调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叫嚷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同时煞有介事地规定重庆政府军政人员务必于近期内到南京报到，规定国民党军队“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并宣布：“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同一天，临时、维新政府分别发表解散宣言，竭力粉饰其卖国行径，说他们“鉴于国势濒危，民生垂绝，凜匹夫有责之义，鸠合同志，不计毁誉，于水深火热之中，为被发纓冠之举，以冀保一隅之元气”，“殫心竭力，尽瘁国事”，现在汪伪国民政府已举行“还都”典礼，新老汉奸之间“趣旨既合”，“自当归于统一”。

晚上，天字第一号汉奸汪精卫发表了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政府支持他建立伪政权表示感谢，并再次发誓说，他“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伪政权的二号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词，声称“现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因此必须要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陈公博的标准是必须要

《中华日报》1940年3月30日。

《维新政府解散宣言》（1940年3月30日），见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46页。

《临时政府解散宣言》（1940年3月30日），同上，第145页。

《中华日报》1940年3月31日。

“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中国人要和日本人一样互相平等友好，为傀儡戏的开场大加捧场。

可就在这时，南京城里却发生了几处煞风景的镜头。这天，原维新政府的御用工具——“大民会”强迫了一批“民众”，稀稀拉拉地跑上大街，呼几声口号，就算是庆祝游行活动，但却没有一点“节日”气氛。这是不足为怪的。处于日军刺刀下生活的南京市民，倍受国破家亡的苦难，对侵略者扶植起来的伪政权，哪有好感可言？为了表示抵制，他们在奉命挂起“国旗”时，有的并不按规定加上“猪尾巴”似的黄色飘带。这下可激怒了日本侵略军。日士兵以此作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占领军当局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场风波才告平息。更使汪精卫一伙难堪的是，伪政府成立之日，既没有外交上应有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连住在南京的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也是到了第二天上午才到汪政府作表面上的周旋。难怪有个当过伪官的人曾经为此感叹说：“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南京是如此的凄凉冷清，可在抗日后方，却很快掀起了声讨汉奸的热潮。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学生举行罢课，冲破巡捕的阻挠，高举“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等标语，举行游行示威，沿途还散发了讨汪传单。同一天，湖南省各界在耒阳召开讨逆锄奸大会，声讨汪伪汉奸“甘夷邦家于附庸，沦国民为奴隶，其卑劣狂悖亘古所无，乱臣贼子人可得而诛”。就在这一天，重庆国民党政府发表“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谴责汪：“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命令“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接着，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宁夏、山西、广东民众先后通电谴责，海外各地爱国华侨也纷纷来电讨汪，怒斥汪精卫一伙“罪恶滔天，甘作虎帐，成立伪府，有血皆愤，誓不甘休”。贵阳人民仿秦桧夫妇跪于岳墓，亦塑汪精卫夫妇之像长跪于公园之内，让人民群众唾骂。四月十五日，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发表《讨汪救国通电》，严正指出：汪精卫的所谓“和平”就是投降；所谓“反共”就是灭华。并庄严表示：“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逐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海内外反逆讨汪的声浪，铺天盖地，把汪伪汉奸“和平、反共、建国”的叫嚣，完全淹没了。

汪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和日本系“兄弟之邦”，但不管汉奸们如何吹嘘，南京伪国民政府不过是日本控制下的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汉奸傀儡政权，日本人只是把它当作“满洲国”第二。伪政权成立的翌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在回答记者所提的关于汪政权独立性问题时就明确地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事实正是这样，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侵略者给汪精卫脖子上套的绳索越勒越紧。根据汪日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

陈公博：《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1940年3月30日），《中华日报》1940年3月31日。

《湖南省各界讨逆锄奸大会耒阳来电》（1940年3月3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国民政府令》（1940年3月30日），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

《黄益堂吉隆坡来电》（1940年4月2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解放日报》1940年4月15日。

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两个“顾问部”象影子一样地日夜跟随着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伪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他们的权力都要比同级官吏大得多。特别是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更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完全支配着汪精卫以下巨奸的行动。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影佐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看他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继续推行“分治合作”的原则，把整个沦陷区割裂得支离破碎。汪伪政权作为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实际管辖范围却小得可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际上是两个独立政权，就连“国旗”也各树一帜，飘扬在华北和“蒙疆”沦陷区上空的分别是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就是日本侵略者同意归汪伪政权直接管辖的华中、华南沦陷区其权力也早已被架空了。由于日本占领军的干涉，伪江苏省主席陈则民、伪浙江省主席汪瑞闾、伪安徽省主席倪道烺、伪南京市长高冠吾、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全部都是伪维新政府的旧人，并不完全听命于汪伪中央；伪湖北省主席杨揆一、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更是唯日人之言为是，大有割据之势；只有广东，因为汪精卫的坚持，才由伪府汪命汪的亲信陈耀祖担任代理伪省主席，但伪广州市长却仍由原维持会头目彭东原担任。难怪一个担任伪官的汉奸曾经自我嘲笑说，汪伪政权是一个政令不出南京城门的小朝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伪政权是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出来的，但当汪精卫真正宣誓就职时，日本却并不立即予以承认。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为顾全汪政权的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也未被理睬。原来，日本要汪政权和它签订条约，把以前的秘密条款以政府的形式正式签订，以取得法律效力，好照单索取。因此提出，承认汪政权应在签订条约的同时或之后。何况，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在与重庆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呢！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很坦率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还说：“我们也注意到汪精卫在历史上总是抛弃同他合作的人，不过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也只能找到象他这样的人”。这些酸溜溜的话，使汪精卫感到难受。对于奴才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不受主子信任更伤感呢？

为了尽快获得日本主子的承认，汪伪政权一成立，即准备与日本进行“调整邦交会议”，签订所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方面也加紧活动，四月间，负责这次谈判的阿部信行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南京“庆祝”汪政权“还都”，然而，他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了签订条约。通过双方协商，七月五日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由于条约内容早已在上一年年底就已制订，因此一开始就进入正式讨论。汪方以汪精卫为首，以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周佛海、工商部长梅思平、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次长徐良以及翻译周隆庠等人为交涉委员；日方以阿部信行为首，以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松本、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顾问须贺、兴亚院调查官安藤、众议院议员犬养等为交涉委员，双方经过十六次会议，先后交涉了五十四天，到八月三十一日通过了汪日基本关系条约的最后文本。这个条约的实际内容就是一九三九年底汪日秘密条约的翻版。其中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以及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五件，这是中国近代白鸦片战争以来空前

的卖国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对于足以危害两国安宁及福利的一切共产主义破坏活动，共同负防卫之责。”
“应各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分子及其组织，并对防共有关的情报、宣传等，紧密配合。”
“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二、“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两国紧密合作，筹划开发厦门和海南岛以及附近岛屿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需的资源。”

三、“对驻扎于中华民国领域的日本国军队所驻扎地区和有关地区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和水路等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答允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提供军队驻扎所必要的各种便利。”

四、“中华民国政府应补偿日本国臣民自事变发生以来，在中华民国因事变所受的权利、利益的损害”。

依照这个条约，中国将完全沦为满足日本军事、经济需要，任凭其榨取勒索的殖民地、附属国。

但汉奸自有一套卖国理论。周佛海说什么“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汪精卫即于八月三十一日闭会时按见中外记者，更加肉麻地称这个条约将“奠定百年和平之基石”，真是无耻之尤。

可这时，日方却仍然幻想着同重庆实现“全面和平”，因而想把签订条约的事搁一搁，千方百计抓紧对蒋介石的诱降，至十一月间，日蒋“和谈”又一次暂告中断以后，日本政府才决定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签订日汪条约。

十一月二十八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同时，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删去主席“不负实际责任”和“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的规定。二十九日，汪精卫发表通电，就任伪府主席。

三十日，汪日双方举行条约签订仪式，汪精卫和阿部信行在条约上签字。同一天，汪精卫又和阿部信行、伪满代表臧式毅签署了《汪日满共同宣言》，声明三国间互相承认。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自“还都”起，经历了八个月之久，终于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

接着，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府。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傀儡政权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建立起来了。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66—474页。

《周佛海日记》（1940年8月29日）。

汪伪政权建立的特点

同中国近代社会任何一个汉奸傀儡政权一样，汪伪政权也是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下出现的政治怪胎，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把中国推向殖民地化深渊过程中，与中国地主买办阶级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产物，因而完全由帝国主义扶植又完全受帝国主义所操纵。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国沦陷区出现的一批伪政权，无一例外。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建立的伪满洲国，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建立的察南自治政府，同年十月十五日成立的晋北自治政府，同月二十七日成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等等，这类政府虽然五光十色，花样异常，但它们与汪伪政权一样，都是在日本侵略军扶植下建立起来的，都拿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利益作抵押，都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仰承其鼻息，因而都是道道地地的卖国傀儡政权；同时，所有的汉奸政权都标榜反共，是反共反人民的大本营。

然页，作为“全国性”的汉奸中央政权，汪伪政权同其他傀儡政权相比较，则具有更完备的政权形态，更完整的政治纲领，在所谓继续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等方面，更不同于其他傀儡政权。同时在成员的构成上，也大不相同。作为整个沦陷区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涉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关于成员构成。在伪满洲国，一切高位大都为清廷末代皇帝 的君臣所占有。溥仪任“满洲国执政”，后由执政改为皇帝，是该政权的一具偶像。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原为溥仪的“愈勤殿行走”，曾为清廷总理内务府首席大臣。另一部分权力则为原奉系军阀旧军人熙洽、张景惠等人所掌握。伪蒙古自治政府则为蒙古上层贵族的私囊。该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即为蒙古地区锡林郭勒盟盟长、苏尼特右旗的王爷，参议府议长吴鹤龄原是蒙古驻京联合办事处处长。临时政府的首脑人物，大都是北洋军阀时代的遗老遗少及国民党时期赋闲于华北各地的所谓“寓公”。临时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原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先后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揖唐、朱深、王荫泰等也都担任过北洋军阀政府的总长。维新政府则以北洋政府时代的政治渣滓及国民党一批脱党分子为主体。行政院长梁鸿志早年投靠袁世凯，后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立法院长温宗尧是北洋政府驻藏大臣参赞，而内政部长陈群、财政部长陈锦涛等原都是国民党党员，后失宠于蒋介石而退出军政界，成为国民党内的“落伍分子”。

汪政权不同，在这个政权中，虽然也包括了临时、维新政府的头目，网罗了一批封建余孽、马路政客、失意军人、反动文人，但以国民党党员为主体。特别汪伪的上层汉奸，又大都是国民党政府中达官显贵。汪政权的灵魂是汪精卫，他是国民党元老，曾居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高位；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实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兼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掌握伪政权财政、军事、特务大权的周渤海原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良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行政院秘书长，其他加工商部部长梅思平、宣传部部长林柏生、社会部部长了默邨等也都是原国民党党政军中高级干部，他们控制了伪政权要

害部门。这是区别于其他伪政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于政权形态。伪满洲国亦称“满洲帝国”，是清皇朝的封建政权形态处于日本侵略军刺刀下的一个变种。政权的组织法采用清末君主立宪制，虽然开始规定在政府内设执政、参议府、立法院、行政院、法院、监察院等，但不久，“执政”即被废除，改为帝制，“执政”变成了皇帝，由溥仪充任，称康德皇帝，其他各院首脑，也就相应成了“皇帝”的各大臣。临时政府同“满洲国不同，该政权组织大纲抄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方案而制订。以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的职权。但这个政权，充其量“只是具有政权形式的地方维持会”而已。“地方治安维持会”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北扶植起来的一批“近似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日军在占领区内实行暴政的辅助机关。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北，以便“注重开发产业，促进贸易，恢复治安等工作”，在华北日本派遣军的策划下，把各地的地方治安维持会合并为华北政权机关，才产生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因此，从形态上分析，临时政府仅仅是地方治安维持会的一种扩充。由于“人才匮乏”，该政权成员大多相互兼职，其最大的权力集中于行政委员会，因此其他政府部门没有真正的权力分工。可笑的是，立法院的委员居然是由行政委员会任命，而权力集中的行政委员会中五个总署（部），竟没有一个主管外交的部。南京维新政府同临时政府如同一辙，也是在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有政府而没有政府主席的不伦不类的组织。维新政府也标榜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因人事安排上的窒碍，不得已只设行政和立法二院。其首都名义上设于南京，开始实际上大部分办公时间都在上海四川路桥北堍的新亚饭店，被世人耻笑为“饭店政府”。

与其他傀儡政权不同，汪政权则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行主席制，内设文官处、参军处。国民政府以下，设行政、立法、考试、监察、司法等五院。其中行政院内设置有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教育、司法行政、工商、农矿、铁道、交通、社会、宣传、警政等十四部，此外还设置赈务、边疆、侨务、水利等委员会；司法院下设行政法院、最高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考试院下为铨叙部、考选委员会；监察院下设审计部。军事机关方面，与五院同格的为军事委员会，下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此外，设华北政务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处理华北一切政务。汪伪政权的体制是五院十四部制。“国民政府”即为实施中央政治委员会所决定诸政策的国家总枢，政府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有全责。足见汪政权的组织机构相当完备，同其他傀儡政权组织处于短缺不全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关于政治纲领。满洲国标榜“谋确立坚强之国防国家体制”，“以图政治力之昂扬，施策之彻底的渗透”，其政纲的基本要点是“显扬国体之本义”，规定“我国体渊源于惟神之道，以与日本永远一体，不可分离关系为本义，将此坚固不动之国体之本义显扬于中外，以使为万般施政之基本”。围绕着这一“本义”，达到“整備国防态势”、“具（体）现民族协和”、“伸张外政”、“刷新庶政”等目标，这无疑是拷贝日本的所谓“王道乐土”，是

《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1942年12月8日发表），《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266页。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典型蓝本。临时政府的所谓政治纲领，仅仅在其成立“宣言”中骂几声“国民党焦土抗战之非”，声称“反对拾共产主义之唾弃，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扬言“要湔除污秽党治，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如此等等，纯属一种空洞乏力的宣传。

然而，汪伪政权所制订的政治纲领，较之其他傀儡政权要完备得多。在汪伪政府举行“还都”之际所公布的“十大基本政纲”，阐述了从外交到内政，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规定基于“善邻友好之方针”，推行“和平外交”，并“尊重友邦各国的正当权益并调整与其之关系”；规定“建设国防军，将军政、军令两大权明确分开，打破军事独裁制”；规定在各地“设立民意机关，囊括各界人材，集全国之公意，促成民主政治”，以便“招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规定“欢迎友邦各国的资本及技术合作，以恢复经济和发展产业”；规定“振兴对外贸易，致力国际收支平衡，重建中央银行，统一货币，以确立社会金融之基础”，并“整顿税制，减轻人民负担，复兴农村，救济难民，使其各安所业”；规定“以反共和建国为教育之方针，致力提高科学教育，一扫浮华盲目之学风”。尽管汪伪政权的政纲通篇是骗人的鬼话，但在“法理上”却装扮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承袭”，没有如同满洲国那样赤裸裸的“本义”，因而具有较大的欺骗性。

关于党统问题。满洲国无所谓“党统”，而是提倡在“帝德之下的民族协和”思想指导下，组织起类似政党实非政党的“协和会”一类的政治翼赞团体。该团体成员，一半出任政府要职，因而与其政府“实有表里一体之关系”。“协和会”在各地设立分会，普及各省、各县、官署、会社、兵营。该会宣扬“融洽民族感情，共存共荣”，“肃清赤化思想，推行王道政治”，“在‘剥共灭党’大纛下参加反共战争，实现善邻友好，贡献人类和平”，把消灭党派作为其宗旨。同满洲国一样，临时政府也无政党可言，但也有一个和满洲国之“协和会”异貌同胎的“新民会”。“新民会”先后以王克敏、王揖唐为会长，根据汉奸缪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倡所谓“新民史观”，宣传奴化苟安思想。劝人凡事都要自己认错，痛下一番反省功夫，不然，在这大乱时期便不能明哲保身，更不必说“止于至善”了。同时，“新民会”还劝说民众承认现实，讴歌现实，“有德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说能占有土地的人，当然就是“有德”，只要“有德”，就应该拥护，不必计较是哪一国人。“至德之世”。不应分辨种族，反对“狭义”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鼓吹中日满大联盟，进而组织亚细亚联盟，协和万邦，达到王道政治的大理想。维新政府也不存在所谓政党。其政治团体为“人民会”，以梁鸿志、温宗尧分任正副总裁。该会宣扬的“大民主主义”，既非理论体系，又无哲学基础，只含有大同之民的意义，包括所谓“良民主主义”（资性）、“公民主义”（资格）、“众民主主义”（数多）、“群民主主义”（团结），以恢复旧道德相标榜，“振兴民德主义”，一切活动的主要目标就在于帮助日本以华制华。

汪政权则“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本”，强调“党统”的重要性，竭力主张“以国民党为中心”，实现“以党治国”，建立起以国民党大执政党

《国民政府政纲》，《中华日报》1940年3月30日。

《满洲国》，《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230页。

的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权。

如上文所述，汪政权从日本帝国主义那儿得到的“待遇”，也略优于其他傀儡政权，它不仅与日本政府建立了所谓正式的外交关系，也获得了德国、意大利及它们的仆从国的外交“承认”。当然，日本替汪政权粉饰“独立”的假面具，把一部分与日本无根本利益冲突的事务交给汪政府处理，目的在于欺骗舆论，并以此作钓饵引诱重庆国民党政府，以实现其灭亡中国，进而灭亡整个亚洲的狂妄野心。

十四 石头城畔一场春梦

汪伪国民政府自一九四一年三月粉墨登场，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宣布解散，其间经历了五年零四个月又十七天的寿命。然而，在这短暂的五年半内，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卖国贼，肆意实行法西斯统治，破坏抗战，屠杀人民，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鹰犬，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危害，犯下了滔天之罪。

汪伪政府成立后，就把巩固和统一伪政权的任务摆到了首要的位置上。他们先从“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开始。虽然伪府已经成立，但汪伪国民党依然是一盘散沙，沦陷区也是四分五裂，各种党派、团体各自为政。为改变这种局面，汪伪政府效法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所谓“新政治体制”。一九四一年，日本政府急于要克服国内危机四伏的分裂状况，解散了所有的政党团体以及工会等群众组织，将其中大部分人员，合并于统一的团体——“大政翼赞会”中来。汪伪即以此为楷模，于一九四一年春竖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的旗号，将沦陷区内“兴亚建国总部”、“大民会”、“共和党”等组织予以解散，宣布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宣扬什么要在“一个领袖统率下，一个主义指导之下，集合各种政治和社会的力量”，并规定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总会“领袖”，“有绝对权力”，以树立汪精卫的偶像。同时，汪伪政权还在各地设“东亚联盟运动中国总会”分会、支部；支部以下或设分部，或者即以小组作为基本的下层组织，以便加强控制。

统一沦陷区的财政金融，是强化伪政权的又一重要措施。一九四一年初，汪伪政府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以周佛海、钱大榭、陈之硕、陈君慧、张素民等为常务理事，周任总裁，钱任副总裁。该行发行储备券，规定凡纳税、汇兑及一切公私往来，一律使用伪币，与重庆发行的法市等价流通。当然，汪伪财政金融的“统一”，不能不依仗于日本帝国主义，于是由周佛海出面，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商签订了《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日方答应出面斡旋向华兴商业银行借款五千万元，作为中央储备银行资本，但中央储备银行必须聘请日本顾问及职员，规定了顾问的广泛权利：凡有关银行营业、理事会议、国外汇兑、与外国银行的关系、国民党法市等旧通货、军事和日本通货事项，以及与华北政务委员会关系事项，都需征询顾问同意，必要时顾问并得要求该行总裁、副总裁说明情况，或列席理事会议。另外又规定该行保有的外汇，须存入日本银行，由双方组成外汇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同时要确认日本的军票与华北联银券的既成事实，并维持其价值。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在南京成立后，在日本的允许下，先后在上海、苏州、蚌埠、扬州、广州、武汉等处设分行，把触角伸向汪伪的各个区域。

一九四一年春，汪伪政府为改变其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以配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又在华中沦陷区实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他们首先以沪宁铁路沿线为示范“清乡”区，以苏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从七月开始至次年夏，在吴县、常熟、太仓、昆山、无锡、江阴、武进、镇江、丹阳、扬中等地进行第一期“清乡”。日伪的“清乡”，一般分两步进行。第一步

不久，伪中储券与法币即以八折、七五折、对半折，甚至二五折的比率兑换。

日伪第一期“清乡”发动后，逐步推向其他地区，1942年春至1943年夏，着重在太湖东南地区、上海郊区以及汪伪苏淮特别；1943年春到1944年初，又把重点放在镇江地区、苏北地区以及浙江杭州地区。

是“军事清乡”，这一阶段以日军为主，由汪伪军警配合，以十几路、甚至几十路的兵力向“清乡”区分进合击，妄图一下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伪府主席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签署了无数的条令、法规、暂行办法等文件，作为“清乡”的法律依据，而且从伪行政院、伪军事委员会各机关中抽调大批汉奸参加“清乡”，并专门组织宣传总队、政治工作团随“清乡”部队出发。接着，就是第二步“政治清乡”，汪伪以警察、保安队等反动武装为支柱，强行将“清乡”区内居民编组保甲，发放“良民证”，并实行连坐切结，发动告密检举运动，并推行所谓“自首”政策，对“清乡”区内与新四军有过联系，有过抗日言行的居民，一律列为“自新户”，限定日期登记“自新”，凡被视为嫌疑者就送到俘虏营进行“感化”，使整个“清乡”区变成了庞大的集中营。汪自己则多次身穿堆领章底三粒金星另架一个“国徽”的“特级上将”戎装，到“清乡”区视察，为其部下鼓劲打气。不仅如此，日伪军“清乡”时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抓丁抢粮，洗劫民财，奸污妇女，焚毁房屋，残杀人民，无恶不作。群众愤恨地说：

“鬼子和汉奸，好比活阎王！”“清乡，清乡，就是清箱！”当时常熟县的东塘镇，在敌伪开始“清乡”后，有一条二华里的街道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店铺门窗被砸光，店堂里货物被洗劫一空，不少房屋被烧毁，到处是断垣残壁，一片惨状！这就是汪伪汉奸祸国殃民的一部分血腥罪行！

与“清乡”运动相配合，汪伪国民政府又开展了所谓“新国民运动”，妄图在思想领域内毒化沦陷区人民，进一步从精神上强化其反动统治。他们摹仿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做法，在沦陷区发起所谓向汪精卫的“宣誓”活动，胁迫人们宣誓画押，表示“誓以至诚接受最高领袖之指导；服膺三民主义”，“如有违背誓言，愿受一切制裁”。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开始，依靠日伪刺刀，有数十万人参加这种“宣誓”，通过这场闹剧，汪精卫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五月间，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宣布成立，汪精卫兼委员长，周佛海、陈群、李圣五、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陈春圃等为常务委员，林为秘书长。汪伪“新国民运动”的重点，主要放在青少年身上，他们先后成立了“青年团”、“童子军”，举办了“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汪伪对这些青年“骨干”，大搞对汪的偶像崇拜，每日晨操都得高呼“汪主席万岁”，甚至规定凡听到“汪精卫”的名字就立刻“肃立”，并把这种做法逐步推向整个沦陷区。

汪伪政府的上述活动，虽然符合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因而取得了支持。但是，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的目的是，只是想把它作为统治中国沦陷区的工具，并非真正想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实力的独立政权。于是主子和奴才之间，经常发生控制和反控制的争斗，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往往在言谈之中，文章的字里行间，发泄这种不满情绪。然而，汪伪政府毕竟是靠日本侵略者的刺刀扶植起来的，就不能不把自己紧紧绑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车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海空军几百架“神风”战斗机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菲律宾、印尼、马来亚、缅甸、泰

1944年初至1945年夏，广东和安徽地区也进行了“清乡”，但这只是日伪临死前的最后挣扎了。

《誓词》，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等广大地区，在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大洋洲，西迄印度洋长达万里的战线上，同英、美等国全面开战。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极大地震惊着汪伪集团，汪精卫一伙抱怨日本在作出决定之前，完全瞒着他们。可是当天上午，在伪府接到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大使馆的正式通知后，立即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经过讨论，认为除采取与日本一致立场外，别无他途。十七日，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对大东亚战争之声明》：说“为尊重条约及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起见，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以确乎不拔之精神，临此难局”，同时向日本表示希望“参战”。当时，日本政府并不欢迎汪政权“参战”，因为伪满洲国由于考虑对苏关系不参战，在日本侵略者看来，满洲国不参战，先让汪政权参战是不合适的。同时，日本政府也深知汪政权的“参战”，只不过是一种姿态，如此虚弱的汪政权，又哪能帮得上它什么忙呢？

一九四二年十月，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到美军的强烈攻势而吃了败仗，对重庆蒋介石政府的再一次“和平”活动又毫无希望，因此开始改变策略，提出所谓“对华新政策”，妄图利用汪伪政府的参战，来打破中日长期战争的现状，并决定放宽对汪伪政权的某些政策，表示要加强沦陷区年“政治事务”的统一管理，以便充分利用一切人力、物力，贯彻其“大东亚圣战”的基本国策。为此，日本政府还装模作样地宣布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汪政权也煞有介事地成立了“接收租界委员会”、“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先后在上海、厦门、天津、广州、汉口等地举行“接收”仪式，大吹大擂说这是“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当然，在以百万计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下，这只能是一场骗局。

主令仆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伪国民政府发表了对英美两国的《宣战布告》，宣布“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与日本“同生共死”。汪伪外交部同时通知轴心各国政府，自此以后汪政权将与日本由前后方关系进至并肩作战的关系。同一天，汪精卫与日本大使重光葵又签订了《中日共同宣言》，宣称“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从此，汪伪政权全面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在政治上，设立最高国防会议，对战时的方针政策加以决策；并对省、县两级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废除省、县政府委员制，实行省长、县长集权。这一机构的更动，也增强了汪伪政权军事法西斯色彩。在经济上，积极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先后成立了“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米粮统制委员会”、“棉花统制委员会”等一套推行统制经济的机构，加紧对沦陷区的物资控括，向日本提供军需物资，以支持其战争，使中国沦陷区成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后方基地。在思想文化领域，汪伪也搞起所谓“战时文化宣传体制”，规定要“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

《中华日报》1941年12月17日。

褚民谊：《在日汪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两委员会首次会议上讲话》，《中华日报》1943年3月5日。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1页。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11页。

亚轴心”，“清算英美侵略主义”，“防止国际共产主义”，并强调对各种宣传机构进行调整、充实，加紧对图书、新闻、杂志、电影、戏剧、唱片、广播等有关文化宣传作严格的“审查”，为日本“大东亚圣战”擂鼓助威。就这样，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由“同甘共苦”走上了“同生共死”的道路，因而最终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殉葬品。

汪政权的覆灭，是以汪精卫之死为其先兆的。一九四三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同它在欧洲轴心国伙伴德、意法西斯一样，从战略优势的顶峰跌落了下来，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汪政权，也走上了朝不保夕的穷途末路。这种形势，不能不使汪精卫忧心如焚。特别刺激汪精卫神经的是：被称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伪政权股肱的周佛海早已同重庆暗中勾结，事事听命于重庆，不仅探送情报，掩护重庆地下特工人员，而且与日本宪兵队相勾结，将当时得到汪精卫重用的李士群毒毙，向蒋介石邀功。同时，作为汪精卫“知己”的陈公博也向重庆暗送秋波，要求“戴罪立功”，汪精卫感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他曾为之叹息：“同伴是这样的稀少，四周的风浪是这样的险恶，魑魅魍魉是这样的不断袭击……每当感着没有办法的时候，未尝不羡慕曾仲鸣同志之一瞑之视”。竟觉得活着当傀儡不如象曾仲鸣那样死的好，足见他对自己及伪政权前途的绝望心情。

一九四三年八月，汪精卫枪伤复发，南京日本陆军医院为他施行手术，虽然取出了一九三五年他遭刺时一直留在背脊里的那颗子弹头，但病情未见好转。次年三月三日，汪只好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就医，经日本医生再次为他动手术，但汪病骨支离，日医已回天无术，延至十一月十日，因并发肺炎，病毙于名古屋。

汪精卫一死，南京城里的汉奸群丑顿失重心，更加惶惶不可终日。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伪政权“公务”交由陈公博、周佛海负责。汪的所有伪职由陈代理，周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但陈、周两人免死狐悲，对前途悲观失望，完全丧失了信心。周佛海在汪精卫入殓的当天，哀叹“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后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他在汪死后半年多时间里所记的日记中不时有“悲也”、“苦也”等惆怅之言，并一再承认局势“危险万状”，“吾辈断无法渡此惊涛骇浪，必为大浪沉于海底”。陈公博也以临终的心情，准备伪政权的后事。在他就职代国民政府主席时，就向心腹透露说：“汪先生上演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这反映了陈公博当时的心情。

在一片愁云苦雨的笼罩之下，汪伪政权内部离心倾向日益严重。有的急于钻营重庆路线，谋求“反正”；有的更加横征暴敛，囤积居奇，准备后路；有的则整日醉生梦死，尽情享受。“大家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而上层汉奸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更是闹得不可开交。汪

《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979—981页。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2册，第104页。

《周佛海日记》（1944年11月13日、12月22日）。

同上

巫馥：《汪伪政权未日记》（未刊）。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伪政权成立后，内部逐渐形成以陈璧君为首的所谓“公馆派”，其中有褚民谊、林柏生、陈耀祖、陈春圃等，和以周佛海为首的所谓 CC 派，其中有丁默邨、梅思平、罗君强等，这两派一直明争暗斗，互争权位。汪精卫死后，内部的矛盾冲突有了新的发展，在陈公博就职前，周佛海手下人就竭力反对陈坐第一把交椅，力主周“当仁不让”，理由是“与陈共事，较之与汪共事更难，如果让陈继任了汪的职位，到头来必后悔。待陈上台后，不仅遭到 CC 派的反对，也引起了“公馆派”的不满。褚民谊首先发难，对陈公博“凡事不使之预闻”的做法极为抵触，说自己“跑龙套，毫无意义”，因而大发牢骚，表示要辞去外长。林柏生也提出辞职，向陈公博施加压力。这种狗咬狗的争斗，一直闹到伪政权的覆灭为止。在伪政权统治区域内，情况就更加糟糕了。由于日伪对沦陷区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和穷凶极恶的搜刮，竭泽而渔，为其提供粮食、原料等军需战略物资，致使沦陷区经济衰败，物价飞涨，广大人民饥寒交迫，陷于极端苦难的深渊。连日本人也承认：“汪政权方面，则因战争压力之加重，国民经济之疲惫，已达最高限界”。伪政权的灭亡是势在必然的。

一九四四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以敌后战场为依托，开始向日军进行局部反攻。一九四五年春，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歼灭了大量日伪军，解放区总面积扩大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一亿，正规部队近百万，民兵二百多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八月八月，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强大的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向中国东北挺进，一举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八月九日，日本政府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决定接受中、美、英三国的《波茨坦公告》。十四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帝国主义一垮台，南京伪政权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十四日那天，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陈立即打电话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量后事。十六日，周佛海抵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一片恐慌、内哄和混乱之中，由陈公博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当晚，广播《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伪政权曲终人散，彻底完蛋，卖国汉奸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督促下，面对全国掀起的“严惩汉奸、快惩汉奸”的怒潮，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在全国各地开始逮捕汉奸。同年冬，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件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一九四七年底基本办结。汪伪主要汉奸头目除周佛海因与重庆有勾搭而由死刑被蒋介石特赦改判无期徒刑外，被判处死刑的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梁鸿志、王揖唐、苏成德、杨揆一、叶蓬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罗君强、陈春圃、陈璧君、卢英、江亢虎等。中国现代史上以汪精卫为首的大小汉奸，就这样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周佛海日记》（1944年11月25日）。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第7页。

